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



## 前 言

改革开放 15 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在文艺实践中切实地加以贯彻，是繁荣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样，自始至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着他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新的实际出发，总结新经验，寻找新路子的鲜明的革命风格。他创造性地、科学地解决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基本任务；创造性地、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提出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的论断；创造性地、科学地从文艺规律出发，完善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思想理论；并在这个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反复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具有时代感。他把社会主义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强调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把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任务。他在新的形势下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作了新的、创造性的阐述。他着重指出文艺的发展繁荣，一方面要更开放、更活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邓小平文艺思想宏大的构架、新颖的内容。

邓小平文艺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奠定了科学基础。邓小平文艺思想对当代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艺实践中结出了一批又一批硕果。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艺的进步，我们将愈益感受到、认识到它的巨大意义。

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认真学习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想。这部书就是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的一个初步体会，也是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格局中理解、研究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一点心得。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反复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著作，联系当代中国文艺实际的思考，力求较全面、系统地阐述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也力求探讨一些文艺美学规律性的问题，以便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论断，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是我们自身思想艺术素质的一次提高。

编写体例，我们没有采用纵向的介绍邓小平文艺思想形成发展历史的写

法，也没有采用横向平列邓小平文艺思想各个方面的写法，而是选择邓小平文艺思想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以论为主、纵横结合地展开。敬希专家和读者指正。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编撰委员会**

##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序

刘荣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这一理论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指针。

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主张文艺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指导下，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传达他们的感情和心声。文艺家要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投入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汲取精神营养、艺术营养。他特别提倡文艺家深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现时代生活，反映这个中国历史的伟大的转折时期，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水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做贡献。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探索、学习、提高。社会主义文艺，要满腔热情地反映新的时代生活，创造文艺的新篇章，面对文艺新的历史任务，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要坚持，更要发展；作家艺术家的笔墨要继承，更要创新。这就必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重申“二为”、“双百”、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反映新的时代生活和新时代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提倡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思想，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思想，等等，都体现了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领会，贯彻到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实践中去。近年来，陕西省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繁盛期，归根结底是全省文艺工作者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努力于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结出的果实。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省文艺界面临着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弘扬主旋律，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新的任务。我们要继续清理文艺思想，端正前进方向；要研究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对待文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要进一步扩拓视野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要深入细致地继续抓好创作规划；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评论和作品研究活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要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些任务，从根本上说，只有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才能实现。这部《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是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本省文艺评论工作者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学习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作者们不但力图将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展开系统地论述，而且力图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

想，认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归纳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推动和促进新形势下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

这种研究尽管是初步的，但这项劳动是富有意义的。我希望今后文艺界有更多的同志热心于这项工作，使整个文艺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学习，逐步深入。

1993年12月19日

## 邓小平有关论述摘录

### 一、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

宣传内容不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不善于很及时地批驳敌人。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6页  
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2页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

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8—149页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某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

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

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9—220页

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9页

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5页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

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

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

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

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

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

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41页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

气。这样下去不行。如同在整党中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样，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46页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

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

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

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42页  
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9页

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43页  
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 二、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想学到一些东西，就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能接受别人意见，才能使自己进步。我们现有的文化工作者，一般说工作还仅仅入门，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8页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

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应深切了解：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

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8页  
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50页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

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3页

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

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7页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

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6页

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

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

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点混乱，好像把我们吃过的苦头忘记了。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

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5—216页

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0页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

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页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页  
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8页

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

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

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些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6—347页  
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4页  
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

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  
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

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48页

### 三、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

指导做得不充分。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7页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7—28页“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五月三日社论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文化工作缺点之写照。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

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

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6页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

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

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6—27页  
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5页  
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

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

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54页。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

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

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184页

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

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艺术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

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

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

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

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

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

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

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

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183页

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

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

贡献给人民。林彪、“四人帮”过去用反动的、腐朽的剥

削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毒化社会空气，使我们的革命传统和优良风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3页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1—182页

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13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1页

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7页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

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 四、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安定团结 坚持“双百”方针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6页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

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0—221页

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7页

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7页

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

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

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

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

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说，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还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

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47页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

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

《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

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

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有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五、老一代要发挥“传、帮、带”作用， 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

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

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7页

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

民族的爱国思想，提高其民族自

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5页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进，但毕竟还要看各个人自己是否努力。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

合表现。这种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3页

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4页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

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

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2页

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1页

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

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4—185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

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0页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  
第184页

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5—226页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

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9页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

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

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

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

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

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

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

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44页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页

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

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 党在组织战线和 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这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大家讨论通过了。这是一个好的文件，我完全同意。会后还要讨论一下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我想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说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整党不能走过场。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但是，我们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当然，其他几类人的问题，不解决也很危险，也是祸根。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好多老共产党员很感忧虑，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对整党寄予极大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上述那些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绝对不能走过场，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失望。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

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忱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整党中，对于上述的“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对于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作出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作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整党中需要作组织处理的，在全党，只是极少数。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今天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

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

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于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

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

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

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目前

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如同在整党中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样，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了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

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们党真

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说，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还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

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

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加上全面整党的展开，这方面的现状就一定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今天，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同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艺事业，这是一件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四”时期就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老一辈文艺家；有“五四”以后，在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文艺家；有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家；也有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文艺家。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中的文艺家。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代表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艺术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林彪、“四人帮”过去用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毒化社会空气，使我们的革命传统和优良风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

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

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妍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次大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同志们是带着自己的丰硕成果来出席大会的。我们相信，大会以后，同志们一定会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谨祝大会圆满成功！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9—186页

##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

## 第一章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成熟的政治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断，是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发表的；他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种种认识和看法，都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格局出发提出来、并作为这一宏观格局的一个侧面来阐述的；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邓小平文艺思想所体现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和发展艺术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它在思想方法上的求是、务实、创新、开放和重视矛盾特殊性的特色，它对马列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都正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气度和风采。

因而，只有将邓小平文艺思想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系中来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它丰富的内涵，深刻的精神实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

## 第一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近 100 多年的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学说和社会运动到建立社会制度，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则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又一新的标志，它标志着传统模式社会主义正向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转变（当然，这个新的转变还远没有完成）。这个转变既是革命性的发展，又是原则性的坚持。从社会主义体制上看，正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变革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但从基本制度上看，我们又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像魔术一样呼唤出空前的生产力，创造出空前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资产阶级利用资本雇佣无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劳动的剩余价值，攫取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形成两极分化。这不仅使资产阶级平等、自由、民主的口号走向反面，而且最终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要前进，要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只要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科学社会主义就仍然有着无可争辩的价值和不可遏止的活力。即使资本主义矛盾被解决了，进入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分析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方法。

然而，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就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使命、不同国情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自己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创造自己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飞跃，不断把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阶段。列宁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63 页。

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在科学分析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把理论置于现实基础之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的科学对自身的根本要求。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根本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回答当代所提出的新课题，从而使这门科学不断得到发展的。

列宁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革命的胜利。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具体结论，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 20 世纪初叶的世界历史进程和俄国的具体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写下了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他指出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世界市场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不平衡，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可能首先冲破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这个薄弱环节就是当时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沙俄。按照马克思当年的阶级分析，认为农民是一个保守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力量。但列宁从俄国的国情出发指出，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联合贫苦农民进行城市武装起义，可以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1917 年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检验了列宁理论的正确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揭开了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一页。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二三十年代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国家极度贫困、人民求生存求温饱等具体条件相结合，写下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名著，创立了后来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但 30 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经济奇迹”，40 年代经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考验以及战后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经济的迅速复苏，使苏联国力跃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联实践相结合的巨大成果。那以后，世界和苏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新的科技革命兴起，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经济越过了温饱阶段，人民要求小康和富裕。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它的缺陷。这就要求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实际相结合，及时提出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继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伟大飞跃。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代工业很少，社会化大生产程度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千分之几，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走怎样的路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指出，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要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归宿。中国也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长期武装斗争的道路。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全党对此逐步形成共识。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了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我们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苏联的经验是唯一可以借鉴的范例，因此一度照搬了苏联的模式。毛泽东从实践中感受到照搬的弊病，曾经试图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总之，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建设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且开始了许多有益的实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正确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以致发生了“大跃进”的过热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选择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思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所阐述的：“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总的说来还需要很好地探索。”我们夺取政权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当时当地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一重大任务历史地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身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是邓小平同志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经验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50年代的探索，因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挫折。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9年3月，

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从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基本国情出发，提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起来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些要点，进行了概括和阐述。随后，邓小平同志将这段时间的探索进一步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结论，并得到党的十二大的一致肯定。这标志着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大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为 12 个方面，表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进一步系统化。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总结过去十多年的实践经验，继续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将这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 12 条原则。1992 年 10 月 12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条主要内容，并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党的指导地位。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收集了邓小平同志 1982 年 9 月至 1992 年 2 月的 10 年间的重要文章和讲话。这是学习和把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好教材和最有力武器。认真学习这部光辉的著作，将使我们这一理论体系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认识，也将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内在联系，并在这一理论的总格局中加深对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理解。

## 第二节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同时，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10项主要任务提出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力地推动着我国人民解放思想、开阔眼界、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焕发出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论述中，专门谈到了文化、文艺问题，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要重视社会效益，鼓励作品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工作。”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将宣传文化问题作为专门的一条（第十部分（49）条），作为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领导的一个内容。这样，邓小平文艺思想就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提了出来；新时期的文艺事业，也就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实践着。

我们说邓小平文艺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首先表现在，邓小平同志从来总是将文艺问题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来论述，总是将文艺事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来对待。他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论述有两个重点：一是文艺要坚持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创作要着力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二是文艺要有中国特色，要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概念，号召作家“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并赞扬一些文艺作品中流露出的“社会主义倾向”。列宁反复强调文艺是党的文艺，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他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指出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认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

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

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同时指出，文艺属于上层建筑，要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服务，并能动地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

---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848页。

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有关问题时，从来不脱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的实践作孤立的论述，他总是首先强调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方向，强调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反映、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他将文艺看成是党的思想战线的一部分，从而纳入党领导的总体事业中予以关注。他要求：“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自然，他也充分考虑到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一部分的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反复强调要重视文艺特点，尊重文艺规律，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但是，尊重这种特殊规律，只是为了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特殊作用，例如以审美形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生活和时代新人，例如社会美育的作用。这一切都立足于、最后又归结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我们说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表现在，邓小平是将文艺的建设、创作的繁荣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这一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主要通过三个“并提”体现出来，这便是明确地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提；明确地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清除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并提；明确地将文艺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和社会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并提。

关于第一个“并提”。“党的十三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提，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将它作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四项政治保证之一，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了纲领性。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两手抓，……这两只手都要硬。”文艺就这样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而纳入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总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69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纲领》，见198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第5版。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格局。

文艺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受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又能动地服务于自己的基础。这个功能，使文艺的发展进程具有了历史阶段性，比如封建时代的文艺，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每一个发展阶段，就其总体看，都有质的规定性。但文艺又有和其他上层建筑不同的地方。它不但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是现实世界的摹写，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人的精神文明水平，便成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文艺的发展，是人类思想材料、知识材料、历史材料和审美材料的积累，是人类文明的积累。这种积累，除了具有历史阶段性，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连续性、继承性。各个历史阶段艺术生产的杰出成果，作为人类文明积累的一部分，是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任意改变或被抛弃的，它们都构成了人类文明链条中闪光的一环。这些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都有所表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艺术生产的二重性，这是旧美学不可企及的。但是，如何从文艺的社会功能方面将这个思想明确、简洁地表述出来，并且变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实践方针，则是历史交给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现在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部分，而精神文明（也包括文艺在内）不仅是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手段，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反复强调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将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能够比较科学地反映文艺的二重性。它既以“社会主义”这个质，规定了新时期文艺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又以“精神文明”这个更广阔的范畴，将社会主义文艺和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后面这一点虽然不是以实现某种具体的社会功利为目的，却是社会主义新人所必备的条件。

关于第二个“并提”。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首先将清除资本主义精神污染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并提出来。他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指出这主要是指理论和文艺战线。他肯定了理论界、文艺界的成绩，又指出还存在精神污染现象。比如，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不够多；对“二为”口号、党的文艺方向表示淡漠；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的英雄业绩，缺少表现和歌颂的热情；对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问题，很少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提高群众的认识；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胡编乱造的东西；有的人鼓吹西方现代派思潮，宣扬表现自我、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个别作品还宣扬色情；“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也有所传播，等等。1986年，他又强调：“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断，不仅切合新时期思想文化战线的实际，而且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更丰富、更完善，更具有战斗力。它指出了“清除”是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辩证地处理好清除和建设、破和立的关系，有利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6页。

于防止那种只看到建设而忽视清除，甚至把旧的、丑的东西当作新事物来立的倾向；也有利于防止只看到清除而忽视建设，忽视在清除污染的同时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偏向。这样，就将文艺工作纳入了从思想上、精神上维护社会主义、升华民族文化的轨道，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是在对新时期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战线形势作出正确分析后提出来的，抓住了当前文艺问题的根本，并且从社会精神生活进程和政治思想性质上作了透辟的分析。同时，他总结了新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战线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主要方法和有关政策，既严肃坚决，又分清了两类矛盾，考虑到了文艺这种精神生产的特殊性。这对党在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善对文艺的领导，如何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文艺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发展，意义都是巨大的。

关于第三个“并提”。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明确将文艺描写新人和社会培养新人并提，将这两个任务联系到一起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来。他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对文艺如何通过本身的规律和特点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作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他论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指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这就通过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把作家的艺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结合了起来，而且把文艺描写和培养新人的问题，纳入了我们党两个文明建设总的战略设想。

无论是文艺描写新人问题，还是社会培养新人问题，都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

已作过论述。但是，将这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提出来，将新人问题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的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并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论述它，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我们说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表现在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对文艺的领导方法，将文艺的领导、管理和创作的组织引导，统一纳入我国现行的党、政、群组织工作系统之中。党要管文艺是他一贯的思想。他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一个迫切的任务。”这种领导，是政治思想上的，要深入到文学艺术事业的每个环节中去。

首先，要抓人才，抓队伍建设。他希望“文艺工作者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

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

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他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时代生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

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文艺工作者的素质是最终决定作品思想艺术质量的因素。

其次，要对创作题材作宏观规划，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趣味作宏观引导。他认为文艺的天地十分广阔，首先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同时还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这也就是后来归纳的“提倡主旋律、坚持多样化”这样一个口号。

再次，是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检验，鼓励、宣传好作品，批评坏作品，开展学术和艺术研讨，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错误的观点，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和学术批判。在开展文艺批评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

最后，他还从党的文艺事业的全局出发，反复强调文艺界在社会主义原则精神基础上的加强安定团结。“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不仅有利于文艺的繁荣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邓小平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种种认识和看法，都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格局出发提出来、并作为这一宏观格局的一个侧面来阐述的。邓小平文艺思想，是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18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第三节邓小平文艺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的一致性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想在为人民的基本出发点上，在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上，在发展生产力（包括艺术生产力）的基本目的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我们起码可以从下述四方面表述：

第一，都以人民为基本出发点，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宗旨，体现出彻底的人民性。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文艺的根本方针。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思考和决策，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判断标准，坚持在社会实践（也包括艺术实践）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文艺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决策思想的人民性。他总是强调党的各项决策（包括文艺决策）和决策的执行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曾经深刻他说过：“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他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一问题时，明确地说，中国10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他就这样把我们党引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决策和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联系起来

了。

在论述和决策文艺问题时也是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被林彪、“四人帮”搅得混乱不堪的文艺方针政策，面对极“左”思潮对文艺界的影响，他代表党中央在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从人民利益的基点上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作用：“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我们的文艺要“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并且反复重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基本方针。这都体现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人民性。

其次，判断标准的人民性。邓小平总是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以及人民群众拥护与否作为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决策（包括文艺决策）、各方面问题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184页。

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既从决策思想上，又从判断标准上坚持人民性，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动机与效果上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曾经就这个判断标准问题作过多次讲话，其中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79年，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第二次是在1983年，他强调：“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第三次是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反复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1992年春的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还更加明确地指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种处处以人民之忧而忧、以人民之乐而乐的思想感情，反映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感情基础。

在论述文艺问题时，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强调，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要由人民群众来判断，要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他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号召文艺创作，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引导人民提高觉悟，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再次，社会实践的人民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贯要求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善于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力。“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解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回顾了党中央和他本人支持农民群众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兴办乡镇企业的新生事物的过程，深有感触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实践思想方面人民性的集中体现。

在阐述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深刻思想。他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

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鲜明地体现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民实践观。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相应的发展变化，但我们党的人民观，我们各项政策方针的人民性不会变，我们的文艺和文艺家与人民群众、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不会变，它们带上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向着更科学、更深刻的层次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市场的一般共性，又有着社会主义的制度特性。后者主要是党的领导，公有制的基础，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最基本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度特性归结起来，不是别的，正是“为人民”三个字。“为人民”的特性，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处理民族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在处理市场的自发性、后发性和计划的调控性、预测性的关系上，在刺激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效益的关系上，能够超越市场一般共性带来的局限。这也应该是社会主义“二为”方向对艺术市场应该起到的调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在“为人民”这一根本点上相契合的。

随着整个社会生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越来越多的群众介入市场经济，生活的新动向将会通过文化市场产生一种动力和压力，促使文艺家在原有生活积累和创作方向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兴趣、更多的精力去深入生活新的历史进程，发掘我们民族新的文化品格，熟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格局中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市场将会以一种不容讨价还价的力量，促进文艺家和新的群众生活相结合。而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生活最密集的信息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人生、感情、心理最密集的信息中心，这又为文艺家观察社会、深入人民提供了最好的窗口和渠道。

我们过去大多从文艺家选择人民的角度，来理解、实践文艺的人民方向，这无疑是有历史主义的，又不能不带着相当的道德色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当代生活的辐射和渗透，在文艺家与人民的关系中，除了历史主义基础上的道德精神中介，又增加了历史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介。也可以说，在以提倡、教育为前提的弹性选择之外，又增加了市场功能的强制选择。作家出于一种理想和道德精神选择人民，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人民通过市场选择作家。这是人民与文艺家关系中历史主体转移的真正实现。“人民是文艺的主人”这个命题，将在新的意义上得到确认。

市场的平等竞争，有利于“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全面贯彻落实。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之“放”、百家争鸣之“争”，和市场经济开放搞活之“放”、公平竞争之“争”，形成内在的同构。这种同构的合力，将使“双百”方针在最大限度上摆脱各种行政的、人事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心理的干扰影响，得到切实而稳定的贯彻。

人民对文艺的评价，群众的文艺批评，由于纳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在以解释、品味、评断、引导为主的弹性批评之外，增加了市场这个灵敏的社会显示器。群众的意见在转化为市场选择之后将难以拂逆。文艺批评大踏步走出文艺圈，成为社会的批评。专业批评由于在市场格局中的自我整合，也会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而具有新的力量。

市场的动态选择机制将对文艺创作的竞争作深层启动。群众认可的人才和作品将冲破种种板结层，得到发掘、成长。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群众之中的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那些文坛的未名人，在得到市场所赐予的公平竞争机遇后，将会在群众的呼唤中脱颖而出。

第二，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原则，体现出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

队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走自己的路，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出现各种失误，归根结蒂，是由于脱离了我国社会实际。一方面，对阶级斗争状况和阶级斗争比重的估计不符实际，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及其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在经济建设上一再搞高指标，急于求成。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三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且搞所有制的不断升格。在管理体制上又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总战略上符合了中国的实际。接着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关键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特色来自中国的实际，来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践和创造。

15年来，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改变了过去急于求成搞高指标的做法，制定了分三步走，先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再达到小康，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中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实际出发，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实际出发，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在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反映了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实际”是一个动态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各方面的条件有了较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然会有某些新的表现。“中国特色”又是就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整体而言的。对某一局部地区来说，在充分考虑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还要认真考虑本地区的特点，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甚至探索带有本地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如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多姿多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综

合。

邓小平同志文艺思想充分体现着这种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从当代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提出，不要再提战争年代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政治上拨乱反正、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根据新的实际对各项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他指出：“当前，各

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他根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不但为一大批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平反了冤假错案，解放一大批被禁锢的艺术品，而且纠正了极“左”思潮对文艺工作者的歧视，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热情地肯定“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

第三，都充溢着解放思想、发展更新的创造活力，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开放性。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毅然抛弃了“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抓住了现代化这个当代中国最重大、最紧迫的时代主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不顾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提出必须以现代化为大局。他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他不仅率先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对中国的现代化如何搞，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性的特点，集中地通过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体现出来。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高度一体化的时代。现代国家不开放，就会被时代所淘汰。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开放，包括三方面，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是对前苏联东欧的开放，一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对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性变革，使中国大地在短短几年中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外资引进、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 and 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劳务输出和智力引进，等等等等。而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活力的，便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创造性的发展变革，都使我国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活跃而又稳定地向现代的、开放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宝贵财富。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8页。

邓小平文艺思想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结出的丰硕成果，洋溢着发展更新的创造活力，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开放特点。从前面的例论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对文艺与生活、文艺家与人民的关系，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和特殊规律，对文艺形势的估价和

文艺队伍的培养，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各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见解和阐述。充分地体现出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创造更新的活力，

第四，都闪射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彩，既体现了思维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又特别重视矛盾的特殊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邓小平同志新的治国思维方式。这种治国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前面谈到的始终站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立场上，坚持民族和人民本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治国新思维的参照系，则是坚持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很少看到那种狭隘的“纵比”，即超过我们自己历史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更多地是宏观的“横比”，即从现代化的角度、世界的角度、未来的角度来分析、衡量中国的现实，规划与筹谋中国的未来。这样一种思维参照系，使他具有了一种对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他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民族的发展和出路问题，是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振兴的问题。新中国40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和过去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世界的角度、现代化的角度看，民族的出路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因而在规划未来时，他始终瞄准着世界发达国家，强调本世纪末翻两番，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正是这种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治国新思维，使他将社会主义第一位的任务确定为发展生产力，确定为振兴中国，为人类、为历史做贡献。这种战略性的宏观整体的治国思维，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当代世界的进步、人类历史的进程接轨。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但处处从当代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出发，而且特别注重我们自己国家和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矛盾特殊性。重视并切实解决矛盾的特殊性，是邓小平同志治国新思维的侧重点。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情、中国民情和中国史情的特殊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特有的国情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这些特殊矛盾，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理论。正是抓住并解决当代世界新的矛盾和矛盾演化的新特点，抓住并解决当代中国新的矛盾和矛盾演化的新特点，使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的治国新思维，在邓小平文艺思想中也有充分体现。将发展艺术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出作品、出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财富；从古今中外的文化精华中汲取营养；在宏观整体地论述文化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侧重解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发展中的新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邓小平文艺思想在思维出发点、思维参照系、思维侧重点上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刻的一致性。

## 第二章邓小平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的学说所作的创造性发展和开创性实践，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宝库，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突破性的发展。因此，他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第一节邓小平文艺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要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科学价值，就必须较为宏观地考察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历史的基本趋向，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无不是站在历史的前沿，从整体把握人类命运出发，来思考和建构自己的学说的。

“二战”以后，最引世人瞩目的，就是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事实，曾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惊恐与不安。任何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与兴旺，都是对旧制度的挑战，意味着旧制度的危机的到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兴旺发达，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看到了希望，纷纷独立自主，第三世界骤然崛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曾不遗余力地鼓噪着反社会主义的滥调，却不能不睁眼面对新的世界现实，由不承认到承认，再到冷静地思考战略性的对策。这期间值得认真分析的重大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不少，但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我们只需简单明白地指出，由于上述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实际的国际影响，东西方人的整体心态有着显著的差异。西方人在挫折与危机面前，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冷静寓于恐惧，而东方人（主要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成功与胜利面前，其政治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热情中充满自信。西方的恐惧型冷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面的批判，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现，虽然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羞于谈及这种对立面的启示，但人们仍然能从“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不少新学科中，从他们对其制度的内部调整、更新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西方人的恐惧型冷静和体制内部的调整、更新，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完全停止，特别是高科技总体上的领先，仍使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发达优势。东方人的自信型热情并不意味着没有科学的冷静，而是说从总体上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急切地想在短时期内赶“英”超“美”，建成社会主义，因而，对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多地看到其优越性，而忽视它在体制上尚存的某种弊端，其更新和完善新体制的意向比较淡漠。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作过一些有益地探索，但是被“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了。然而，体制上的某些弊端不是静止状态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掩盖的，它会发展、膨胀、直至惩罚人，使其认识到它的存在。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是最早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灾难和不幸，对他个人来说，也不例外。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使他从世界格局上看清楚、看准确了社会主义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严重地影响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他清醒地把握住了人类历史的基本趋向：“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因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短时期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存。“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后，他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倡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直到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邓小平同志是站在历史的前沿，从整体把握人类命运出发，来构想他的社会主义改革蓝图的。他的目的是要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从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对文艺基本规律的一种科学的发现和阐释。它作为一种学说，其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必然处于丰富、发展和不断更新的状态中。在它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整个文艺理论的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的经典作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

社会主义的中国，其文艺事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繁荣发展起来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是与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体制上的某些弊端和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某些失误，必然会给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带来危害。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文艺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灵魂，他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经典著作，实践充分表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建树的功绩是载入史册的，不可磨灭的。正是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文艺生产力曾经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通过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完全结合”，把文艺生产力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文艺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文艺的生产力提高到一个与“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相比的崭新的高度；通过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把有利于发展革命文艺生产力的作家、艺术家们团结了起来；通过普及与提高，把艺术家的文艺与群众的文艺结合起来，为革命文艺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途径，等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正如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一样，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同样并没有穷尽文艺的真理。尤其是，在毛泽东后期的错误中，也同样包括着对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上的失误。这种失误，曾经造成了对我国文艺生产力正常发展的影响。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视野里，文艺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对于它的态度、方针和政策，总是与对人类历史的演进的透视，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全和巩固，与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趋向的把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他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由闭关锁国的保守态势一转为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姿态，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一方面狠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拨乱反正，更新观念，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调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整了文艺政策。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并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这是他准确把握人类历史的基本趋向，并结合国际、国内的具体实际，坚定不移地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所获得的辉煌成就。我们研究和思考邓小平文艺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就应该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出发。

## 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时期的杰出代表，列宁和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杰出代表，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名字都各标志着一个时代。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所面临的政治舞台是“文化大革命”中建构起来的，它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极其严重，简言之，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政治舞台。别的方面且不说，仅就文艺领域来讲，“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成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可以说，当时摆在邓小平这样一位极富开拓精神的政治家面前的道路几乎是无可选择的，他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闯出一条中兴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在文艺领域里也只能是这样。

科学地评价毛泽东，这是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前进的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以它为出发点的。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解放文艺生产力的一面作了全面科学的继承，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作了应有的发展。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辞》时首先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历史的发展看，要真正把这种“改革”、“完善”、“发展”变为现实，在中国还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还需要经过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得以顺利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政治制度完善了，解决文艺事业走向兴旺发达中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既主动合理，又快速准确。这是为大量事实所确证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

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风尚、文化价值，均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在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的转型与变动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高尚、多样了，其审美情趣、审美需要将会极大地丰富起来，这就为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广阔而又丰腴的现实土壤。邓小平同志面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阐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时，首先着眼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深刻的道理恐怕就在于此。

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的法制，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针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提出的。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这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封建帝王的“朕即国家”、“朕即法”的专制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时的深文周纳，魏晋的非所宜言，唐代的罗织经，清王朝的文字狱，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无一不与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相联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所搞的那一套以“揪叛、特、顽”为名，行迫害革命老干部之实，打出彻底摧毁“文艺黑线”的旗号，无端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又何尝不是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祟呢！当代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早从自身生存的切实感受中，意识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需要的紧迫性了，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并在他的关注下逐步着手加以解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是深请民心民情的。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诸多论述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其思路已经程度不同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但其真正明确地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在理论上进行阐述，而且大胆地付诸实践的是邓小平同志。因此，这不是一般的领袖与群众精神上息息相通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更坚定地在更高层次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想了。当然，这也表明邓小平同志作为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是精通和尊重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将为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良好的文化环境，必将极大地调动其创作积极性；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既有力地保障了作家艺术家的应有权利，也有利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应尽的神圣义务。民主与法制，两者相辅相成，必将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其次提出了“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问题，他主张“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他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还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实质上是要确定文艺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人的地位。

上述见解，早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们也以不同的方式陈述过，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明确的语气，从“保证”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的角度强调要充分发挥艺术家的聪明才智，却始于邓小平同志。实实在在他讲，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一种是非主人状态下的发挥聪明才智，比如，对主人忠实的奴仆，如果他智力正常或天赋较高，甚或身怀绝技，只要主人需要，他的聪明才智都会充分施展出来的。我国古代有“养士之风”，随之也就倡“士为知己者死”之德，其中不少“士”只要主人以礼待之，便会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奉献出来。再一种就是主人状态下的发挥聪明才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承认人的自主意识，把人当作主体看，强调人在认识上的能动性和实践上的创造性，鼓励人在个人价值序列与社会价值序列一致的基础上的自我实现。一句话，承认人是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邓小平同志的主张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的这番话，既是给艺术家们讲的，也是对各级领导同志讲的。为了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必须认识文艺工作的特殊性，它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有关文艺工作的特殊问题，“只能由”艺术家去探索，“不要横加干涉”，“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文艺工作、对艺术家的尊重和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了对领导文艺工作简单化的粗暴行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人们也会记得，列宁也讲过类似的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是1905年列宁讲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还要重申这个道理呢？重申自然不是重复，它里面蕴含着让艺术家以主人的姿态去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的新意，这无疑是一种发展。但重申也表明了真正让艺术家在文艺领域“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是不容易的，这里有观念的转变、经验的积累、历史教训的科学记取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由此我们就更能进一步认识到保证艺术家主人地位的重要性了。

关于“两个自由”，即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更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从理论上来说，“两个自由”的阐明，的确解决了艺术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问题。仅就理论发展而言，“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就抓住了理论突破的关键。人类的理论史、艺术史，是一个由“积淀”到“突破”，由“再积淀”到“再突破”的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当紧的是三点：一是任何理论体系如果只是在封闭状态下自我积淀，那只能给它带来可怕的情性和难以克服的危机。扭转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变封闭系统为开放系统，大胆引进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范畴与原理，通过不断构成新的或破坏旧的组成成分来突破封闭性的积淀，产生新陈代谢。二是引进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范畴与原理并不是任意的突破，它必须与本系统内部的非平衡的稳定结构相适应。所谓非平衡的稳定结构，是指决定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性质的核心因素所形成的结构，它既是稳定的，否则这一理论体系的质的规定性就变了；也是非平衡的，正因为是非平衡的，体系本身才有可容纳性和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引进的东西还需借助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才能使系统向着更新的有序结构演化。通俗地讲，被引进的东西必须经过研究者根据本理论体系的性质、性能对其加以切磋、

辨析、研究、改造和综合，才能真正起到理论的突破作用。三是要重视个体性突破的意义和价值，它虽然不易却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上述这三点，如果没有“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实现，理论也就不可能突破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上解决了“自由讨论”的问题，是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其它的学科理论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道路和方法，这个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从实践上来说，“两个自由”的实现，是非常艰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实践上真正解决“两个自由”的问题，不仅还需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而且也与干部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形势有关。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去做，即使是逐步的，甚至是从较低层次的“两个自由”做起，社会主义的文艺繁荣与发展的前途就是光明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着，它给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把重点放在接受人民的教育上。他说：“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结合上面谈到的确立文艺家主人地位的思想来看，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接受人民的教育，是从做一个合格的文艺家所应具备的创造能力着眼的，是从完善和提升作家艺术家的整体艺术素养着眼的。在南方考察时，谈及学习他还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可见，学是为了用，在学与用的结合中不断提高人的能力，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着重从提高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能力和艺术素养这个角度要求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这是完全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一般地看，不稳定性和创造性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创造性不必多讲，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不稳定性倒是应该稍稍展开一下。现代科学的近期发现促使我们承认，有些东西是可以预测的，有些东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决定论所碰到的困难。当人们处于不能准确地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境遇中，他们就必须更慎重、更细心地对待周围世界。事物的不稳定性总是与不可预测性联系在一起的。宏观地看，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微观地看，作为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与外在物理世界根本不同，因而柏格森所以说：我以为创新的冲动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于是，一切个人的乃至社会的交往，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包含着对未来不确定感的表达；另外，人的精神活动具有两重性：平衡性与不平衡性，从事文艺创造活动的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更多地呈现出不平衡性，而不平衡性既可导致无序，也可导致有序，而且可能形成独特状况。不平衡性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它与艺术家的创造能力有密切联系，并有可能使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爆发出奇异的创造。文艺家精神活动的不平衡结构，使得他们的艺术实践的轨迹呈现出不稳定性，让人难以预测。一个不稳定性的世界，意味着尽管我们可能知道算到无数位小数点的初始条件，但未来仍是不可预测的。不稳定性呼唤一种新理性，即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结束那种迷信绝对控制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显然是注意到了文艺发展的这种不稳定性，所以才更加重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辨力，从而，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好地用自己的才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把人民放在教育文艺工作者的崇高地位，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气度和胸襟的表现。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他告诫人们，人民是母亲，是母亲就先得在感情上实实在在地当母亲对待，敬重她，亲近她，不能是形式上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的教育和其所提供的营养。邓小平同志把艺术家的艺术生命看成是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对艺术家来说，这是最深切的理解和关怀。艺术生命和艺术家的生命从物理时间概念上讲不是等值的，有出息的艺术家们总是想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中追求一种永恒，这其实就是想使自己的艺术生命永葆青春。人类的文艺史已经证明，凡是进入人类艺术宝库的文艺作品，其艺术生命大都是恒久的。作品是艺术家的基本标志，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是恒久的，艺术家就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的关键就是艺术家所创造的文艺作品能否经受住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观念的筛选。人类没有永恒不变的审美观念，艺术家也不可能在其作品中写出一种完全适合不同时代人的审美趣味来，杰出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筛选，最根本的奥秘，就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其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的或最优秀的艺术水平，而且就其深层意蕴和情感来说，总寓有对它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人生的总体意向的独到理解和把握。而人类为了更好地、一代胜似一代地生存下去，其生存视野包括审美视野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生存的那个时代，总要寻求当代视野与传统视野的融合的最佳点，一代代的杰出文艺作品就是凭借着其本身的优势，利用人类生存视野的融合而得以流传不朽的。马克思着力肯定的“莎士比亚化”，恩格斯极力称赞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列宁深刻论述的托尔斯泰的“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多次阐明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在我们看来，就是基于上述的原理而谆谆告诫艺术家的。邓小平同志关于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于其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的观点，既继承了前代经典作家的思想，又极富时代特色地揭示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联系，其根本点倒不是让艺术家简单地、表面地与人民实现“几同”，而是在自我心灵上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沟通，真正能在其作品中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人民的心声。

邓小平同志认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并据此号召艺术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他特别指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功利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卓越代表，他的文艺功利主义思想不是单纯政治化的。他提出的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是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文学艺术事业来说，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的调整。文艺要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当然不是要求艺术家都去直接反映现代化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建设的过程，而是强调艺术家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必须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符合。这起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与现代化精神相一致的人物和事件，要从历史发展的趋向这个高度予以热情的肯定和赞颂，对违背现代化精神的现象要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对于前者，他根据“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对社会主义新人作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界定，他说“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对于后者，他明确要求批判几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理论上的意向，便不难发现其根本指向恰恰与当年那种“写”、“演”、“唱”中心的教条主义相反，与那种一味歌颂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又缺乏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思想相反，而是动员艺术家去关心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普通人的心灵变化历程，重视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所激发起的人的情感方式的演化和人际关系的重构，甚至去探索未来的新的社会文化心态。这里重要的是要求作家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真正解放。因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以及世界历史格局的演变，迫使普通人不能不对人生价值做认真的选择，伴随着这种选择的是既定的社会价值序列与个人的价值序列的矛盾冲突，其结果是人际间的意义世界呈多元状态，矛盾错综复杂，彼此间的价值人格既矛盾又统一。面对这种状况，艺术家们的自我心灵如果解放度不高，对人类历史的走向缺乏一种相对明晰的感受，他就无法去用艺术的方式裁决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正确与错误，也无法对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情感方式、性格冲突作出逼近真理的审美判断，更无法保证自己的审美批判的锋芒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特别是，在本世纪末，就世界范围看，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相继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在发展的时刻，人类向何处去？历史的走向指向何处？几乎全世界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论其政治态度、人生信仰如何，都在思考，这是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文学艺术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建设人，为了使人能够在自身的提升中，愈来愈获得真正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全面发展，艺术家们能不冷静科学地思考这些问题么！应该说，严峻的现实实际上早已把艺术家必须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真正解放的紧迫性昭示出来了。有必要说明的，是，当西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欢呼庆贺的时候，同样是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承认这种挫折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一个世纪人类的精神走向，但是，他们也明确指出，真正缺少了与西方工业文明对立的一极，对西方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对人类前途也未必都是福音，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征服力量也未必会因此而削弱，它只会激发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持这种看法的西方思想家们，是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的，他们的心灵解放度也比较高，并没有为他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里的那种几乎是覆盖性的传统偏见所束缚。我们的艺术家难道不应具有自己的历史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解放吗？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方视察时说：“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他特别针对人们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惑，尖锐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强调的历史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解放，就是以邓小平同志所阐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思想基础的。就是要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这个前沿来观察世界的。要说自我心灵解放，首先就应从邓小平同志要求文艺家与之进行长期有效斗争的那几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中解放出来，其次，也应该从过去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解上的肤浅与偏差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总格局中来论述的，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其主要理论特色是：

一、把解放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同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结合起来；

二、强调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繁荣与发展的保证作用；

三、重视文艺创作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重视艺术理论上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四、认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最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五、尊重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文艺事业中的应有地位，主张文艺家的艺术生命必须植根于人民的精神需求之中；

六、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批评标准，提倡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服务，并以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

七、加强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建设，号召文艺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艺术素养。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富有生命力的，从 19 世纪末恩格斯提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开始，到今天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它的发展历经了艰难曲折，但却总是在前进、在更新。它以审美的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对自己至今仍然存在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批判或反思，提供了真正合于人的本质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憧憬和向往。这是已经载入人类艺术史册的。今后，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邓小平文艺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定会更加灿烂夺目。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38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4 页。

### 第三章邓小平文艺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时代变化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剧变的产物，也是从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文化正在经历的创造性转化的巨大思想成果。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纲领和科学指南，并且推动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沿着正确轨道胜利进行。

作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组成的邓小平文艺思想同样地既是我国文化正在进行的创造性转化的历史与现实活动的产物，同时也将在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思想威力。这不仅是逻辑的推理，更为我国文化现阶段运行机制的生动实践所证明。

## 第一节邓小平文艺思想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推动力

邓小平同志一贯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一个全面理解，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政体，是一个政治界定，那么，发展生产力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就指的是经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追求。这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来认识的。显然，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子系统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总系统。

邓小平同志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之后，深刻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总课题，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把文化提到与政治、经济并举的高度，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内考察，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三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毅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提出过“开放性的社会主义”概念，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应“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不如此，“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主动打破国际资本的封锁而进入世界历史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战略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历经痛苦后的勇敢选择，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和科学发展。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抓经济建设，而是必然地要带动文化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文化，这无疑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辩证观点。

第二个转变是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页。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就向全国人民提出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其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十分重视教育，提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正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关于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特别是劳动者素质的论断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应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的具体化和新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在 1979 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十多年来，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国实现了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积累了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这更促使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0 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视察南方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动态形式的理论，为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影响到文化的发展，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机制。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上述三个历史性转变的理论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文化进入了创造性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必须看到这一转移、变化，这一文化转化的到来不是偶然的。如前文所述它是世界进入 20 世纪、21 世纪之交的时代必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数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历史必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必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 error，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8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64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在变。”

首先，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对世界格局进行了科学的总体把握，并在这一基础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后，对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的又一重要理论概括，对我们正确认识时代特征，把握世界局势，研究对策，提供了科学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战争与革命的形势。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主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而不仅仅只是解放生产力。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告诫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把发展生产力的紧迫性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其次，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透彻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40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1981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一概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不发达”。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对“初级阶段”再次进行了阐述，其后，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进行了系统阐述，深刻指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根本一条”、“第一任务”。

再次，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总体设计，提出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即“三步走”的战略。

1979年邓小平同志与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提出了著名的“小康”设想，其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指导下，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具体确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丰富了“小康”设想，对“三步走”予以了全面论述。毫无疑问，这个“三步走”的设想，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仅指的是经济发展，同时还包涵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搞两个文明，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即必须抓好两个文明建设。显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属于大文化概念。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毫无疑问，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上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共产主义必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证的重要观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更多地注重经济速度与科学力量。20世纪中叶，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对这种传统的发展价值观提出了怀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种种困惑。如工业化本身所带来的生态平衡破坏、生存环境污染，对传统文化的侵蚀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目睹了：正是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人们自己带来了深重灾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拉越大，发展中国家寻找适合本民族社会发展模式的呼声也因此越来越高。7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一严峻的时代挑战面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经典进化论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转变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荷兰经济学家让·廷伯根认为，每个国家在现时代要想获得有成效的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在规划和建设未来方面用自己的力量；二、根据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来确定发展的方向；三、确立人与环境的健康发展。他的这一论点，明显突破了狭隘经济学的发展视野，强调了发展的自主性，个体需要的培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这种对于社会发展内涵的全面论述，无疑有重大意义。当代西方不少思想家、哲学家都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发展必须充分重视文化的价值、文化的增长。现代化的根本内涵应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文化生活有机协调发展。现代人的日常事务（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必须与他的精神追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的主张，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它不仅与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观即强调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文化价值是一致的，而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真正体现了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地位的要求。正是邓小平同志在70年代末就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力发展教育的号召，发出了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号召。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1985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思想，都可以纳入他的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范畴，充分体现了他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强调文化含量的总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倡一种大教育的观念，认为必须把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文化进入了创造性转化的新的历史阶段。

回顾我国文化发展的近、现代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历尽曲折，却始终是在告别古典主义，增强现代意识，追赶世界潮流，逐渐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整个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明显的整体特征，以激烈的方式实现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括》中曾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的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过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二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从更高层次上，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负面、消极面予以了彻底批判，吸纳并实践了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以求在更高层次上，更为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实现理性批判和价值重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我国的文化同政治与思想等领域一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逐渐结合过程，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由于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文化蜕变。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近现代中国文化转变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一代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下，开始了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全新过程。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观念及社会主义文化设施的广泛建立与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但是，由于50年代中期以后“左”的错误逐渐占了上风，并在“文化大革命”中愈演愈烈，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严重影响下，也出现了偏差与错误。这主要表现为将传统文化看作一团漆黑，将古代文化简单地等同为封建文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一概排斥与否定的态度与

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新生。经济、政治、思想三个层面的全方位改革，以高度的民族自信推动对外开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了新的时代精神与价值烙印。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洗礼，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人们普遍形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应该也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大家庭中重要一员；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更新、改造中国文化，使之真正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系统；坚持辩证观念，反对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的片面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人民正在迈向世界，迈向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邓小平文艺思想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思想既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生动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武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重整体、直觉、归纳和意象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和人体全息思想等。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则以重表现、重神韵、重意象等与西方美学形成了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异同、比较在我国进入 80 年代以来日益受到文艺界、学术界、思想界广泛重视，并且努力使之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实践、理论建构相融合，而这一切正是在包括邓小平文艺思想在内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进行的；同时，我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优秀部分也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的重要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

传统文化既是指古代文化更是指现代革命文化。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早在 30 年代就已萌生，并在 40 年代的解放区茁壮成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邓小平文艺思想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论的

创造性转化，而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文艺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他都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实践出发，予以了高屋建瓴的科学概括。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同志这

一光辉论述把文艺的源泉与功能真正置于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无疑涵盖了丰富的内容。“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显然概括了一切文艺都必然地来自人

民的历史实践，并且理所应当回到人民的历史实践之中这一基本原理。正是从这一命题出发，邓小平文艺

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邓小平文艺思想也予以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深刻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

治的。”这是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

其它关于文艺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论述，关于文艺工作者的自身建设的论述，关于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论述等等，无一不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是对我国文化以及传统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 第二节弘扬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内涵，是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对于进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社会主义文化来说，邓小平同志这一科学论断，无疑是我们实现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指南。

文化也有其传统，有其源流，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传统。文化既具有历时性，又具有共时性。我们必须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文艺。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人民实现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二次创造性转化。

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了近现代史上我国文化的第三次创造性转化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文艺思想，形成了邓小平文化、文艺思想。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了解历史是为了继承历史，创造新的历史；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以保证我们民族文化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精神的推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对邓小平同志上述两段论述予以全面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继承古代文化、文艺的“好的东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艺。

必须认识，文化意识作为社会机体的内在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文化自觉是一个社会健全发展的重要前提。当然，健全的文化意识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社会条件却十分重要。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文化交流程度越正常和自觉，人们就越能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从而更有效地在文化的比较中对自己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5—20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旧有文化中的不合理性进行鉴别和改造，以增强新文化的内涵。我们正处在我国历史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提供了最好的时代机遇。从文化背景来看，我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多重文化背景，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文化批判和价值甄别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在走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既维护和发展我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又使广大群众拥有一种走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意识，这仍然是一个艰深的时代课题。事实证明，文化价值导向的紊乱必然给我们现代化步伐造成阻抑，一些西方文明发展中糟粕的东西，往往贴上现代化的标签被引进，而许多封建迷信腐朽的东西也可能死灰复燃，污染着我们的社会环境。对于这种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都予以了深刻批判。他一再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地清除精神污染，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问题上，我们必须防止和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与态度：

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将传统文化贬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一概拒斥。这种自我切断民族文化生命之河，抛弃民族文化价值之源的错误观点与做法，只能导致精神的无所依归，行为的缺乏文化价值取向，从而丧失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批判。

一种是文化上的国粹主义，抱住传统不放，固步自封，封闭保守，阻塞异质文化交流的渠道。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文化上的国粹主义与弘扬民族文化，建立民族新文化是背道而驰的。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指出：“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才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态度。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事业中，责无旁贷的任务之一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 第三节广泛吸收域外文化精华是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参照，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参照

邓小平同志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这不仅高度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内容及其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列宁早就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了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了解与改造人类文化遗产乃是完全必要的、可能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提出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长期以来，在借鉴学习域外文化遗产、文化精华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走了不少弯路。这主要表现为50年代前期片面强调向苏联学习，生搬硬套苏联模式，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又走上了相对封闭的道路。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对中外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左”的错误做法，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和灾难。

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对待域外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与邓小平同志的文化、文艺思想是分不开的。

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因此尖锐指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

己。”《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科研、文艺工作中向外国优秀东西学习的论断，无疑具有普遍意义。

在对待外国文化遗产、外国文化精华的问题上，我们既反对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反对妄自菲薄、全盘西化。

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5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这就是说，一定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其科技、文化区分开来，把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与丑恶、颓废部分区分开来。

邓小平同志谆谆告诫我们：“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我们还应当明确，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西方文化，目的仍然是也只能是为了实现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我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变，而不能是其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总之，学习和借鉴域外文化，吸收域外文化精华，继承域外文化优秀遗产，是我们实现我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参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思想僵化保守，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 第四章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进历程中的最新成果，也必然与“历史过程”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是植根于“历史过程”的深厚土壤的。那么，我们如何认识邓小平文艺思想与“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如何理解“历史过程”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提供了深厚土壤呢？我们认为，一方面，邓小平文艺思想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伟大历史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在文艺理论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文艺理论上的成果，另一方面，邓小平文艺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理论成果，是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呼唤的必然产物。

### 第一节

#### 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呼唤

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危难，也给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造成了危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加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在徘徊中艰难前进。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我们党真正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稳定发展的健康轨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文学艺术从来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战线。毛泽东同志就是在把文艺工作摆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在科学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工作实际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并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其巨大的历史作用和理论价值已为实践所反复证明。然而，毛泽东文艺思想毕竟不是终极真理，不是僵死的教条，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况且，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歪曲、篡改，它被蒙上了厚厚的污尘，在不少地方已失去了本

---

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第328—32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来面目。面对着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个严峻的重大课题也便提了出来，这便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如何坚持它的科学原理并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有所丰富和发展？如何制订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筹划和决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成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相继逝世，曾经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深深的悲痛。当时，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没有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如何继往开来，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关注的焦点。历史把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这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当然，这其中就包括着如何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科学价值，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方针和纲领。历史的重大课题落在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肩上，要求做出正确回答。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呼唤，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呼唤。

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在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中，用极大的精力来解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晚年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 error。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解决评价毛泽东同志和维护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这一重大课题的同时，着手解决另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继续探索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 50 年代以来，我们党就开始进行这一艰巨探索，其间历经磨难，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地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邓小平同志就是如此响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呼唤，响应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呼唤，正确地、科学地回答了历史提出的两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便伴随着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确认，得到

了正确评价；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便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了。

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的发表，标志着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形成，经过以后不断的丰富，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认识邓小平文艺思想与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

#### 一、邓小平文艺思想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

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

已经具备。”全会果断地做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全会的决定，也是邓小平同志的决策。

与工作着重点相联系的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认真地分析了我国30多年来阶级斗争的发展进程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明确地做出判断：我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或者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的工作不能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这一伟大的战略转变，不能不触动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当作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文艺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这种战斗性。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废弃，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同时

---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99·

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显得极为紧迫。这就形成了邓小平文艺思想产生的一个方面的现实必然性。

##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我们的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直接理论依据则是邓小平同志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and 一系列理论观点，是这些理论观点的凝练和升华。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起点的。他多次阐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改革开放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是立国之本。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生产力的路线，是一条合乎国情、顺乎民心的路线，是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理想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因而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如何在这条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前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如何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关系着新时期文艺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也便迫切地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这也便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产生的又一个方面的现实必然性。

## 三、邓小平文艺思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基本思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它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保证着物质文明的正确的发展方向。文学艺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和作用，自然会产生新的历史变化；党在领导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自然应与之相适应。这些问题，也迫切地需要予以解决。这便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产生的又一个方面的现实必然性。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现实必然性，所以我们说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伟大历史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文艺理论上的成果，邓小平同志适应时代的需要，及时回答了历史转变向文艺提出的一系列急迫课题。譬如，调整文艺政策，确定我们文艺的方向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出文艺既不从属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的论断，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等等。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同志对历史转变向文学艺术提出的急迫课题的回答是科学的、睿智的、深刻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代中国，邓小平同志是唯一能如此及时地、科学地回答这些时代课题的人，邓小平同志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继承和发展者。他的一系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论述，当之无愧地称作：邓小平文艺思想。

## 第二节

###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造而改造。”

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巨大的社会震荡，给中国人民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及人们的意识形态，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中接连发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以及历史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生活上带来的重大变迁——都给人们的意识形态以巨大的影响。

文艺是感应生活的敏感神经，属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的良方，寻找富国的道路，他们就从国外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文学作品中吸收着新的血液。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长时期形成和稳定起来的强大堡垒，是很难以一举攻破的。每当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以及军事的斗争遭受失败，总有一些知识分子从精神方面、文化方面形成的民族负累中找寻原因。他们羡慕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受益于文学艺术的启蒙，便期望中国改革和革命的成功也能够依仗文学艺术的力量。于是将文艺的重要性摆在了先于一切的位置。

就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言，革命和运动的先驱者们尽管在通过文学艺术的作用所要达到的目的上大体一致，但在对文学艺术的直接期待上却是不尽相同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为了纠集力量对付顽固的封建营垒的抗拒，革命的引路人、宣传家和作为这一斗争的同盟者的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无一例外地要求文学艺术能够为实际的政治斗争、革命任务效力。因为革命的目的是尽快地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需要文学艺术的配合和帮助，需要文学艺术能够产生直接的政治宣传效果，担任救国的使命，起到革命马前卒的作用。总而言之，基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任务、政治斗争的紧迫性，使得进步的文学艺术大都表现出皈依政治，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倾向。

但是，辛亥革命虽然给予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而革命并未取得最后成功。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吸取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他们更多地看重了国民性的改造，不少的言论中就曾提到：要取得对封建政权斗争的根本胜利，必须首先改革“阿谀、夸张、虚伪、迂腐的国民性。”他们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而关于文艺，在“五四”运动初期便有“何谓文学本义”的探讨，并且出现了“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说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要求文学直接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效力。而是通过改造国民性，通过文学与政治之间的中介——思想与道德的改造来为政治斗争效力。可见这时的文艺明显地与辛亥革命时期文艺皈

依政治不同，它是首先靠拢哲学、注重思想、道德作用，然后才服务于政治的。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政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五四”运动时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及文学艺术的更新和再造，却成了运动先驱者们首先举起的大旗。而文学具体地承担了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的先锋队的责任。因此，在文艺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中，辛亥革命时期是集中地接受着政治目的的统辖；而“五四”运动中，文学理论家们和文艺创作者们的思想就比他们的前辈开放了，尤其是在审美心理方面，具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更深一层的感悟，更多的人生意识和生命气息。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作品也更加冷静，革命的迫不及待的煽动力量不是没有，但人生的启迪性和艺术的感染力毕竟是更加浓烈。所有这些，都应当说，是不同的历史时代所赋予文学艺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生存状态的不同特点。绝非某种个人力量的有意为之，更不是某种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事物的演进和变化，包括人类历史的运行，往往都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发展的轨迹。

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与封建政权的斗争中显出他们的软弱性之后；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国的无产阶级恰逢其时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斗争依然是艰苦卓绝的。但是，无产阶级毕竟是新兴力量的代表，他们在国际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包围中使自己锻炼成长起来。在与军阀的斗争中，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与反动派的较量中，使自己壮大起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丝毫没有轻视文学艺术工作者这支革命的部队，没有丝毫放弃文学艺术这一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而且，像辛亥革命时期一样，是强调文艺直接为政治、为革命、为战争服务的。

毛泽东同志为了保证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十分重视文艺的作用。他比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都更加注重研究文化包括文艺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对于自己的压迫。在人民革命斗争中，文艺工作者一直与革命主体工、农、兵保持密切联系，并忠实地坚持文艺为革命服务的原则，始终严格地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办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示出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视。这种状况。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一直贯穿到 60 年代初中期。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中，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贫困、压迫和屈辱的命运中刚刚解放出来的年代，中国人民又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候。那时，由于生活本身天翻地覆的变化，文艺不能被这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决定性的影响着。差不多在整个 50 年代里，尤其是 50 年代初、中期，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们一直为中国人民这一新的历史命运所激动着。

在这之前，在新中国还未诞生的那些苦难的年代，人们失去了闲适和欢愉——或者投身于伟大的事业，想的是祖国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自觉自愿地失去了它；或者是反动派的压迫，求生的艰难，被迫地强制性地失去了它。总之，严峻的生活呼唤着严峻的文艺，文坛上几乎听不到对于个人命运的吟哦和惋叹，也很少听到关于爱情、友谊乃至山川景物的讴歌。人们并不感到缺少了什么。迄今为止，我们总觉得那时候文艺的秩序是正常的，文艺的钟

摆是合乎规律的摆动着的。这是特殊时期特殊生活对文艺产生的影响，从而也对文艺受众心理产生的巨大影响。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文艺上稳定、繁荣、多样化局面很难全面、持久地形成。到了“四人帮”肆虐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稳定受到很大破坏。

当然，我们绝不能否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中所取得的历史功绩。列宁曾经说过，讨论任何问题，都应当回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中，都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各时期文学艺术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们知道，大约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期开始，全世界都处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这时候，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搏斗支配着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中国也正好像一头刚刚睁开睡眼的巨狮，在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觉醒。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问题都无可争辩地以政治斗争问题为核心。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作里，就把文化问题，尤其是文艺问题，放在了相当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部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性质、方针和任务，从而也科学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战线，包括文学艺术领域革命的性质、方针和任务。这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著作。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他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在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陆乃至全世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但他同样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时代。他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曾经鼓舞了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为抗日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文艺注入了活力。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出现过不少代表着时代潮流，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翘楚之作，无疑为那个时代、那个时期矗立了一块块文学的丰碑，成了那个时期文艺精神的象征。

事实上，就世界范围而言，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起，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就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这一学说拥护者所进行的历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文艺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也成了文艺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事。恩格斯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说过：工人群众的先进分子早已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有权在文艺的“现实主义领域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文艺应当而且必须竭尽全力表现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应当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现实斗争相结合，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的基本要求之一。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曾经提出“文艺属于人民”和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继承并发扬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当时革命环境与文艺实际的需要，进一步指明了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以及文艺与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的方向、政策和道路。从解

放区文艺到十七年文艺，中国新型的作家和艺术家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然而，历史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光辉道路上，也充满了曲折和反复。

新中国建立十七年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很少有刊物，很少有出版，很少有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活动。至于这期间尚存的文艺，大都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直接控制下，成为他们阴谋活动的宣传工具的东西。被迫停笔20年后重返诗坛的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著名诗作《在浪尖上》中写道：“最残酷的迫害，最大胆的垄断，比宗教更荒唐，比谋杀更阴险。”这正是准确地勾勒出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给自己的反革命复辟扫清道路，推行“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策略，在文艺领域更是肆无忌惮地编造谎言，制造舆论，诋毁“五四”运动以后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否定新中国成立之后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以“黑八论”、“空白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等莫须有的罪名残酷迫害辛勤工作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千千万万革命文艺工作者。

新中国建立后这一空前的文化浩劫，当然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历史灾难。但是，历史的灾难必然以历史的重大进步为补偿。当中国人民从那可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便是不能不选择的改革，不能不从事的开放，不能不为中国人民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加快速度进行的腾飞。

然而，这段文艺历史的面貌及其特点，的确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就强调文艺为革命的实际斗争服务而言，它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艺特征是相通的。但从文艺服务于革命的规模和配合的程度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动员范围而言，远比辛亥革命时期深入得多。而且由于它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也吸收了“五四”文学的新特点，与辛亥革命时期文艺状况相比，它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文艺思想和实践。可是，由于执行过程中“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特别是全国结束战争状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忽视了适应新的时代特点的需要。再加上50年代后期开始，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使得文艺上单一化、整一化、概念化倾向不断发展，直到“四人帮”集团插手，将文艺工作引入歧途。这是我们不能不永远引以为戒的。

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伟大战略转变的实现，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于时序。”与这种新的时代变化相适应，文艺观念也必然产生深刻变革，文艺的自身发展也必然产生许多新的要求，诸如文艺的题材和主题的拓宽，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艺术情趣的演化，读者、观众审美期待的更新，有关文学艺术功能的观念和认识的调整和深化……等等。

关于文艺作品的题材，在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强调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文艺题材的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文艺作

品中开始注意描写我们时代的人的多方面的生活内容，而且触及了一些过去被忽视或不敢触及的领域。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易

的《办公厅主

任》、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帆篷》、何求的《新局长到来之前》、鲁彦周的《归来》、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

叫了》等小说和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抨击了干部队伍中某些欺下媚上的官僚主义，反映了某些干部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轻率态度和不道德行为，揭露了合作化初

期某些农村干部的好大喜功、违背农村实际的作法，描写了农村青年爱情生活中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等。这

些文艺作品的出现，显示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文学艺术的生机与希望。然而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文艺作品题材多样化趋势，很快便被扼杀

了。“题材决定论”在文艺界流行起来，1961年《文艺报》发表关于“题材问题”的讨论，试图重新冲破“题材决定论”的束缚，但到了“文革”中，这种正确的做法却被当作“黑八论”之一的“反题材决定论”大加笞伐，文艺创作的题材终于被引入了“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歧

途。

新时期文艺在题材领域和主题思想的开拓方面，几乎冲破了一切禁区，使得文艺创作能在人们生活的各个空间翱翔——歌颂老一辈革命家，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尖锐矛盾，反映青年及其他社会问题等等。

文艺作品中所表达的作者的审美理想、艺术趣味的演化也是相当明显的。新时期以前的文艺作品，尤其是50年代末期以后，创作者差不多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塑造英雄人物，甚至高大完美无任何缺点的英雄人物为目标。表现出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上的单一性甚至偏狭性。而新时期的文艺创作者摒弃了审美创造中的单一和偏狭，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种审美情趣、艺术视角的转移，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思想解放、政治民主空气初步形成在文学创作上的必然体现。不言而喻，老、中、青几代作家、艺术家，谁能不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呢？

读者、观众、听众审美期待的更新，艺术趣味的多样化，更是新时期文艺环境改善中令人欣喜的大好事。作者影响读者，读者也影响作者，这本来是很明显的事

实。但我们往往只注意前者，这是对的。却常常忽视甚至无视后者，即无视阅读环境对作者的左右力，这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新时期读者、观众、听众审美期待

的更新总体来说，是开放、搞活、民主空气加强的正效应。我们应该珍惜它，进一步以正确的态度和作法引导它。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

至于文学功能观念的开拓，更是令人可喜。本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对读者、观众的作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又有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但在新时期到来之前，我们却忽视甚至无视文艺多种功能的正常发挥，缺乏对文艺多种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尤其是常常不适当地强调教育一种功能，而不提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新时期的到来，不仅使人们对文艺不同功能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在注意文艺几种功能之间

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可以允许不同作品在体现文艺不同功能上有所侧重。这样一来，无疑将拓宽文艺的路子。这是我们长时期以来一直企盼的一种大好事。

然而，怎样认识、怎样评价文艺自身的这些新的变化，却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说人们的认识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一致的。于是，文艺自身也便期待着高屋建瓴的理论引导。这便形成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文艺自身发展方面的现实必然性。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深邃的、睿智的哲人目光，对文艺自身的这些新变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透辟审视，洞悉了其于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吻合性、一致性，并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和目标出发，充分地给予了肯定，早在1979年即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创作，“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作用。”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因势利导，从文艺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出发，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

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无疑为文艺观念的变革，为文艺题材和主题的拓宽，作家艺术家审美理想和艺术情趣的演化，读者观众审美期待的更新扫清了思想障碍，也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如何适应和正确引导文艺自身的变革指明了方向，提出必须掌握好的荦荦大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文艺思想适应了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期的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的理论成果，归根结蒂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

《邓小平论文艺》，第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6—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1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10页。

## 第五章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任何理论，只要是自成体系者，在其内里都必有一个为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神内核，即所谓哲学基础。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作如是观。构成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邓小平哲学思想。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总体上属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但因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及其战友，在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必然更多地带有当代的、中国的以及邓小平个人的文化特征。具体地说，邓小平的辩证唯物主义，由于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突出与反复强调，可以归结为实事求是理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实事求是理论在历史领域的推延和贯彻，由于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进而强调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地位与作用，因之，可以归结为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

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理论与人民史观，很大程度上是贯穿在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之中体现出来的。其精神要义，活生生地呈示于他在历史新时期对各条战线、各项工作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之中。下面，我们将依据邓小平同志的有关文章、谈话和批示等等，通过梳理，勾划出邓小平哲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文艺思想。

## 第一节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

1987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这样谈到他自己：“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耐人寻味的是，同年7月，他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说到这个意思：“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以上两段话，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邓小平同志对其自身的文化性格以及哲学观念的一个概括。从为数不多的传记资料看，邓小平生平最大的特点是：求实、尚用。讲实话，办实事，重实效，求实用，是其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抑或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数十年如一日所坚持的一贯风格。邓小平同志很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命题作学究式的界说，而总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生活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中，牢牢抓住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精髓”不放。对于邓小平而言，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出发点，也是其归结点。可以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本来意义上，乃是一种实事求是理论。

实事求是一词，源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也是也。”意谓河间献王治学从事实出发，重材料，重证据，结论可靠。此后，宋人刘跂、清人梁启超等也都重复使用过这一概念。他们所谓实事求是，都和班固一样，指治学态度而言。

首先把实事求是引入哲学认识论，并把它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加以提倡者，是毛泽东。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思想路线的说法。以后，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结合对主观主义的批评，多次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然而，真正从理论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定下来，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其中特别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毛泽东阐明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对我们党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理论总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78页。

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毛泽东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者，在其晚年却未能把实事求是坚持到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一思想路线。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诸如国情的把握、形势的估计，以及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上，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偏差。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与“共产风”，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错误日趋严重，到最后，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说，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以理解并且归结为倡导与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那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不能不说是背离实事求是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逝世以后，如何将实事求是路线恢复和重建起来，成为在新形势下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当务之

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在全党再度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努力，举其要者，可论列如下：

一、批判“两个凡是”论，反对不实事求是的本本主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党的指导思想还没有从沿袭已久的“左”的错误

中得以改变。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论调，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照此办

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无法纠正，毛泽东思想就无法坚持并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无法推向前进。值此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尽管尚未恢复工作，仍然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声。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尖锐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

二、在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确认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同志认为，“两个凡是”论的错误在于，只从个别字句，而没有从整个体系去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了正本清源，还毛泽东思想以本来面目，邓小平同志在批判“两个凡是”论的同时，提出了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千头万绪，如果限于一技一节，就很难对整个体系作出准确完整的理解。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转引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2页。

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他还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同志上述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一总体概括的基础。

### 三、以实事求是为尺度，大力提倡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将实事求是称作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其意在告诫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然而，由于当时许多人思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所以，要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恢复和重建，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邓小平同志就此作过分析：“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基于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邓小平同志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解放思想仅仅停留于一般号召，就容易被误解或者曲解为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随意想象。这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有过惨痛教训的。例如在1958年号召解放思想，结果刮起了浮夸风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中号召解放思想，结果造成了“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天下大乱。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创造在于，他从提出问题的一开始，就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联系，把解放思想规定在实事求是的基点上。这样，既打破了右的羁绊，又避免了“左”的错误。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解放思想的准绳和尺度，也是解放思想的全部内涵之所在。作为人的认识过程，实事求是需要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地进行下去；同样，解放思想也需要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地进行下去。这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理解。回顾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史，如果说，用实事求是概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毛泽东的功绩；那么，把解放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内涵，则应该说是邓小平同志的贡献。

### 四、支持并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

邓小平同志富于独创性地以实事求是阐释解放思想，里面涉及一个价值取向问题：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其性质以及效果如何，只能按是否实事求是来加以衡量。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在逻辑上是相互沟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当1978年夏季，由《光明日报》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文章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邓小平同志便以极大的理论兴趣，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一再肯定这个讨论的重要意义。他敏锐地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7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事隔两年之后，邓小平同志仍念念不忘于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注、支持和积极领导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才得以在全国展开。这场讨论，从理论上澄清了“两个凡是”论的谬误，深化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理解，从而成为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个浪头。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重新确立。按邓小平同志的概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这条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及其精髓的思想加以继承与总结的产物。但因为里面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经验，所以，较之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由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其内容显得更加丰富、完整，也更加明晰、系统。从邓小平同志对实事求是理论的表述中，可以分解出三个互为联系的理论命题：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指人们观察和思考问题，制订和执行政策，都应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以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为第一性。这是唯物主义的基石。它直接关涉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中隐含着存在第一性，存在是世界的本原，存在决定思维，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要求对具体事物的了解，必须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作如实的反映，从研究事物本身得出结论，揭示其内在规律，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所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它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的。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本本出发，就会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从实际出发，从“实事”中求出“是”，从事实中发现或“引出”其固有的规律，从而依照规律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直接目的和出发点，它体现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特征。第二，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是为其唯物主义本体论所规定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法。从实际出发，探求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需要有一定的理论的指导。这种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正确理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从实际出发就会变成从片面的、孤立的、表面的现象出发，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不把理论当作实际行动的指南。而看作是不受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搬用的教条，那也就谈不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做不到实事求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便是如此，“两个凡是”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本身。”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他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他说，理论“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十分重视哲学的认识论功能，密切关注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非常看重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认识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因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其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的。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即人的主观认识同事物的客观规律相符合的范畴，而判明主观同客观是否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即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把主观和客观联系、沟通起来的社会实践。具体地讲，以实践为标准，就是用实践的结果检验人们的目的、计划、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及社会需要。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个人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客观真理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往往不仅不能穷尽真理，而且会发生错误，这种错误和局限性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并在不断的实践中纠正和克服；另一方面，人们由于受社会环境及自身价值观念、道德倾向等方面的影响，对社会需要的发展趋向及时代精神的内在本质的体察和把握难免失当，出现偏离或违背社会需要的现象，而这也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发现，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纠正和修补。所以，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否则，必然会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归结点，它对其哲学的实践性起着最后的保障作用。

综上所述，实践标准既包含着客观规律即真理的外在尺度，又包含着主体需要即价值的内在尺度，这两个方面互相贯通，彼此交叉，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从而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明晰地显示出它的由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向价值论延伸的轨迹。实践标准这一命题本身并非新的理论观点，但针对当时全国思想僵化的状况而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却具有全新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十分敏锐地看到这一点，热情果断地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把这一命题纳入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中，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内容。

以上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内容与特色。如果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加以浓缩和归纳的话，那就是“实事求是”。因为三个命题的基本精神都可以在实事求是中得以体现。因之我们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的思想内容，是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前提、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途径、实践标准为根本保证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即：“实践——认识——实践”，从实践中形成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认识并用认识

指导实践。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的认识规律，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反复无穷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包含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特殊与普遍等范畴。实践——认识——实践，即由客观到主观再到客观，亦即由个别（特殊）到一般（普遍）再到个别，如此等等。至此，我们不难看出，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包含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又涉及价值论和辩证法，它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辩证法的完整结合和有机统一。

## 第二节邓小平从实事求是到人

### 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如上所述，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实践，强调实际效果；恰好西方实用主义哲学也非常重视实践及其效用。因此，有人便将二者自觉不自觉地混同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甚至曲解。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存有难以抹煞的本质区别。

首先，是实践的主体相异。任何实践都属人的主体行为。在邓小平同志那里，实践主体无疑是指社会历史的群体的人，也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则是指抽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的纯粹个人，按其代表人物杜威所称：即灵肉相统一的“有机体”。此其一也。

其二，实践活动的性质有别。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实践，是说人民群众既改造世界又改造自身，既合乎规律又合乎目的的社会活动。在中国现阶段，这种实践活动主要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西方实用主义讲实践，则是说个人适应环境的自然本能活动。正因为基于自然本能，所以，它是被动的，谈不到实践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其三，衡量实践效用的尺度不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哲学，用是否切合实践主体即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实践效用的尺度，这就是后文要论及的，作为实践标准的历史具体展开的生产力标准问题，这一人民功利主义的尺度以及标准，凝聚着社会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普遍适用和可以规范操作的。而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用以衡量实践效用的是纯个人的欲望和意愿。由于这一尺度立足于非理性，表现为非理性，因此，它往往是主观随意的，不能普遍适用，也很难进行规范化的操作。

由以上比较可见，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与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尽管二者在强调实践及其效用这一点上不无相似之处，但其间的区别却是带根本性的。如果说，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只与个人相联系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利己主义哲学的话，那么，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则完全是指向人民的，它在历史观方面必然表现为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实践与人民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阐释。对于他来说，实践只能是人民的实践，人民也只能是实践中的人民。要是没有人民，实践就会因为无主体，而显得难以把握；反之，要是没有实践，人民也会由于失去其历史具体的规定性，而成为空洞的名词。正因为两个概念有这样的同一性，所以，当邓小平同志将其实事求是理论引向历史领域，用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时，也就合乎逻辑地表现出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唯物史观，即所谓人民史观。

对于这一点，无须多加证明。在上一节，我们不是讲到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吗？这里，只须把上述三个命题按逻辑对应关系稍作展开，呈示出来的就是其人民史观的总体轮廓：

先说第一个命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中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命题。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命题里没有给什么是实际下定义，但其本身的现实针对性是明确的。即凡事不要从语录出发，从“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出发，而要从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出发。

用邓小平同志的另一句话说，也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再说第二个命题：“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中为本体所规定的认识路线以及方法。其中所谓实际，与上一命题讲的是一个意思，指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自然也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与生产的实际状态和实际需要。因此，理论要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要像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的那样：“密切联系群众”。

最后说说第三个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中代表着认识论向价值论的延伸，实践在这里既是认识环节，又是价值尺度。如上所述，邓小平同志的实践概念，有其社会历史的规定性。在中国现阶段，主要指人民群众所从事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管是改革开放也罢，现代化建设也罢，其实质都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基于此，要坚持既作为认识环节，又作为价值尺度的实践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功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人民

功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这是邓小平同志将实事求是理论提升和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构成其人民史观的大框架的三个基本命题。在三者之中，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人民史观的理论前提；密切联系群众，是人民史观方法论的核心；坚持人民功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则是人民史观的价值准则以及尺度。

形成邓小平的人民史观，除了上面讲到的有从强调实践到强调人民这一理论和逻辑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个人政治、历史和生活上的原因。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一生经历坎坷，叠逢曲折与磨难。正如他1980年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所说：他是三“上”三“下”。第一次反复是1933年初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他因支持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被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指责为罗明路线的支持者而遭撤职，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才得以平反；第二次反复是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直到1973年秋才恢复工作；第三次反复是1976年4月，他又被加上煽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而受到撤消职务开除出党、保留党籍的处分，直到1977年7月才又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三“上”三“下”的曲折与磨难中，使他有机会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深入到社会底层，了解和体察民情，从而极大地增强巩固了他作为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这对其人民史观的形成，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像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理论来自对毛泽东制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一样，邓小平的人民史观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史观之间，也有明显的思想承继关系。因之，要说明邓小平的人民史观在理论上增添了什么新的内容，还须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史观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说起。

我们说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史观，乃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因为，毛泽东反复论定的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以及依据上述群众观点所确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一切作为毛泽东人民史观的基本内容，就其思想理论的渊源而论，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学说的具体运用；第二，是对中国现

代革命史上成千上万次群众运动，尤其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实践的概括总结；第三，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民本主义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关于前两个方面，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界多有定论，此处不拟赘述。而关于后一个方面，则绝少有人论及。在我们看来，这后一方面所揭示的传统文化渊源，对毛泽东形成其人民史观，起的作用可能更

为内在，也更为深刻。看不到这后一方面，或者虽然看到了，但却又回避它，都不能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明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特色所在。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其间由于农民起义的冲击，不断改朝换代。这使统治阶级中比较清醒的少数人，开始萌发和滋长起一种民本主义思想。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到包拯的“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黄宗羲的“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再到孙中山的“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成为历史的重心”。民本主义思想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文化中与专制主义相抗衡的进步传统。然而，应该看到，这种民本主义毕竟属于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注重民意，关心民生，固然有其人道主义的形态；但它维护君权，主张由圣明天子为民做主，又有其专制主义的内核。前者即所谓“王道”，后者即所谓“霸道”。因此，民本主义说到底，只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人从封建社会长远利益出发，实行“王霸杂揉”的一种君人南面之术而已。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由这一历史观规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即所谓人民群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概念，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毛泽东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群众学说，指导并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程中，成功地借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民本主义传统，于批判吸取其人道主义精华的同时，注意剔除其专制主义的糟粕，从而创立了以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基本内容的

人民史观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然而在其晚年，却由于一定程度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缘故，毛泽东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坚持到底，其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发生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某种倾斜。这一倾向，早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已露端倪，到了庐山会议日趋明显，进入“文化

大革命”的十年，则产生了危及党和国家全局的严重后果。

从反面说，如何防止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史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由内部发生倾斜，以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在全国重演？从正面说，如何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成对古代民本思想的革命性转化，以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历史新时期构建其人民史观的过程中反复思考的重大课题。正是通过有关这一课题的理论反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整套以人民为本位的新概念、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

路，从而极大地丰富与完善了毛泽东创立的人民史观。其中最具创新意义的是：

一、在率领全党实现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历史转移中，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置生产力的发展于不顾，势必有违国情和民心，导致像反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教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为了确保这一中心，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同志以上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这个概括好，并且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二、为拓展人民的范畴，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

人民作为历史的范畴，其内涵和外延常常因时而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仅地富反坏右以及所谓党内“走资派”，与人民无缘；而且连广大的知识分子，也都被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邓小平同志既然确认，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从事现代化建设，是发展生产力，那么，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便理所当然都应归入人民的范畴。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他在给改造多年的地富反坏右摘掉帽子；给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及其他人员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同时，根据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以后，他又在多种场合，再三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样，就使人民的范畴得以最大限度地拓

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以最大限度地解放，从而也就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据，提出了衡量一切工作的“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同志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毛泽东作为领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这一缺点，大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使我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基础，进一步走向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同志从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视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中心

任务。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

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在此，已经大体勾勒出“生产力标准”的雏形。但真正作为一个标准提出，是在一年后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

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此后经过反复斟酌，到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将上述标准明确表述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邓小平提出的是“生产力标准”，但因为其一，生产力的主体是属于人民；其二，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人民；所以，这一生产力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人民功利主义的标准。

四、和在经济上改革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步，为在政治上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概念

邓小平同志曾对毛泽东晚年的一言堂作过很中恳的批评。他说：“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从家长制到一言堂，从一言堂到所谓的“大民主”，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作为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体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明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

五、为了使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真正落到实处，又进一步提出了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命题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作为一个崭新的理论命题，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谈的是如何由“人治”向“法治”转化的问题。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只有走“法治”的路，也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用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董必武曾经解释过，所谓依法办事，应该“一是有法可依，二是有法必依”。邓小平同志据此又作了进一步发展。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简要地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同志的人民史观的理论创新，除了以上论列的几个主要方面，还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可举出许多。例如邓小平同志关于“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思想，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关于“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人民本位出发，指向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在邓小平同志看来，中国需要社会主义，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切合中国的国情，才能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在本文开头时说过，邓小平从实事求是到人民创造历史的哲学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原因和依据即在于此。

### 第三节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

以上我们从实事求是理论和人民史观两方面论述了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其实，在这两方面之中，邓小平同志的人民史观作为其社会历史观，对于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影响与作用力，要更为直接得多。在很大程度上，邓小平文艺思想可以视为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 M·H·艾布拉姆斯在其颇具权威性的《镜与灯》一书的导言中指出，一切艺术活动都会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艺术家、世界、读者或观众；这四者以作品为中心构成三组关系：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与读者或观众的关系。艾布拉姆斯用上述四个要素、三组关系为坐标，将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归纳为四种历史的交替的不同形态：开始是更多侧重在作品与世界关系的摹仿论；接着是更多侧重在作品与读者或观众关系的实用论，随之是更多侧重在作品与艺术家关系的表现论，至今是不顾及以上三组关系，而更多侧重在作品自身及其内部关系的客体论，亦即文本论。邓小平同志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显然不同于西方的摹仿论、实用论、表现论或者客体论。那么，用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坐标作为参照，其体系建构上的中国特色究竟何在呢？

统观邓小平文艺思想，其中论及除作品而外的另外三个要素，不管是世界也罢，读者也罢，抑或艺术家也罢，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同位语。读者指人民群众，固不待言；世界即人民生活，也无须论证。从邓小平人民本位的立场看，即便是作为个体的艺术家，也只有建立“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成为人民的代言人之后，才具备真正的“艺术生命”。基于这样的独特理解，邓小平文艺思想不像西方的文艺理论，更多侧重在某一组关系上。它对作品与世界、作品与艺术家、作品与读者或观众三组关系，往往同时兼顾而不偏废。更准确地说，它是把三组关系全部打通，最终融化为一组关系，即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既代表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与读者或观众的关系，也代表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甚至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还可以内化为作品自身的内部关系，例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等。由此言之，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乃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诚然，邓小平同志在阐发其文艺思想时，间或也论及其他一些关系，诸如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但所有这些关系，在他那里，都蕴含着文艺与人民关系这个深刻的命题。换句话说，他论及这些关系，都是为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一步说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对邓小平同志而言，其文艺思想的主题始终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我们不是讲邓小平文艺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吗？以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基本问题囊括和贯穿一切，在一元化的框架内建构其以人民为本位的理论体系，便是邓小平文艺思想既区别于西方传统的文艺理论，也区别于前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第8页。

下面，我们拟按文艺与人民关系的逻辑线索，对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思想的体系作一检索。

一、从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角度，去论证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思想中的文艺本源论

文艺的本源是什么？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人民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的说法是前后呼应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哲学反映论用于文艺本源的探究，从反映一般意义的社会生活，渐次推论到反映人民生活，以说明革命文艺质的规定性。他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中进一步指出：“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然而，由于他们二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关于什么是人民生活的具体阐释上，不能不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毛泽东所谓人民生活，主要指工农兵的生活；而邓小平给人民生活所设的定义域，则要宽泛得多。他认为：“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相对于原先较为狭窄的反映范围，邓小平的文艺本源论，为社会主义文艺开拓了一个广大到几乎无所不包的艺术天地。

二、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去阐发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思想中的文艺功用论

如果说，在文艺本源论内，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那么，在文艺功用论内，这一关系则主要表现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列宁早在本世纪之初，便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命题。毛泽东将列宁的命题置于延安时期特定的阶级关系和现实需要中，加以中国化的展开。他要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他在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之后，进而又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应该说，毛泽东这一推论，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那个时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然而，当战争与革命已告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告消灭之后，他仍然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就不能不导致文艺指导上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同志觉察到毛泽东的理论失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社会主义文艺的总方向明确规定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54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6页。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553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08页。

一个完整的口号，邓小平同志就“二为”方向及其内涵作过深一层的论述。他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又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两段话中，前者所谓“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可以看作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后者从文艺的教育和娱乐的同时兼顾出发，更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量的方面的规定性。质的方面要求“最好”，量的方面要求“多样”；邓小平同志赋予“二为”方向的这些具体内涵，从总体上构成了其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功用论的基本骨架。

三、从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相统一的角度，去说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思想中的文艺创作论

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创作的主体，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毛泽东的文艺创作论，从人民本位的立场出发，一个最具民族特色、最具理论个性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文艺工作者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问题的强调，力图实现上述两个主体在精神血脉方面的同化，从而使文艺工作者真正成为人民“忠实的代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显而易见，毛泽东所谓“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向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求的，在具体实施中，往往带有某种外在的强制性。这样提出要求，在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其阶级归属问题尚未解决之前，确实有它的必要性，一旦到了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之后，继续以此为由，像六七十年代那样，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则只能极大地挫伤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生产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看到了理论的症结所在。因此，他的人民本位的文艺创作论，虽然一方面仍然强调两个主体心灵沟通的必要性，甚至把问题提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的高度来进行认识；但另一方面，在如何实现两个主体心灵沟通的途径以及方法上，则特别强调从道德和心理层面加以自觉规范。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是希望文艺工作者把自身对于人民的社会责任，作为职业道德和艺术良心，内化到个体的创作自由之中。正是围绕着自由与责任这对范畴，邓小平同志颇有新意地发挥了以下三个观点：1. 提倡创作自由。邓小平早在1979年的《祝辞》中就已表达过这方面的见解。他引用了列宁关于创作自由的著名论断，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2. 反对横加干涉。从总结历史

---

《邓小平论文艺》，第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6页。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541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0页。

的教训中，邓小平同志认定，为了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sup>3</sup> 强调社会责任。邓小平的创作自由观，是建立在对于社会责任的自觉认同和承担之上的。他说：“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他又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后一段话，应该看作是对前一段话讲的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的深入展开和具体阐释。

四、从文艺由人民来评定的角度，去揭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这是邓小平以人民为本位文艺思想中的文艺批评论

邓小平同志说：“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作为其整个文艺批评论的基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命题，明显由继承马克思，特别是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而来。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创新在于，当他将这一命题展开，论及人民评定文艺的价值标准以及具体尺度时，表达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强调实践标准。但他的理论眼光，没有停留在实践标准上，而是将实践标准提升到社会历史领域，化作更具有操作性的人民功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作为对这一标准的最初表述，邓小平同志下面的一番话：“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是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祝辞中说的。由此可见，他关于文艺由人民来评定的价值标准，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标准。不仅如此，而且，邓小平同志还把生产力标准运用于文艺批评，提出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的具体尺度。这更容易为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以上，我们分别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文艺思想反映人民生活的文艺本源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功用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文艺创作论、文艺作品由人民来评定的文艺批评论。除了这四个方面，邓小平同志在文艺发展问题上提出的关于“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要“敢于创新”的观点，关于向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广泛借鉴和学习的观点等等，也都应纳入其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体系中。邓小平同志说，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其实，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到邓小平文艺思想，其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而又与日俱新，在不断地自我调适与自我完善中，永葆理论之青春，个中原因也正在于，作为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其全部内容都是围绕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而展开，都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关系所作的探索。可以说，

---

《邓小平论文艺》，第9—1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0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它是人民关于艺术的愿望和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个人的聪敏有限，人民的智慧无穷。正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理论源泉，时至今日，这种由毛泽东创立，由邓小平坚持和发展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必然成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遵循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15 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在这以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繁荣。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它必将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走向更大的繁荣。

## 第六章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

我们要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就不能不联系当前时代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着重指出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 第一节根据时代特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邓小平同志谈到当前时代的特点时，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是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而且结合建国以来的实践，语重心长地说：“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1980年他还特别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20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这一系列论断，不但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指出了时代变化的趋势。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拨乱反正，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也就决定了，邓小平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发展艺术生产力，繁荣文艺创作上。他调整了文艺直接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sup>①</sup>而且着重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后来，他更概括地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sup>②</sup>这许多论断，足以说明邓小平同志是适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文艺思想。

想。

其次，邓小平概括当前的时代特点，着眼于开放，他曾明确指出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是落后的根源，认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即使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他在强调“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谆谆叮咛：“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封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sup>③</sup>这些论断，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当前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建设，搞文化。就文化来说，邓小平同志专门针对如何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sup>④</sup>“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

---

<sup>①</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sup>②</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sup>③</sup>《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sup>④</sup>《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0页。

<sup>⑤</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sup>⑥</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sup>⑦</sup>《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介绍。”只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但这是建立在学习、介绍的基础上，它同过去那种仅仅把外来的东西当作批判对象，是有质的不同的，一个是拒斥的，一个是用来丰富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深入研究时代发展后得出的结论。

在开放的同时，一定会有许多坏的影响进来，这是毫无疑问的。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说“必然会有”，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的观点，不仅由于制度不同，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可能同资本主义的东西完全融合，而且在整个西方文化中，也有被认为是低级庸俗、腐朽恶劣的东西，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电视文化中灰色平庸格调的批评，对影视作品中色情和暴力的斥责，就是明证。既然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想避免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不可避免的弊病，就丢掉开放的基点，丢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那就只能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形成“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说要充分估计，是清醒的革命者的观点，我们毕竟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不能丢弃的，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好得多。”因此，对一些改革开放后坏的影响，必须给以批评和抵制，但有了充分估计，我们也就能有针对性的给以清除，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可见，邓小平同志适应时代的变化，坚持开放的态度，向对开放会带来来的消极影响作出科学的分析、认真的对待，就使他的思想基点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而且有了新的内容。

非常明显，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征，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关系到对这个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划时代意义的评估，在这里至少有两种认识是不完全正确的。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征估计不足，就会简单地把邓小平提出的以发展生产力为主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观点，同马列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完全等同起来，看不到这种观点的新的发展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像邓小平同志自己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其所以能摒弃过去长期以来坚持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要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就是在时代和任务不同了条件下，为解放艺术生产力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才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个方向的提出，比起过去那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显然给文艺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特征估计不足，就会把邓小平理论片面地同多样、多极的文艺实践对立起来，单纯强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调文艺的思想教育功能，忽视了文艺的审美和娱乐功能。不错，邓小平文艺思想从来都是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他曾经态度鲜明地指出：“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对这一点，不仅不容怀疑，而且要身体力行，形形色色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加以歪曲和攻击的思想观点，助长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观点，以及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们灵魂的低级庸俗的思想感情，任何时候都要理直气壮地给以抵制，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也是为了促成一个时代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和审美追求。但是，邓小平同志同样没有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文艺的多样功能，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他还说：我们的人民“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几乎用不着多加注释，只把这些原话摘引出来，就完全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时，是如何顾及到当前时代的特点，毕竟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是多种多样的，还用过去战争年代和阶级斗争尖锐时期的标准要求文艺，是与当前时代不合拍的。对于这些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的观点，我们至今也未必能全面地深入地理解，否则近年来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方面也不会摇摆不定，困惑于写什么、如何写，动摇于用什么标准和尺度去分析、评估复杂的文学现象了。

总之，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首先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准确把握了当前时代的特点；其次在于他适应时代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同经济、政治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课题。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是适应于时代需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自觉地摆脱了许多不适应时代发展的禁锢，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充满着创造智慧和巨大的活力。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2页。

## 第二节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他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能从时代发展的实际出发，敢于摆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陈规和禁锢，基本上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那么，这个理论的基本特征，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定的方向。我们生存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必然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要繁荣和发展，既不能拒绝吸收异质文化中进步有益的东西，又不能不警惕其腐朽落后的东西，包括对本民族文化中不健康因素的剔除。这就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来严肃认真地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坚持与贯彻，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批判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思想倾向，从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批评不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简单地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到下决心纠正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式的行政命令，都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左”的错误造成的危害，是十分重视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对于文艺战线上出现的有的倾向，常在风起青萍之未时就告诫文艺工作者，以引起他们的警觉，不要误入歧途。新时期以来，是他坚定地支持了对电影《太阳和人》（即《苦恋》）的错误倾向的批判，是他最早发现了西方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污染现象，力主批评这种精神污染，努力保持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学艺术的高尚品位；还是他最清醒地意识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意识到了阶级斗争虽然不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但国际、国内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仍然要不时地掀起各种不同形态的较量和进攻，因此，从不放弃，也从不松懈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邓小平同志说：“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实事求是他讲，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而又以防止“左”作为一种主要指向，对于保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向有着巨大的保证作用。

1992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我们就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教导，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二，开放的视野。早在 1984 年邓小平同志就特别着重讲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已经把反对闭关自守，反对关起门来搞建设，提倡“开放”，上升到总结历史经验的理论高度，可见在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是抓住了“开放”这个核心。从思想上讲，就是要具备开放意识和开放眼光。只有开放，我们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只有开放，我们才能正确地向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只有开放，我们才能广泛吸收前人和后人的研究

成果，而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后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正因为开放意识和开放的眼光，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对于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包括文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才特别强调搞封锁是害人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实际上，建国以来文艺事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尽管原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对于开放意识和开放眼光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发展到抵制，是文艺走向狭隘和单一的重要原因。究其根本，就是没有把握“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出于保守和封锁的心态，形成了不适应历史潮流的格局。既使文艺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无法满

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也使具有优秀文化传统、应该丰富多采的中国文艺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契机。如果认真思索一下这种种不应发生却又发生了的现象，就不能不感到邓小平同志提倡开放意识和开放眼光，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而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创造性的理论；就不能不感到邓小平同志对保守封闭的痛心疾首。

熟悉新时期文艺创作及文艺评论发展历程的人，大约都能勾勒出新时期文艺繁荣的景观，用邓小平同志的概述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汽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

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以后文艺事业的繁荣，更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初期描述的势态，有了广阔而蓬勃的进展。仅就小说创作领域而言，且不说中、短篇小说的佳作纷呈，长篇小说本是薄弱环节，近年来却以每年数百部的数量在递增，三届茅盾文学奖，以四年为期，仅评四至五部，却也展现了斑斓多姿的风貌，虽然受到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水平参差不齐，但题材的广泛，人物的多样，手法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所未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视角的转换，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角度或者说从一种大文化的角度去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刻画人物、展开情节，才能使长篇小说包容广阔的生活流程、体现丰富的人生阅历、揭示复杂的性格命运和烘托浓厚的文化意蕴。而这正是一种开放眼光所促成的新变化。至于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艺术家对当代国外一些优秀艺术创作和纷呈的文艺思潮的学习和借鉴，虽然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有些甚至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总的说来，仍然是开拓了艺术视野，丰富了艺术手段，加快了文艺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一些文艺作品，包括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等门类，走出国门，让世界文坛对中国当代文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的还获得了国际上的奖励，这样的变化，在过去是未曾有过的。从指导思想上看，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反对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提倡面对开放的世界的思想。

第三，解放的胸襟。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来，他还专门针对文艺工作者指出：“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必然意味着反对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首先表现在条条、框框多了起来。就文艺领域看，就是死守过去形成的清规戒律，对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创作和理论，不是放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给以审视，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而是动辄以是否合乎过去的规范，或者径直以单一的政治标准去加以否定，有时还是以已被历史发展证明过时的“阶级斗争为纲”冲击、批判一些富有探索精神、富有创新意识的文艺现象。比如曾经发生过的对一些用现代眼光观察世界、在手法上采用了一些国外现代手法的作品，一概贬之为资产阶级货色；对一些探讨复杂文艺现象、研究复杂创作过程的美学理论，一概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具有严格政治含意的概念拿到文艺领域里生搬硬套；对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审美追求，包括装饰美、服饰美的要求，一概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至于不能全面理解文艺的多种功能，片面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不能正确地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等等，都影响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正常发展。对于文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文艺有自身特殊的规律；承认不承认文艺需要艺术家创造性的探索；承认不承认文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综合，在这些方面，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在文艺领域里，五彩斑斓、各领风骚，“万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紫千红总是春”，几乎是古往今来文艺能否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群众多方面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一旦变成千篇一律，一旦变成千人一面，一旦变成异口同声，也就取消了文艺通过多重感染影响人的心灵的特殊功能，而僵化思想恰恰是要把生气勃勃的格局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把丰富多采的势头纳入单一的规范中，如同“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八个样板戏，其他一切文艺都归入扫除之列，结果造成了文化的断层，以至于直到现在，还产生着负面的效应，于少数整整一代人陷于文化迷茫之中，真是使人感到心痛的沉重教训。这也从另一方面告诉人们，思想僵化，对于整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是一大障碍，仅就文艺领域而言，也是消蚀文艺活力的致命伤。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僵化的结果，将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于此，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反对思想僵化，提倡解放思想的论述，实在是时代发展的急需，否则就要落后于时代，而落后于时代，只能使自己孤立于世界，最终失去最好最有利的发展契机，经济建设如此，文艺事业也是如此。

思想僵化，造成的另一个恶果，是“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这一点，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是富有创造性的事业，缺乏独立思考，缺乏艺术家的真知的见，缺乏坚持原则的胆识，人云亦云，探气候、看风向，时时事事揣摸上级领导的意图，只能使文艺事业变得毫无生气，形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那种以大批判开路的棍棒政策，不知扼杀了多少有生机的文艺作品，不知伤害了多少有作为的艺术家，其结果，是大量远离生活真实，以至于粉饰现实的作品的出现，不仅歪曲了时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而且败坏了文学公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凡是熟悉当代文学的人，只要不带偏见，对这些事实无不认为是沉痛的教训。时至今日，也不能说这样的僵化思想就完全绝迹，对一部艺术作品，对一种艺术现象，不是根据生活实际的进程，时代历史的特点，以及艺术质量的高低去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估，而是揣摸上级意图，窥测一定气候，说好时一哄而起，几乎是旷代名篇；说坏时任意指责，几乎是殃民祸水。最终只能是制造混乱，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弊而无益。结合这样的实际，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邓小平同志说的：“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的深意，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说“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这更是掷地作金石声的恳切教导。如果说，近年来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甚至有疏离人民、脱离时代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低级庸俗读物的泛滥，其重要的原因还是不能紧扣时代的脉搏，传达人民的心声，缺乏艺术家对生活、对历史、对人民命运的独立思考和敢于讲真话的胆识；与此相反，近期一些高雅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长篇小说、影视和戏剧作品，不仅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而且造成一定的轰动效应，最根本的一条是，一些作家艺术家对艺术事业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以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为基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础，用富有创造性的艺术精神和富有真知灼见的历史观，真实地勾勒了生活和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艺术创作上也精益求精，广收约取，拿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精品的艺术品。由此更可看出，邓小平同志倡导解放胸襟反对思想僵化的划时代意义来。

胸襟不解放，气度不阔大，还会造成脱离实际，从书本出发的空疏作风。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对于文艺工作来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不仅艺术作品需要“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而且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有责任把生活的真实面貌，时代发展的潜在力量，以及人的感情历程和心理衍变的曲折微妙和复杂性揭示出来，使人们能从熟悉向陌生的角度去认识世界，理解人生，升华感情，陶冶性情。这不是单靠一些书本知识和领导讲话所能解决的。得靠作家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独立思考，得靠作家艺术家同最底层、最普通的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交融。过去我们有些艺术作品图解政策，演绎概念，其所以苍白无力，受到人民群众的冷遇，就是在创作思想上唯书本是从，唯文件是从，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丰富的生活内涵。而我们的一些文艺评论，不是从生活实际出发，不是从艺术创作的实际出发，用几条来源于书本的教条，用简单的政治术语，去割裂作品的整体，去范围作品的复杂内涵，以至于对作家艺术家作出简单的阶级分析，不仅无助于作品和作家艺术家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伤害了作家艺术家，造成作家艺术家对评论的反感。而新时期以来，文艺事业的繁荣，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摆脱了书本的束缚的结果。

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就有从实际出发，反对思想僵化，提倡思想解放的论述，但像邓小平同志这样，把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提到当代思想领域的头等重要位置来认识，而且根据时代的变化，作出如此详尽而完备的阐释，则只能是当代最具有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第四，创新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就特别强调指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还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这几段话说得是那样高屋建瓴，是那样寓意深远，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3年，仍然具有现实的活力。从这段话中，既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的发展对文艺提出的富有创造性、富有生机的内涵，又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时代发展，对过去的文艺发展中正反两方面教训的总结，特别是对过去文艺事业中那种忽视艺术创作特点、忽视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违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的错误倾向，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结，开拓了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广阔天地。

文艺就其核心而言，是创新的事业，是艺术家复杂劳动的产物，文艺的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功能，文艺的社会效果，只能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新认知，对人生的新体验，对社会的新剖析，不能是附加的某种标签，或者某种统一的功利要求。就人民群众而言，需要艺术作品去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也要求艺术作品能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去帮助自己认识世界、认识生活、认识自身。因此，邓小平同志在历史新时期，总结了过去30年文艺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得出文艺需要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倾向，承认文艺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正是为了充分发挥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

新时期以来文艺的发展，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和失误，甚至出现过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但从总的趋势看，仍然是蓬勃兴旺的，尤其是文艺作品在内容上的丰富，在手法上的多样，题材范围十分广阔，思想内涵日益深刻，不少作品，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注意，这无疑是艺术家解放思想，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结果。假如没有邓小平同志根据时代历史发展，作出的富有时代特征，具有指导意义的文艺方针，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在他的报告中，特别提出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强调指出：“不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更要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可以说，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特征，正是来源于他这种“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

自然，时代是复杂的，历史是曲折的，当代文艺的发展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文艺问题上，常常轻率地否定创新和创造，甚至简单地以姓“社”姓“资”判断是非，或者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艺术风格流派不同、文艺思潮的争鸣，不作具体分析，一概否定，归之为“自由化”思潮，实际上则扼杀了文艺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过来，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而且也不排除极个别的文艺作品，宣扬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两方面的现象，一再告诫说：“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但是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他说：“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这才是一个头脑清醒的革命者的态度，这才会防止过去那种貌似革命，实际是拿大帽子吓唬人，动辄搞批判运动的“左”的错误。

总起来看，邓小平文艺思想，常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正是这些特征，才使他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这一点，我们无疑应该深入钻研，认真学习。

## 第七章邓小平文艺思想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贯穿在邓小平文艺思想中的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同志把革命精神与物质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发展，真正把革命精神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既防止了削弱或取消革命精神的右的倾向，又防止了脱离物质利益，把革命精神抽象化、绝对化的“左”的倾向。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我国人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继夺取政权之后的我国又一次伟大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党所提出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可以说正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革命精神的集中表现。

如果上述理解可以成立，我们认为邓小平文艺思想的革命精神的重心就应该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为此，就应该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就应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因此，邓小平文艺思想及其革命精神也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正像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是活跃起来，还是死气沉沉，究竟是搞活，还是管死，这一点至关重要，甚至决定一切。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摆脱了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拥有 11 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列宁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判断，邓小平同志予以了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及其革命精神，我们也要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去理解。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人民的共同事业，一定要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因此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 第一节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

坚持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向我们指出的强国之路，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

邓小平同志在 1992 年春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明

确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下述三点为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既是经济标准，又是政治标准。换言之，它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革命精神的具体化。

在文艺领域，我们当然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明确提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之取代曾经给文艺事业带来损失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主题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人民与艺术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同时我们党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是邓小平同志在 1979 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所一再告诫我们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就把文艺放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保证了文艺的健康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依据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特点，邓小平同志特别向我们提出了正确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问题。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

“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邓小平同志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分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

正是从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出发，从资本主义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区别出发，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2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69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20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10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10 页。

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邓小平同志从经济与文化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向我们指出，对外文化交流同经济交流一样也应该是长期的，切不可在文化交流问题上重蹈过去的覆辙，继续搞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同时，邓小平同志又发展了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论点，对资产阶级文化予以了有区别的分析，提出对于正直的、进步的西方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应当着重介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严肃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就告诉我们，在开展文化交流、引进西方文化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针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与作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邓小平同志在严肃批评了上述种种错误现象、倾向之后，告诫我们：“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必须认识我们之所以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其根本目的是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我们民族的贡献。那种拜倒在西方文化面前，甚至良莠不分，无区别地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的丑恶东西也拿进来、是极端错误的，不能容忍的，应该坚决纠正与禁止。

## 第二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一方面，只有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只有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才能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造真正的可能性，提供有效的保证；另一方面，只有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才有可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有可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必须认识“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取得了建国以来，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系列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极“左”思潮和从有的方面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都曾出现过，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来说我们尤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实保证我们的文化、文艺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系列论述：

一、“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

首先，“五四”以来到现在 70 多年来我们走过的道路，已经历史地证明中国人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繁荣、富强。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

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正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更快的步伐前进。

事实证明，我们正以让世人瞩目的速度稳步发展，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所保证的，所提供的。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

“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

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发展，还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比较，邓小平同志都深刻地予以了全面分析，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 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必须认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而且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与专政是一个整体，互为依存、互为保证。只有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才能够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才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因此，“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总之，邓小平同志指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这些国家专政机器的存在不仅不与社会主义民主矛盾；相反，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互为表里、互为依存的一个完整体系。

## 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解放。

列宁早就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提出的这一结论，至今仍然是正确的。

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样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我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绝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任何时候，脱离或偏离党的领导，都将给我

们的事业带来损失。那种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的主张和作法，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允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有可能取得已经取得的、正在取得的、将要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因为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

#### 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走到了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业，我们更须臾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而不是片言只语，个别论断。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机械化、僵硬化、封闭化的理解与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首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我们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当代世界总特征出发，深刻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地、准确地、全面地向我们提了出来，从而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 五、必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

毫无疑问，四项基本原则各有侧重点，但它们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关键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

他又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这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它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现阶段任务的，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未来理想的革命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思想指南，是人类思想优秀成果的总结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国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6页。

家的性质、国体和政体，是我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也是我国人民继续前进的光明之路。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

的条件下，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才有可能实现。

六、邓小平还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得一些人对于思想政治理论的作用失去了信心，而实现，

四个现代化更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我们将会在前进道路上不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更要求我们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

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理所应当 地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 第三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要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彻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之，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这就明确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同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进一步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或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反对或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方向上去。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有明确的阶级和政治含义的概念和范畴。邓小平同志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

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此，能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不能坚决抵制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原则立场问题，政治态度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1979年春，当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时，他就向我们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

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透过这些现象，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深刻分析，明确指出：“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混淆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

因此，邓小平同志认为“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决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思想任务，充分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起来的危害性，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长期进行下去。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又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严重破坏，尤其是对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破坏。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毫无疑问，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由活泼只有在也必须在安定团结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同时，邓小平同志又语重心长地向我们指出：“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虽然“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它必须服从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服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一个大目标。而搞自由化，是与这一大目标背道而驰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6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2页。

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

1981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同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

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组织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特别向全党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他指出：“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因此，邓小平同志说：“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

1985年夏，邓小平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时，特别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阶级实质和它的危害性展开了深刻分析，指出：“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

1986年秋，邓小平同志在《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志更向我们提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指出：“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

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

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同志发表《排除干扰，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讲话。针对有些学生闹事，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不在这里，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为此，我们一定要十分坚决地加强思想战线的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件事既提醒了我们自己，也提醒了朋友们，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谈话。他说：“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比较正确的政策，开放不能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我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1987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务必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就下列问题予以了明确规定：“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范围和重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要进一步稳定高等院校的局势”，“改进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新闻、舆论阵地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各级党委要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精心指导好这场斗争。”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这场斗争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正是为了正确地、全面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觉性、积极性。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深刻分析了“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他接着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

邓小平同志认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因此，他告诫我们，两手都要硬，一定要抓紧思想政治教育。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重要性作了深刻分析。

回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程，重温邓小平同志有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论述，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也认识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这场斗争，从总体上说，是对广大党员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毫无疑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很强的政策性，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在这一斗争中，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态度。

纠正政治思想领域的右倾错误，必须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要防止以“左”批右，绝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

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鼓励和支持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勇于探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经验，提出新见解。

对学术和艺术上的不同意见，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用正常讨论、批评和反批评的办法解决，以求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要采取和风细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方法。

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讲清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搞好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 第八章邓小平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论述是邓小平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他以较大的篇幅集中地、充分地论述了这一关系，并以其特有的明晰而简约的语言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指导性的重要论断。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的伟大胜利”，“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文艺工作者要“对人民负责”，“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给他们以营养”，“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邓小平同志将文艺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升到方向、源泉和根本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为社会主义艺术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奠定了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它就具有阶级的属性，为一定的阶级所占有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西方中世纪，文艺沦为“神学的婢女”，成为僧侣与贵族统治人民、麻痹人民的工具。当时，占据主流的教会文学与宗教艺术，不仅内容贫乏，而且形式僵化，因此在文艺史上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到了中世纪晚期，人文主义文艺兴起并且很快占据主流地位，又一次开创了人类文艺史上的光辉灿烂的局面。人文主义文艺在阶级属性上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体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这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当资产阶级建立了阶级统治之后便只有那些坚持文艺的进步传统、在不同程度上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文学家，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文学家，才创造出了有价值的作品。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从它的开创之日起就明确地宣称，普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然而，对大众文艺的认识和实践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直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此才有了明确的、统一的理解。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保卫者，他们有理由拥有文艺，要求文艺为自己服务。而无产阶级文艺如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会从根本上丧失其阶级属性，就会脱离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更谈不上文艺的繁荣。建国之后，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出现过繁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地被曲解、被推向极端。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的变更，它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变更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范畴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就科学意义上讲，文艺服务的对象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文艺的方向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为工农兵服务体现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特征；第二，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作为革命的文艺应当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第三，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人来自旧的文艺营垒，对于他们来说，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立场与感情的改造与转变。在我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人民的社会构成又在逐渐地演变着。首先，知识分子阶层日渐扩大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次，干部队伍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且日渐扩大；第三，原来的剥削阶级经长期改造大部分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四，人口日益年轻化，社会成员中少年儿童的比例越来越大。由于上述这些情况的变化，当我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国情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之所以说是继承，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艺方向的基本精神。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的基本精神就是“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其中包括“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仍然是人民的主体和绝大多数。之所以说是发展，是因为它克服了旧口号

的局限性，从而使党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政策更切合实际，使我们的文艺事业与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总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合乎实际、合乎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的口号。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必然要求文艺为人民所努力奋斗的事业服务。邓小平同志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大地十分广阔”，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在现阶段，文艺为人民服务必然首要地表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千秋大业服务上。

文艺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不可能直接为经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它的服务是间接的，即通过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实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文艺工作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一起，“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此，邓小平同志又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第一，“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代统治阶级无不要求文艺为他们唱赞歌。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艺时期，凡尔赛宫廷统治者不仅要求戏剧艺术直接塑造英明君主的形象，而且使君主的决断成为戏剧情节突转的唯一动力。英国19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为他们唱赞歌的反动诗人骚塞之流授以“桂冠”，而对于讽刺他们的劣迹的进步诗人拜伦则极尽迫害之能事。我们的文艺要求赞美人民，但这种要求同历代统治阶级的要求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赞美应当赞美的，后者是对丑的美化；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因此，我们的人民是值得歌颂的；文艺不褒扬他们，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真实。为人民唱赞歌，这是就我们文艺的主导倾向而言的，并不是就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人物形象而言的。人民身上的缺点，是因袭下来的历史重担，它阻碍着人民前进并带给他们以不幸。文艺工作者善意地指出这些缺点，应该说是对人民的爱护。

新时期文艺就其主导倾向来说是歌颂人民的，从初期的“伤痕文学”到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近期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从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到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的伟大胜利。例如，由谢晋执导的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影片《牧马人》，主人公在舔抚自己伤痕的时候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他蒙冤落难的漫长的日子里，同情他，帮助他，给他以精神力量的，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人民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英雄气概上，而且表现在恒远凝重的朴素感情上。他们有是非感、正义感，有助人为乐的侠骨柔肠。正因为主人公在自己的人民身上看到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才觉得祖国是一片乐土，才毅然决然放弃了国外应由他继承的巨额钱财。又如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秋菊打官司》，用写实的手法，通过一个平常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普通村妇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如今，主人公秋菊的一句口头禅——“得有一个说法”，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合理合法、公正公平的评判的替代语。使普通社会成员从长期影响他们的封建的、“左”的愚昧观念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他们以民主法制观念，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的前提条件。从以上例举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的优秀品质是多方面的，人民的胜利也是多方面的，文艺的表现形式更是无穷无尽的。作家艺术家对人民的颂扬应当出自对人民生活的真切体验，对人民的真挚热爱以及对艺术的精益求精，而不是在题材、主题、情节、人物及手法上因袭俗套。人民最反感的是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第二，“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塑造新人的形象是每个时代的有成就的文艺家追求的更高目标。尤其在社会的过渡时期、转折时期，社会现实中已经出现新人，社会历史急切地呼唤新人的时候，塑造新人形象就成为文艺家的历史使命。当人类历史跨入文明阶段之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塑造了像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王这样的新人；在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拉伯雷与莎士比亚塑造了一系列新时代的巨人的形象和一大批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笛福创造了第一个资产阶级英雄的形象鲁宾逊；当妇女解放的历史号角吹起的时候，简·爱、娜拉、卡杰琳娜的形象便应运而生；当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后，高尔基及时地塑造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巴维尔·符拉索夫。更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还出现了关于新人形象的论争。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敏锐地发现，曾经被视为“当代英雄”的“多余人”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应当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来代替他们。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塑造了五个革命民主主义的新人形象，把“多余人”对比得黯然失色。其中拉赫美托夫的形象，被认为是现代职业革命家的雏形。我国现代文学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塑造新人形象上却多少显得不足。我国的当代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十分注意新人形象的塑造，其中如《保卫延安》里的周大勇，《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典型。然而，受“左”的文艺思潮的干扰，在塑造新人形象时也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到了“文革”时期，新人形象成了思想政治的单纯的传声筒，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令人生厌。新时期开始之后，新人形象大都

以改革家的面目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而且寄寓了作家的理想。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给作家把握生活带来了困难。作家将目光集中在大背景前各色人物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变化上，高瞻远瞩的理想主义被审慎坚实的现实主义所替代，因而，在他们的笔下，典型化的新人形象还不多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所谓新人，指的是“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他们“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光和求实精神”，呈现出“崭新面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有着崭新面貌的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正在大量涌现，作家的责任是去识别，去发现，去提炼概括，去进行艺术创造。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入，灿如群星的新人典型一定会出现于新时期的文坛艺苑中。

第三，“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和社会过渡阶段，社会生活就更加繁复变幻、色彩纷呈，有时会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作家艺术家要真实地反映丰富变化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把握“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把握“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否则，就很难说做到了真实。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他们之所以能真实地反映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无不由于把握住了社会本质、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势。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中表现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新生活对于封建主义旧生活、新观念对于旧观念的胜利。在他的悲剧中则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罪恶，这种新罪恶同人类的理想的生存状态的悖谬，以及新罪恶给理想人物所造成的悲剧。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一方面反映了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进攻下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关系。托尔斯泰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了旧秩序解体和新秩序初建时期特有的社会心理。“一切都混乱了”，“一切都翻了个过儿”，“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这三个“一切”，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正是时代要求与历史趋势所使然。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乃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莎士比亚同托尔斯泰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社会过渡的时代，社会情况非常复杂，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两位作家，虽说回答不了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由于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所以才能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根据他自己的宣言，乃是反动的。然而，由于他抓住了社会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于是他的作品就违背了他的宣言，取得了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封建主义的東西，乔装改扮，沉渣泛起；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也会乘机溜进来。人们的价

价值观、道德观在变革中有前进也有倒退。社会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有时还相当猖獗，拜金主义之风一个时期内还会吹得很猛烈，一些丑恶行为如迷信、赌博、吸毒、卖淫等也可能屡禁不止。在这种形势下，艺术家特别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社会的本质，认清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被复杂的、暂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正直的艺术家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褒扬社会进步，鞭挞反动腐朽事物；应当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反映他们惩治腐败的要求与呼声：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在真善美与假恶丑较量之时表现自己的倾向。艺术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自己神圣的信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走正确的道路，为坚持社会进步的人民群众鼓劲儿，给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歧途的社会成员鸣响警钟，拨亮人们的眼睛。

历史上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对他们的时代，对同时代人都有一种使命感。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能够含辛茹苦集毕生精力创作《神曲》，如果没有时代使命感作为强大动力，恐怕是很难成功的。他在给友人信中谈到写这部巨著的动因：“目的就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处于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更应当具有时代使命感，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为实现社会的民主与法制，贡献自己的才能。

## 第二节 “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

时代使命感在实践上体现为责任感。所谓责任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对人民负责”的自觉意识。对人民负责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而且要“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国际或者国内都有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摆在人们的面前。冷战结束之后，随着旧格局的解体，世界又相对地处于无序状态，从无序走向有序还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由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深入实施，又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人们去认识，去适应。在以上种种变化了的形势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多么迫切地需要文学艺术家帮助他们反映时代的真谛，揭示时代的发展趋势，适应时代的要求啊！但是，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的一些文学艺术家却表现得不十分适应。

在国内外旧秩序旧格局的变革面前，有的受“左”的影响较深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总是转不过弯来，看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的有利时机，看不到改革开放对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带来的好处，看不到同国际经济与文化的接轨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及民族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在复杂的形势面前，他们的认识已经落伍了，他们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因此，在惊慌失措之后又升起了怀旧情绪，希望时代的列车仍然开到旧的轨道上去。这样，他们就同人民群众企盼改革、拥护改革的自发的与自觉的思想情绪发生了脱节，对于人民群众由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而获得的切身利益也视而不见了。他们以狭小的眼光来看世界，用狭隘的心胸来体验现实，于是就有太多的牢骚与不满，成了今天的“九斤老太”。对于改革过程中的困难与曲折，他们也失去了当年对待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不是帮助人民去克服困难，正视曲折，而是过多地指责，过多地埋怨，从而使自己转化为当年曾嘲笑过的“观潮派”而不自知。对于因历史积弊和国情现状而出现的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正的现象，他们也深恶痛绝，但却把其产生的根源算到开放改革的帐上。这些文艺工作者，由于自身的脆弱，已经严重地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事业。他们尽管口头上也喊“对人民负责”，实际上却是对个人情绪与既得利益负责。表现在创作上，他们的热情已经减退，灵感已经枯萎，因此已写不出什么作品来了。

8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过“玩文艺”的思潮。顾名思义，玩者，游戏也。既然把文艺当作游戏，甚而当作儿戏，自然就缺乏对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不过，我们还不能只看那态度，而应当对这种思潮作深入分析，不然就看不到站在这个口号旗帜下的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苦衷，自然也难于将他们引导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首先，必须分清“玩文艺”口号的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从文艺本性上提出来的；第二种含义是从诗学方法论上提出来的。前一种是错误的，然而事出有因；后一种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实践的意义。

反映生活、揭示生活、干预生活，文艺的本性就在于此。文艺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无不植根于它的这种本性。其实，那些提出“玩文艺”的口号的文艺家们，他们以往的作品大都是“直面人生”的，并

且在对生活的反映、揭示与干预上既真挚又勇敢，既积极又深刻。那么，为什么突然又提出“玩文艺”呢？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其原因，即“脆弱”。它的实质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前，最严重的脱离人民的创作倾向是拜金主义倾向。在理论上，这种倾向把文艺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放在第一的位置；在实践上，则用“对人民币负责”来代替“对人民负责”，用“为人民币服务”置换“为人民服务”。因此，有的作家、文艺工作者为了迎合读者与观众的低级趣味，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把趣味性、娱乐性变成性趣味、性娱乐。他们东抄西拼，移花接木，胡编乱造，粗制滥作，完全为了捞取金钱。更有甚者，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盗名窃誉，造谣哄骗，自我吹捧，哄抬身价，走私逃税，挖墙角，拆烂污，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他们给予人民的不是什么“精神食粮”，而是精神垃圾，精神鸦片。它们只能起到损害人民的精神健康，亵读人民的审美情感的作用。

人民的精神需求是比物质需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人在生理需要上与心理安全感上对于物质的需求一旦获得，就必然向更高的精神层次追求。马斯洛所说的“爱”、“尊重”与“自我实现”这三个层次就是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层次。满足人们的精神层次的需求要靠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各项工作的分工和配合，然而必须指出，文学艺术工作，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发挥着其他工作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民不但有权利要求最好的物质产品，而且有权利要求最好的精神产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受到国情、物质基础等条件的制约，物质产品无论在量上与质上都不可能短期内满足人民的需求。精神生产虽然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但两者生产的发展可以是不平衡的。因此，人民对于物质生产暂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是可以原谅的，而对精神生产的落后，对精神食粮的匮乏，对精神产品质量的低劣，则是不可原谅的。

物质产品只能分享，精神产品则可以共享。因此，对精神产品的质的要求要比对它们的量的要求更为重要。文艺工作者应当把最好的精神产品贡献给人民。那么，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文艺作品的质量呢？用什么标准来辨别文艺作品的优劣与品级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真、善、美的标准。

所谓真，从客观上讲就是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而要做到以上两点就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精神。什么是时代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我国目前社会状况来说，抓紧有利时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当代的时代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因此，改革开放也是时代精神的应有之义。文艺工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的时候，无论采用什么文艺形式，选择什么题材（包括历史题材），只有意识到这个时代精神的历史内容，才能赋予他的作品以真实性，才能给读者与观众以真实感。对于艺术家来说，把握时代精神不能只停留在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上，而要时时刻刻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善于从普遍的社会情绪中发现时代精神在某个时期聚焦在何处。艺术家的艺术敏感常常表现在善于捕捉初露端倪的社会情绪，有时，当理论家们还未来得及识别它时，艺术家凭着自

己特有的艺术直觉就能将其揭示出来。文艺家揭示社会靠的是他们的艺术直觉，理论家靠的是理性分析。不应当要求文艺家对某种社会情绪和社会现象作理性分析和准确判断，像对理论家要求的那样。

从主观上讲，所谓真，指的是文艺家的真切的生活体验。如果没有真切的生活体验，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就会陷于概念化、公式化，从而走向真实性的反面，创造出来的作品就会是空洞的、矫饰的、苍白无力的。人们常常不无愤慨地指责虚假是一些作品的顽症，其原因乃是由于人们在这些作品中得不到真切的生活体验。一些被人们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一些可能成为传世之作的文艺作品，一些不仅属于自己的时代而且属于所有的时代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即真切的生活体验。我们阅读与观看文艺作品时，那些能震撼我们灵魂、引起我们情感共鸣的段落，必定是传出了真切生活体验的段落。我们惊赞与叹服艺术家的，正是他的真切的生活体验。例如我们惊叹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对于饥饿感的体验，惊叹罗中立在油画《父亲》中对于岁月感的体验，惊叹陈凯歌与张艺谋在影片《黄土地》中对中华文化的凝重感的体验。给出真切的生活体验是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与艺术素质的真正的展现，是他们艺术力的真功夫所在。真切的生活体验来自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作家、艺术家不仅要始终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身在其中地体验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而且对于他们的辣苦酸甜要寄予博大深挚的人道主义同情。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怀有一颗稚子般真挚和使徒般虔诚的心，而且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只有这样，才能给出真切的生活体验来。

所谓善，指的是思想健康。文艺家被称为“灵魂的工程师”，其天职要求他们以提高人的思想素质、人格层次为己任。一个社会，当它的社会成员的素质都达到一定的水平时，这个社会的安宁与和谐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一个人，当他的人格层次、人性内涵达到较高的标准时，这个人就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利于社会的人。优秀的古典文艺作品的首要的社会价值乃在于陶冶人性，使人成为精神世界丰富、举止优雅、心理和谐的人。

当前，一些浅薄无聊的文匠、艺匠专以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为能事，在腐蚀了人们的灵魂的同时还要掏取人们的钱包。他们的行为弄脏了文艺的圣洁殿堂。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严肃的文艺家，也隐忍不住名利的诱惑，或者说陷入认识的误区，甘愿降低自己的艺术品格与审美层次，把低级趣味引入自己的作品。理论家与批评家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这种危险的倾向，向文艺创作家伸出救援的手。

所谓美，是作品中体现的人性美、人格美与艺术形式美的统一。没有形式美就很难体现出内容的美，而没有内容的美则形式美就失去了生命。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文艺作品追求的高品位、高境界。以往，在我们的文艺评论中常常把内容与形式两者割裂开来。这种评论会把文艺创作引入误区。

一部文学作品，一件艺术品，只有达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才可以称得上优秀的精神产品，才是献给人民的“最好的精神食粮”。

人民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同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一样，是多方面的。首先，不同的人由于年龄、性别、职业、

文化层次、生活经历和性格气质的不同，有着审美趣味的差异。有的喜欢阳刚之美，有的喜欢阴柔之美，有的喜欢喜剧式的轻松，有的喜欢悲剧式的庄严，有的喜欢金戈铁马，有的喜欢小桥流水，有的

喜欢古典美，有的

喜欢现代美，不一而足。文学艺术家有责任创作出各式各样的作品，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的正当爱好。其次，

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他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的。作为社会性的个人，他有求乐、求美、求知的基本精神需求。社会公民有权利要求这些合理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文学艺术如不顾及、不尊重人们的这些需求就会脱离人民，使文艺本身陷于孤立。曾经有一个时期，受“左”的错误干扰，我国文艺在指导思想出现偏颇，过分强调文艺的教育功能，忽视文艺的娱乐、审美及认识功能，其造成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文艺的娱乐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心理愉悦的需要。文艺的审美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精神愉悦的需要。然而，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精神的愉悦必须建立在心理愉悦的基础上，而心理愉悦就其发展方向来说，则要求向精神愉悦升华。文艺作品的品级、档次往往决定于这种升华的程度。应当允许以娱乐为主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以满足人们在紧张劳动之后获得充分的、积极的休息，使人们在愉悦中释放富余的精力，表现昂扬的活力，体验生命的涌动，意识到人的价值，确认自己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席勒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当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正当的娱乐中得到满足之后，一些反常的社会性消极倾向，如酗酒、恶作剧、性骚扰等等就会减少。而且，随着社会成员文化与思想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对于文艺的娱乐性的品位的要求也会提高。文艺工作者既要适应人们对心理愉悦的需求，也要引导人们向精神愉悦的层次升华。

文艺的认识功能主要是满足人们的求知的需求。一个人要取得自身与社会的适应便需要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文艺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再现与揭示社会生活，扩大人们的视野，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审视与思索。因此，文艺如果只是片面地迎合人们愉悦的需求而不给予人们一定的信息量，不带给人们以悟性的启示，那么，人们一定也是不满足的。一些严肃的文艺家，他们往往更重视言之有物，同读者与观众作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与高层次的思想交流。

文艺的教育功能主要是满足集体意志的需求。作为集体意志，它既要顾及社会成员个人的需求，又要顾及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政治、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文艺理所应当服务于人民的集体意志的需要，使社会成员在娱乐、审美与认知的同时受到思想教育。用人们熟知的话来讲，就是“寓教于乐”。

关于“寓教于乐”的口号，还应当正确地去理解。过去，我们习惯于把“教”作为目的而把“乐”当作手段，这样就人为地将集体意志与个人要求对立了起来，并且缺乏施教的真诚。“教”与“乐”都是目的。文艺的高境界是将诸种功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

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在质量上与多样化上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那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才可能说履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

### 第三节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命题，揭示了文艺的根源，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保持艺术生命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呢？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文艺工作者之所以能专门从事文学艺术的创造，必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必得有一定的物质生活的保证。在远古时代，当社会物质财富尚且不富裕的时候，是不允许一部分人脱离物质生产去从事专门的精神生产的。只有到了一定的社会阶段，当社会物质财富有剩余的时候，一部分人才可能被分离出来，业余地或专门地去进行文艺创造。在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社会分工，因此那些专职于精神生产的人似乎已经不大能意识到自己的物质生活的来源，从而也不大能意识到从物质生产的人对自己的特殊工作的物质保证作用，就像我们呼吸了空气，沐浴了阳光而没有意识到空气、阳光的存在一样。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即没有广大劳动者从物质生产活动，就没有文学艺术家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物质保证。

第二，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造所使用的物质手段是人民创造的和生产的。文学家使用的文房四宝是劳动者制造的自不待言，就连那语言文字工具也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雕刻家的雕刀，音乐家的乐器，画家的画笔与颜料，戏剧家的舞台与剧场，皆出自劳动者之手。至于新生的艺术如电影、电视艺术，它们的现代化的制作工具更是现代化科技与生产的结晶。影视艺术家离开了摄影机与摄像机等现代化工具便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创造。而且，影视艺术的每一步发展都决定于工具的革新与进步。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银幕电影到屏幕电视，无不是制作工具革新的结果。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对艺术工具的研制与生产，直接决定着现代艺术的发展。

第三，文艺形式本身是人民首先创造的。文艺的最古老的形式如神话、史诗、寓言、岩画、歌舞等，都是先民的创造，是最古老的民间文艺形式。文明社会到来之后出现的文艺形式如抒情诗、戏剧、小说、绘画、雕刻、音乐等，又是在先民创造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经艺术家的加工改造逐渐形成的。即使现代影视艺术形式，也是在民间艺术形式如皮影、幻灯的启发下，在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参与下创造出来的。

第四，人民是文艺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传播者与评判者。人民的精神消费不仅决定着文艺家精神产品潜在价值的实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艺家的精神生产。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艺术鉴赏活动正像一切审美活动一样是一种重建活动。没有观赏者的参与，任何艺术品的艺术价值、社会意义都不可能实现。放在片盒里的胶片和放在带盒里的磁带只是一些冷冰冰的物品，展现在银幕与屏幕上的影像也只具有潜在的内容，用接受美学的概念来说，只是一些“召唤结构”、“期待视野”和“意义空白”，其具体的意指需待观赏者的补足与增益。因此，在艺术思维中，不论艺术家意识到与否都有一种标尺在暗中起作用，这个标尺就是艺术作品的观赏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水平。接受美学把艺术思维的这种特殊性称为“隐含读者”和“隐含观众”。尤其是影视艺术，由于制作成本很高，就很难不顾及上座率，因此也不能不顾及观众的素质、趣味、关注焦点与生活体验。生产与消费，无论是物质的与精神的，它

们之间有着辩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消费通过反作用支配生产，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上帝”。

第五，人民生活给文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和原料，是文艺创作的永不涸竭的源泉。关于这一点，无须加以论证，因为它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有必要说的是，当一个文艺家取得成绩，有了名望时，切切不可忘记，他们的一切成功，归根结蒂是来源于人民的支持、教育和哺育。人民才是艺术工作者真正的母亲。如果忽视了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而陷入自我陶醉，就会常常于无形中丧失他们的艺术生命，使他们生活之井干涸，灵感枯竭，江郎才尽。“生活之树常青”，歌德的这一名言应成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座右铭。

第六，人民哺育文艺工作者成长，给他们生活乳汁与精神营养，给他们以荣誉，给他们以创作动力和艺术勇气，启迪他们的智慧，宽容他们的失误，帮助他们渡过种种难关。

人民是文艺之根，人民是作家、艺术家之母。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发挥了毛泽东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思想，把教育与被教育的辩证关系讲得很透辟。人民的集体意志要求文艺发挥教育功能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教育者就得接受教育。文艺工作者虚心地向人民学习，学习他们政治上的正义感、是非感与坚定性，学习他们大公无私、实事求是、朴素善良和勤劳勇敢的伟大品格，学习他们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优秀品质。而且，这种学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无止境的。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的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出的这一真理，永远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 第九章邓小平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和口号，是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的主要调整之一。这条路线和方针的制订者、设计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他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18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以后，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启示下，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就提出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质疑，提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这个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却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的口号。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公开肯定了这个意见，并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深刻论述，他说：“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综上所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艺从属于、服务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容易给横加干涉提供理论根据，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偏差，所以这样的口号就不继续提了；

第二，不提文艺从属于、服务于政治的口号，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说：“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第三，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为政治服务，对党的领导来说，就是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不要对作家写什么、怎么写，发号施令，横加干涉，作家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和艺术自由；

第四，口号的改变不是减轻、削弱而是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要求；“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三个利益”，在邓小平思想中，就是“政治”。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它既坚持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和党性原则，又体现了按照艺术规律来领导文艺的科学精神，它给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如何加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出了新的要求。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范例。从此，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思想就成为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正是在这个重要原则的指引下，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排除了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9—220页。

迎来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 第一节

邓小平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重要调整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理论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不仅在于它源于实践，而且在于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正是从理论基础着眼的，它必然地包含着原来的口号在实践中“利少害多”的内容，也包含着它在理论上至少不够严密、科学、周全，从而留下误解的可能的内容。因此，学习和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首先要从理论上认识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和发展。

可以说，从文艺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现象诞生并存在之日起，就存在着关于文艺的性质，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意义的各种看法了。关于文艺起源的“劳动说”和“游戏说”里边，就包含着关于文艺的性质、地位、意义的争论。而从中国最早的史书《左传》所说的“文物昭德”，“九功之德皆可歌”，儒家经典《尚书》中的“诗言志，歌咏言”，“志以道宁，言以道接”看到的都是强调文艺在国事、国君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而孔丘则将文艺提到同礼、乐并重的地位，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此同时，孔丘恐怕也是中国第一个将文艺作品区分为“正声”和“恶声”的人，他认为治邦为政者应“乐则《韶》《舞》，放郑声。”禁绝郑声的意义对于国君来说就等于“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简直大有将郑声的作者也和佞人一样斩尽杀绝的味道。而与儒家的积极干世相对立，主

张“无为”的道家创始人却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礼乐文章有失性命之情”，但是正是庄子却提出了“饰小说以干县令”这一重要观点，以否定文艺的绝对功利主义，来反对一切文艺，实际上，他们

却以自己汪洋恣肆的寓言散文，成为中国散体文学之

祖。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彦和的“原道”、“征圣”、“宗经”，更是把文艺的作用和意

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迨至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政

治家梁启超，则把艺术的作用夸大到了决定一切的地

步，他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

民，必自新小说始”。他认为小说有薰、浸、刺、提四种力

量，“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

---

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第2页。

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第11页。

《论语·泰伯》。

《论语·卫灵公》。

《庄子·天地篇》原文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不聪。”

《庄子·外物》。

曹丕：《典论·论文》，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136页。

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建构

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时，

也对文艺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同政治、哲学、法律、宗教，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建立了完整而系统的无产阶级文艺观。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又不只是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需要，还有当时欧洲文艺思潮、文艺运动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迫切需要。自从 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以来，在德国反对派文学中，普遍存在着与唯心主义美学所标榜的艺术“独立性”的论战：白尔尼和海涅宣布了超脱于社会政治斗争之上的“艺术时期的结束”；“青年德意志派”的报刊又把这场反对艺术至上、反对艺术与现实斗争相脱离的论战搞得市民化和庸俗化了。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作战，既要破除被唯心主义者夸大的文艺的“独立性”，又必须反对庸俗机械地把文学与政治宣传等同起来的观点。早在 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包含了辩证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包含了关于两者不平衡发展这一学说的最初萌芽；同时也包含了在艺术中含有客观真理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即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观点。经过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一今日已成为唯物史观基础，也成为我们理解文艺同政治关系钥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可以将这些经典性论述的基本要点概括如下：

一、物质生产力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二、竖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

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上的是由他们决定的人们的意识和意识形态，它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观点；

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他们的变化并不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步，而是或快或慢地发生的。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又激烈反对把他们的唯物史观当成一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一起决定

---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上书，第 418—419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

作用的因素，他就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的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有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文学艺术的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是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工人阶级对他们周围的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文艺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同时，他们又尊重和把握艺术规律，从大量的文学事实出发，阐明了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他们的发展有相对“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

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称宗教、哲学等等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是同哲学思辨的、理论的、概念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指出“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的同时，着重指出：“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和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关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的基本的观点。”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一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页。

政治、经济，与革命运动的论述也都建立在这样的基本观点之上。虽然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著名论断，有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著名论断，我们仍然觉得用“政治和经济”来代表我们上引《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显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政治”虽是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主要存在形式，但并不是唯一主要的存在形式；第二，一定社会的文化，特别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固然主要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但它还有相对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第三，文化和文化精神之一的文艺同社会的一般发展（经济的、政治的）也不是同步或成比例的，他们之间有着“不平衡”关系；第四，政治的观念形态（政治制度另当别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却是与法律观念、宗教、哲学、文艺平行的，它们同属于文化。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等论断，就带有这些论断发表的那个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的投影，也和我们党当时主要是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认识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这样一个总体认识环境有关。尽管这些论断的不足有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原因，而且事实上，这些口号和观点在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阶段，即在以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也需要发展，也需要调整。否则就会给不顾文艺自身规律的“对文艺横加干涉”，提供理论根据。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就使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回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是从根本上的拨乱反正。“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个政治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民族大业——四化建设，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四化建设属于生产力范畴、属于经济基础。“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种论述和观点，既考虑到了居生产关系主导地位的社会统治者对文艺、文化的要求，也考虑到了文艺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所有这些，都既包含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又包含了意识对于存在的影响和能动作用，体现了邓小平同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革命战略家的高屋建瓴和雄才大略，体现了他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 第二节邓小平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实践的总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对于一个健全地处于全面建设阶段的社会来说，这里的“解放生产力”也包括解放文艺的生产力。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完全如此。虽然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成绩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的历史地位、世界地位，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却很不相称。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力，未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一部分从国统区、解放区来到新中国的老作家在解放后创作反倒陷入了低潮；一部分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批判运动中率先落马，甚至被迫搁笔20年之久，耽误了宝贵的创作青春；一部分颇有才气的作家，在“左”的错误的影晌下，去写那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有的甚至沦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帮凶和御用文人，造成了作品的过眼烟云，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里面原因很多，有政治上“左”的强制性干预，有封建性的文化专制的压迫，也有我们党领导文艺的经验不足，作家和理论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解的偏差等等，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从认识论的根源上找，以理论和学术的眼光看，不能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却是第一位的原因，是最首先、也是最根本的理论偏差。

建国后我们的文艺界曾经开展过题材问题的讨论，文艺主要写什么人亦即描写对象的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人物塑造的讨论，文艺创作方法问题诸如现实主义和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作家的个性风格问题的讨论，戏曲现代化京剧革命的讨论，历史题材怎么写、鬼戏应不应该写的讨论，还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要不要杂文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内容等等，应该说是十分有益的。但几乎每一次讨论都是以学术始，以政治批判结束。它们的直接结果是，打倒一批人，扫倒或否定一批作品，在创作和理论上造成一个绝对不可侵犯的政治禁区。这种将政治和文艺混淆、等同甚至以政治来代替文艺的做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题材问题、结构问题、人物形象问题、主题风格问题全部成了政治问题，有时连某一段对话、某一种色调、某一个唱腔，甚至化装上衣服一个补丁、一号人物站在舞台什么位置上，什么人打什么光等等也都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政治斗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这个“高度”，50年代和60年代的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们的作者也一律成了万劫不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文艺完全被当作政治本身和政治的附庸；文艺作品也被当作直接执行某一具体政治任务、政治措施，图解某一政治口号的工具。早在50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滥设禁区、滥施禁令，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提出的“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

夫”，“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相呼应，权威性的党报党刊则公开号召，要“使每一出戏，每一首歌，每一部作品，都成为激励人民革命斗争的

战鼓，刺向敌人心脏的钢刀”，“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

如果说上面提及的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奇谈怪论，是从“左”的方面来混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并最终造成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灾难的话，那么从右的方面企图使文艺完全脱离政治的观点也时有所见，有时甚至也成为气候。1955年将胡风先生及其与他有各种关系的青年打成“反革命集团”的行为是错误的，现在为他进行政治的平反完全必要，但是1954年他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中，把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家世界观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说成“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尽管有比喻的意义，但仍然表现了使文艺“脱离政治”的文艺思想倾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家、理论家在创作和理论实践中，奋起批判在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上“左”的观点和作法是应该的，但也确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文艺要“远离政治”，人为地要“淡化”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实际上是要使文艺脱离政治。这在理论倾向上是不对的，在创作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下，邓小平同志都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坚定立场。早在1975年，他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文艺灾难，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文艺政策要调整”的口号和设想，并且支持了电影《创业》等遭到极“左”思潮攻击的故事片，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在1977年，还未回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提出，“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直接谈文艺、谈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但却包含文艺问题、文艺家在内，特别是坚持了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能等同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百家争鸣”的重视，更表现了他希望学术、包括文艺问题冲出长期“左”的禁锢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他多次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应当“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8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5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的聪明才智。”针对有

的倾向，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

所有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说明：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实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

向、性质、前途的根本问题，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二、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

实践证明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利少害多”，给“对文艺的横加干涉”提供了理论根据，造成了文艺的灾难的话，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某些企图使文艺“脱离政

治”的倾向，同样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向，所以在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上，我们也必须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既反“左”，也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反对让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也要反对一切企图使文艺“脱离政治”，即对文艺的“二为”方向表示淡漠的倾向；三、坚持文艺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就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艺术创作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不要对作家横加干涉。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4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2页。

### 第三节邓小平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体现了文艺自身的规律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深刻论述，还体现了他对文艺规律的理解和对文艺科学的尊重：“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在这段论述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想：一、肯定了文艺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二、肯定了创作活动是一种个体劳动；三、指出文艺创作在题材、主题思想、艺术形式、风格诸方面不能横加干涉，肯定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我们可以从艺术创造规律方面作如下的理解，以区分政治和文艺不能等同的关系：

一、选材，即题材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无比广阔、无比丰富又无比多样的，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而无论是现实和历史的题材，它们都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人生命运的、爱情的、风俗文化的、人性人情的等等，尽管这种种题材都可以与政治有关、并且在一定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作用，但这作用和关系却是大不一样的，有远近亲疏、浓淡轻重的区别。而写什么又是由作家的全部生活经历、人生道路、创作思想、审美理想决定的，有很强的个人性、偶然性、具体性、个别性，所有这些选择都不只是或不完全是政治的。

二、主题思想的问题。从总的方面看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都不能不是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现实的产物，不能不受作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包括社会思想、历史思想、哲学思想、关于人的认识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等等，又有相对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的独立性，在这里它们可能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在那里它们可能又高蹈于现实，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或如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所说：“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思想、思维不仅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思维自己的规律，在文艺创作中，他们又不是以直接的、赤裸的、思想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从场面和情节、意象、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以曲折、隐蔽的形式，把情感、意象通过作品自然而然呈现出来，它们既在作家的意识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常常突破作家的自觉意识……这种种情况，都使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人的、历史的、多样的。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三、关于艺术形式、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问题。文学、影视、音乐、美术、舞蹈各大艺术门类的共同思维规则自然是形象和情感意绪，但在这五大门类中，都共同存在着写实型创作和写意型创作的差别，前者侧重于对客观实际的摹写，后者侧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前者侧重于具体和感性，后者侧重于抽象性和情绪性。尽管在任何一部写实型作品中，都不会不包含写意的因素，在任何一部写意的作品中都不会不包含写实的因素，但是人们仍然会以它的主要倾向，给予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创作方法的区别，但是由于对艺术传统的承传关系的不同，具体作品创作风貌的区别，在文学史家和研究家视野中，人们又以其理论观点对其进行更详细的区分；如现实主义中又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等等区分，在表现主义中又有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等的区分。所有这些选择，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非自觉的，但是无论何种选择，都既受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观点的影响，又受个人生活经历、思维习俗、艺术承传关系、审美理想的制约。人们既不能以创作方法、艺术形式来划定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又不能硬性地规定采用某种形式、某种方法。

至于作家的风格、个性那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审美风范问题，它只能属于那些成熟而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具有共同的审美要求，正如同人们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当然也不能同政治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里他充分估计到读者的不同情况，和人们爱好的多种多样，既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又强调文艺的娱乐和美的享受作用，不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创作目标，也为我们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文艺与政治不能“从属”、“等同”体现了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文艺与政治“不能脱离”的关系同样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从大的方面说，社会生活是一切观念形态的艺术创作唯一的源泉。人类社会生活固然是纷坛复杂、多彩多姿的，并不是任何人类生活中都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倾向。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同其他方面相比，政治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它必然要极大地影响和波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当然也不能例外。

从文学史和人类文艺实践来看，文艺和政治“不能脱离”的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体裁、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就其本质、就其内涵和外延来看我们却很难找到完全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政治的作品。兹就其具体表现形态，分类如下：

第一，以阶级斗争、政治集团斗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正面的、直接的表现政治要求及政治生活内容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斯巴达克斯》、《李自成》、《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等等。

建国后出现的其他大量的土改作品、农业合作化作品，抗日战争、国共斗争的作品也基本属于此类和政治关系比较直接、联系比较紧密的文艺作品。第二，以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斗争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为背景，表现家族和个人命运的作品，如《红楼梦》、《家》、《春》、《秋》等。这里的个人命运、悲欢离合，家族的兴衰起伏，有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重合的关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家族环境的自身条件。第三，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人性和人的感情的复杂多样的作品，如《简爱》、《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包法利夫人》、《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它们中间的政治因素极为淡薄，只是极为曲折地反映出一定社

会历史阶段，一定政治背景之下人对人之为、人对自身生活的要求和需要。第四，还有的作品以某种非现实的假定的形式比较抽象地表现着人的生命、情感和精

神的需要，人的智慧和人生的感悟，如《西游记》、《安徒生童话》、《浮士德》、贝多芬的无标题音乐等等。这些作品可以让研究家从作者的身世想到它们所赖以产生的

时代背景，包括政治背景，但一般读者则很难从中看到或感觉到具体的政治内容。即使这些作品（第三和第四种）我们仍然能曲折地感受到作家、艺术家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态度，看到他们或朦胧模糊或清醒自觉的社会要求和社会理想。这些作品的主题或许不是政治的，但却不能说明完全与政治无关。

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还因为文艺家总是不能脱离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制约的。第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构成人的本质的“总和”，既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也包括生产关系、阶级、阶层的关系。这样，作家这个人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也就必然地包含着人的政治性，差别只在于自觉或不自觉，政治性表现得强烈或薄弱。第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语），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将保证自己阶级的政治权利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因此他们也不能不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将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封建统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是这样，取得了政权并面临着巩固政权艰巨任务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第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但是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存在；三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及市场经济、贫富差别等等，决定了我们社会自身也会经常产生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等等，他们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国家政权的稳固。所有这些，使掌握了政权，并且正在为祖国现代化大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放弃从政治方面来考虑问题，并且影响到我们的文艺政策。所以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条件下的“百花齐放”，而不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齐放”。邓小平同志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种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邓小平同志还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原则性。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来是个文艺理论问题，但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制度下，一进入具体的实践过程，就复杂得多。今天，对它的认识 and 实际操作，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方向和前途，也关系祖国文学艺术事业是否繁荣和兴旺。多年以来，同丰富的政治生活相适应，文艺航道里也是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对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邓小平同志，不仅对此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和结论，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方向和理论武器，开辟了一条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社会主义文艺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还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但只要我们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以邓小平文艺思想为武器，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曲折，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 第十章邓小平论文艺的教育性和娱乐性

对于文艺的功能即文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应，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文学观念，往往有着不同看法和要求。

建国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和发展变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虽然，这主要是就文艺风格的多样性和文艺创作的复杂性说的，但却同时把文艺的功能全面准确地向我们提了出来。邓小平认为文艺应该“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文艺应该也完全可以具有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在邓小平文艺思想中，文艺功能的多样性和对文艺教育功能的强调是与他自身规律、特征的尊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代的重大发展。

## 第一节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

文艺的教育功能在邓小平的文艺功能的多样性理论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他曾不止一次强调，“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文艺创作应该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自身的灵魂首先应该得到塑造，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塑造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即接受者的灵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希望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而不是名不副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邓小平认为：“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他为我们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要任务。

这是因为从历史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

这还是因为从现实看，“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

这还是因为，从未来或从根本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的逐渐走向全面发展。而“四有”正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内涵与标志，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的具体实现。

可见，无论从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还是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特征着眼，还是从人的真正解放，不断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考虑，培养四有新人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这是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的论断，毫无疑问，实现四个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在人与社会间形成最佳关系，在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最佳结构与运行机制，而这才是现代政治的真正内涵。

什么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它们的内涵与外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

我们认为“有理想”就是建立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未来信念与追求。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0页。

与总结中提出的宏伟蓝图，是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重心与内核。

关键在于，如邓小平所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教育人民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从而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建设共产主义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从事的活动而组成。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在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自己的错误后，深刻指出这些以动机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正是这个“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历史，我们才有可能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到历史的底蕴与本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将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在自己的创作中实现完美的结合，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自己从事审美创造的美好追求。不仅作家如此，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艺术活动去帮助教育人民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正确对待我们民族走过的历史。

正确对待历史，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正确认识与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流，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传统就存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判断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与现代生活的适应度，与未来发展的适应度，而不是其他。在东西文化交流，撞击 20 世纪大文化背景下，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搞什么“全盘西化”，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奉行唯我独尊的锁国政策，拒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对此，文艺工作者不仅自己要有个正确认识，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文化意识和现代文化心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亿万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这同时也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共同任务。

邓小平提出灵魂工程师应该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年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是一个完整的要求与论断。我们的时代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它所呈现的种种现象不能不异常复杂。这就向作家和一切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要求，这就是如何在观察与把握现象时，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展示历史发展的流程。生活的体验与审视，艺术的积

累和创造，当然不可或缺，而尤为重要的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而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邓小平文艺思想，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不能直接进入和代替文艺创作，它必须借助审美意识的中介在作家的审美机制中发挥其指导作用。重要的是，艺术工作者应该自觉地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与基本原理，而不是生吞活剥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有道德”，我们的理解是以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来约束和指导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為规范的总和，它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系的。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无疑拥有自己的巨大优势。

作为一种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文学艺术是以人及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为创作对象的，当然，这种内容，例如人的道德属性与价值必须处于审美关系下，才有可能获得审美意义与存在价值。而且，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文学艺术永远与作家的感情、情绪、体验、经验不可分离。作家对生活的审美判断必然伴随着、连接着道德激情与道德判断。在作家的审美理想中，道德理想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道德理想既是一种历史的规定，又是一种情绪化的体验。无论从创作对象，还是创作主体考察，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与人类良知的作家，都难以回避历史与道德判断的双重使命，这已为中外文学发展历程所证明。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道德作为一种历史的规定，有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维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可少的保证；因此也必然形成它的滞后一面。同时，道德作为一种理想人性的追求，又有它跨越时代的超前性与变异性，这也就必然形成新旧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作家对合理人性的道德光辉和永恒魅力的追求，也就难以避免地会面临着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相一致又相冲突的两难选择。重要的是，作家、艺术家们应该在现实的严峻考验面前以一种历史的眼光与魄力，在维护我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勇敢地批判与剔除传统道德中的不合理因素，为我们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伦理道德的重新铸造，作出符合历史要求的抉择。

“有文化”，就是要求以现代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与能力武装社会主义新人。很难设想，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今天，没有或缺乏现代知识与现代技能、能力，能够去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为此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知识就是力量”并没有过时，关键在于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与能力。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并非没有用武之地。当然这绝不是说，文艺应该直接去灌输知识，传播技术，培养技能与能力。除了科普作家、科幻作家之

外，一般来说，文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来显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强大威力及其重要价值与意义。也许，更为重要的，并不在于知识与技术、技能与能力本身，而在于发展和激励人们建立起对于知识，对于科学技术，对于文化艺术的强烈求知欲望，对于未知领域的强烈探求精神，对于真理的热切信念与追求。

事实上，文艺活动、文艺创作本身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创造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时代的更多的优秀作品，为社会主义新人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文艺所显示的巨大创造力。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应该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催化剂。当我们强调学习继承前人与他人的文化成果时，我们不应忽略，创造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的振兴，在一定程度上，正有赖于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激活与发挥。

“守纪律”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新人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遵守社会各种组织所规定的其所属人员的行为准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纪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它既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保证，又是维护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自己的创作中直接去宣讲纪律条文，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作品中告诉人们纪律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而且，文艺工作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文艺创作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带头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并不是各自割裂的。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成员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它们本身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只有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联系里，才有可能获得意义，获得功能。

革命的理想是精神文明的支柱和核心，它决定了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方面。只有树立起了革命理想，才有可能自觉地用共产主义道德和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才有可能获得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技术，培养自己的技能、技巧的强大精神动力。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理想基础上的，它既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又必然地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有理想往往与有道德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大量事实证明，理想的破灭常常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守纪律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必然表现，也是实现理想、讲究道德的有力保障。社会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分别通过强制性力量和社会舆论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铺平道路。而科学文化知识又是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社会主义纪律赖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理想、道德与纪律不能仅仅凭借激情，它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牢固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发展、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纪律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向它的各个成员提出的行为准则。认识“四有”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当我们在为实现文艺的教育功能而精心创作我们的文艺产品时，我们当然可能会在我们的产品中有这样那样的侧重，但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四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倚与忽略都可能对我们的创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努力中，我们认为，应该充分注意下述两点。

一、文艺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或取消它的社会功利目的、放弃或取消它的教育功能

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的特殊形态。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在进行物质生产，而是一种精神生产，因此，它必然地带有意识形态性。而且，既然是生产活动之一，它又带有人类生产活动的普遍规律性。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创造的对象本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同样是生产，只不过，它是一种独特的生产。现代文艺生产理论的真正奠基者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诗人是“生产者”，艺术品是“产品”，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生产的特殊的形态”。因此，这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生产者的“生产者”，区别于其它产品的“产品”。正如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是为了适应人的目的和需要一样，艺术生产同样不可能没有目的。不同于物质生产的是，这种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创造者自己及广大接受者的精神需要。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当然，从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到文艺创作之间，存在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必要中介；但这个中介本身仍不能不与一般意识形态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可能凭空产生，白壁虚构。虽然康德认为审美活动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他其实也不能否认审美的目的性存在。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艺的功利性及教育功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种观点，认为文艺纯粹是个人的审美活动，是人的生命显现、是个人的情感、情绪的宣泄。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它的部分合理性；但是，这种极端与偏激也构成了一种陷阱。它完全可能导致文艺的误入迷津，甚至误入歧路。且不说，任何创作个体的思想显现与宣泄不可能不产生社会效应；否则，创作者便无需将他的作品公之于众。作品一旦问世，便为社会成员公有，严格地说，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只能在接受者对作品的解读里，即使从创作者的生命、情感、情绪本身论，它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历史、脱离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无视或者削弱文艺的功利性与教育功能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

每个艺术工作者都应该树立起社会的责任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历史、与时代展开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历史与社会。

二、必须充分尊重文艺的规律与特性，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实现其功利目的，发挥其教育功能时，真正是以审美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完成的

文艺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与其它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文艺不可能也无需替代其它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较之于其它意识形态，文艺可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通过审美方式对人的灵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求文艺扮演非文艺的社会角色，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文艺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教育功能。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他尤其强调：“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

---

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第7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造能力、有开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这里，我们所要十分注意的是如下一点：文艺的教育功能主要借助艺术形象，尤其是新人形象来实现。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毫无疑问，那种赤裸裸的思想意图的表述，那种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简单化、公式化、甚至是庸俗化的反映和解决，那种对政治、对政策、对运动的简单的、直接的配合和图解式的说明，那种将人物形象、艺术形象当作历史事件、社会冲突的工具性存在，当作某种政治性结论的形象注释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6页。

## 第二节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功能

文艺具有认识功能。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就曾提出，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这就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了文艺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我国传统文论对文艺的认识功能一向十分重视。孔子在谈到《诗经》时就明确地表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观”，一般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考察、观察风俗的变化，由此而认识时代与社会。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指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与了解。在孔子的伦理教化的文学观念中，他同样突出了文学的认识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艺的认识价值，更是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认识。恩格斯在高度评价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时指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在分析与评价托尔斯泰时曾经认为：“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列宁因此得出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从这个总的评价出发，列宁进一步指出：“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了解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由于这些弱点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前进，应该了解这些。”

必须指出，文艺的认识功能来自文艺自身的规律与特征，来自文艺对生活的真实的描写和反映；但这种真实，已经不再是生活的本来状态，而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艺术的真实。

何其芳曾经指出：“文学描写的对象是异常广泛和复杂的人类生活（包括和人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自然界），作家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又各不相同，再加上文学的不同样式（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等）各有各的特点。”他因此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与科学、与其它意识形态是迥然有别的。换言之，当我们谈到文学的认识功能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无论在创作的对象上，在创作的主体上还是创作的形式上，文艺与科学有着很大的差异。科学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文艺的对象则几乎是凡与人有联系的都被摄入审美视野。文艺又与哲学不同，虽然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极广泛；但哲学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3页。

《列宁全集》第2卷，第372页。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353页。

运用的主要是抽象思维，而文艺则更多地诉之于形象思维。对于科学研究、哲学研究来说，冷静、客观的理性思考往往排斥情感、情绪的介入，而文艺工作者则可以说很难离开情感、情绪，审美意识总是与审美情感交融、渗透、整合为一的。一般科学与学科以理性的方式掌握世界，而文艺却是以审美的方式去审视与把握世界。从文艺本身来说，由于艺术门类的各种各样，它们各自的认识功能无论在对象、表现方式与效果上都很不相同。例如音乐，这种诉诸声音的时间艺术，往往具有极强的抽象性，这在器乐中尤其如此，而声乐则可能略好一些。从文学来说，如何其芳所说，各种不同的文学样式，它们认识价值也存在着强弱多少的差异。

何其芳认为“文学的根本任务是教人认识生活”。他的这一观点当然明显受到俄国民主主义美学家的影响；但他接着又指出：“如果一个作品只是在里面重复……一些不成问题的常识，并不能在读者面前展开新颖的生活背景，揭示出生活的秘密，那还有什么文学所需求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呢？”在他看来，文学必须为读者提供常识之外的“新颖的生活背景”，“揭示出生活的秘密”。无疑，这个观点是接近文艺的规律与特征的。

必须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功能，但这只能是以审美的方式实现，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 第三节正确认识文艺的娱乐功能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指出，文艺应该使人们“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对此，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以满足广大人民娱乐的需要，美的享受的需要。

人们在从事文艺生产或接受文艺生产的制作与产品时，其内在动机上，包含着娱乐的成份，这历来是无数史实所一再证明了的。邓小平在全面阐述文艺功能时，将文艺的娱乐性明确地单独地提了出来并放在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文艺家们从事文艺创作时往往含有自娱的因素，在表演艺术活动中尤其是这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是，一般人在接受文艺时，往往并不是为了接受教育，提高认识，而主要是为了娱乐。当然，正如娱乐本身有多种方式一样，这里有一个高雅粗俗之分，而且，面对同一欣赏对象，接受者之间的情况也差异不小。有的主要或纯粹是为了满足感官的刺激与宣泄，而有的则更多地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排解、消遣或共鸣、慰藉，以修身养性即调剂生活、陶冶情趣。人们的需求，包括娱乐需求，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想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忽略甚至无视文艺的娱乐功能，给我们的文艺功能的充分发挥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时，充分认识与发挥文艺的娱乐功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娱乐性与低级趣味，与庸俗、浅薄、下流绝不可混为一谈。我们必须正确看待文艺的娱乐性，防止与杜绝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偏差与错误。然而，我们不得不清醒地看到，近几年来，文艺界在这个

问题上，仍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了一些丑恶现象。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充分认识低级、下流、庸俗、淫秽等丑恶现象及其危害性，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与这些丑恶现象展开斗争。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趣味性、娱乐性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官的刺激与宣泄上，而必须把它们提高到美的享受的水平。文艺的娱乐功能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娱乐，它应该是审美的娱乐。

当年马克思就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的享乐，——由于工作时间很长，对享乐的需要因而达到最高点，而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所能获得的享乐在质和量上都是被局限了的，——所以具有了自己现在的粗糙形式，”马克思认为：“迄今存在的一切等级和阶级的享乐，一般讲来，应当不是幼稚的、令人厌倦的，就是粗糙的，因为它们始终脱离了个人的一般生命活动，脱离了他们生活的真正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使没有内容的活动具有虚伪的内容。”当然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享乐以及一切等级、阶级的享乐所作的分析，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马克思接着指出：“批判迄今存在的享乐，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开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有了很大发展，使得批判

现存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成为可能的时候。”马克思是就一般享乐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文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已经实现。但我们应当看到，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根本改变的，改革开放在前进道路上也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劳动大众整体素质的远不够理想及新文盲的出现等等，足以表明，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文化、文艺消费无论在质与量上都如马克思所说仍然局限在粗糙水平上。这就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在满足人民群众娱乐需要的同时，不断提高文化、文艺消费品本身的质和量。只有真正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优质的、大量的文化、文艺消费品，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娱乐水平才有可能提高。

当然，仅仅依靠文艺，是远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这是极为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提高文化、文艺消费者的享乐水平就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投入的艰巨工程。马克思早就指出：“享乐的能力是享乐和条件，因而是享乐的第一手段；这种能力是一定的个人禀赋的发展，是一定的个人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从消费者、享乐者个人条件说的；而个人禀赋及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又不能不依赖于社会。要使娱乐、享乐真正成为娱乐、享乐，成为如马克思所希望的与人的“一般生命活动”，“生活的真正内容”结合的娱乐、享乐，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这里首先要做的，仍然是提高“生命活动”与“生活的真正内容”的质与量。

---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 367 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 371 页。

#### 第四节正确认识文艺的审美功能

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与其它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文艺的独特审美属性。

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能够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定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人的内在尺度即人在改造对象时用以规划劳动对象的尺度，反映了人的目的与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而美的规律就存在于这两个尺度（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的整合与综和之中。文艺就是按照这美的规律所进行的审美创造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说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就是指人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包括艺术世界）里，在“人化的自然”中，也就是人自己创造的“作品”中，“肯定了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本质”，发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同时是一个审美感受、审美愉悦过程。

文艺的审美属性与人所创造的其它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审美属性的不同，可不可以说就在于它是专为审美而创造的呢？审美在这里本身就是目的。文艺的审美价值、审美功能应该说是它赖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所有文艺的教育、认识、娱乐功能都只能依存于审美。或者说，文艺的功能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审美。其它功能包含在审美之中。离开审美，文艺不复存在，一切其它功能都无从产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论述文艺功能时，是把文艺的诸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才分节将他们展开。这里，让我们进一步来考察一下文艺诸功能的相互关系。

如前所述，文艺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是通过文艺的审美属性，立足于文艺的审美功能而实现的。

文艺是真与幻、虚与实、美与丑、善与恶、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于界线上的巧妙契合。离开了真、善、美完美结合的努力，文艺将不可能存在。这里，丑与恶等只有将它们审美化处理之后，即化丑为美、以美刺丑，化恶为美、以善刺恶等等方式完成审美的转化才可能成立，才可能进入审美世界。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就是讲的美丑相互对立、比较的关系。出现在文艺中的丑与恶正是在与美与善的对比之中、否定之中才能具有审美价值。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将文艺的“善”作为文艺具有教育作用的立足点？必须注意的是，“善”在这里不只是一个道德概念、道德判断，而是包涵了道德却又超越了道德的一个历史范畴，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共同方向与趋势。而文艺的教育作用正是在文艺的思想倾向、道德倾向、情感倾向的形象传达与表述中实现的。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就是说文艺来自人的精神和灵魂。这是因为艺术在社会中是一种中介的塑造的力量而不是单纯地反映或记录作用。文艺在净化人的灵魂方面显然较之于说教显得更有力量。而文艺的认识功能正是在文艺的“真”即真实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真实性当然是指通过审美方式所揭示的生活和生活的本质及规律，所揭示的世界和世界的本原及规律。何其芳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曹雪芹在作品中把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

而且塑造得比原来更雄浑，更和谐，却又看不出人工的痕迹。”文艺中的生活是经历了审美意识、审美情感筛选，浸泡了的生活。透过这审美化了的生活，接受者应该也可能达到对人自身、对社会、历史、自然与世界、宇宙、人生的更亲切的认识。至于文艺的娱乐作用则仍然是、并且主要是来自文艺的“美”，我们已经讲过，在诸多娱乐方式中，人们之所以倾心于文艺，正是因为文艺拥有其它娱乐方式所难以具备的相应集中的美。文艺在培养与提高人的美感方面无疑具有独特的能力，这里面包含着它的形式美。

如果说文艺工作者是在真、善、美完美结合的追求中从事自己的文艺活动的；那么，逻辑的必然就是文艺的功能，只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无论是教育功能、认识功能，还是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只能在文艺社会价值的整体中去显现和发挥。邓小平正是以这样的整体观提出了他的科学论断。

## 第五节邓小平文艺功能观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关于文艺功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全面论述是我国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长期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代的最新发展。

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以来，更把文学视为实现革命与变革的手段，从事现实斗争的工具，并且依据其是否能达到预期的革命与斗争目的来判断其存在的价值。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我们的文艺走过了自己的光荣战斗历程和取得了光辉战斗成果，写下了我国新文学的灿烂篇章，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宝贵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型期。党在经过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之后转向了以城市为中心改造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轨道。毫无疑问，随着工作重心转向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发展新政权，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中，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有了很大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强调了文艺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优秀作品。但是，即使在那时，对于文艺功能的认识也主要是把文艺的战斗性放在首要位置。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文艺越来越强调它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作用，曾经在50年代初期响亮提出过的“文艺是生活的教科书”的口号也逐渐退隐，消失。虽然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文艺事业仍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标志着“十七年时期”最高成就的一批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这批优秀之作在文艺功能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较好体现。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正是这样的文艺遭到了批判。

回顾我们走过的这条道路，不难看出，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我们对文艺功能的认识主要是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在政治路线正确的情况下，文艺得到了相应发展；而在政治路线发生了偏差与错误时，文学也随之在歧路徘徊。正是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文艺事业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全面地准确地阐释了文艺的教育、认识、娱乐、审美功能，把文艺的社会价值、社会作用予以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

同时，我们还应该指出，邓小平关于文艺功能的深刻论述是邓小平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认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负有其它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邓小平关于文艺功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总体思考出发的。邓小平明确指出了文艺工作者与其他部门在下述工作上所起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来自文艺的自身规律与特征。这个工作就是：一、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人的需求本来就有诸多方面，诸多层次；而在精神需求上，更不可能强求一律，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各具个性的世界。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既是现阶段的任务，更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三、提高整个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也就是提高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整体精神面貌。毫无疑问，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出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才可能以强烈的责任感，担负起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职责，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认识、娱乐、审美功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 第十一章邓小平论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

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重申并真正开始落实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强调作家的创作自由，又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了文艺的空前繁荣和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作家的涌现，保证了文艺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 第一节 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自由创作、群言竟发、异彩纷呈的美好境界，是毛泽东同志50年代曾经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全面总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新时期的实际，在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祝辞》中指

出：“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中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

动，展现在我们面前。”十几年来我国文艺事业迅速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双百”方针的正确是无可争辩、不容置疑的。

“双百”方针，是“放”，不是“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收，就是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提倡和鼓励人们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实行思想禁锢，搞“收”的方针，是不会有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正如鲁迅所说的：“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到的结果是要相反的。”

“双百”方针，既要“放”，也要“争”。只有放，才能争，只有争，也才能更好地放。放与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艺批评是“争”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也是“双百”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真理是在批评、争辩、议论之中越来越明的，而“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最怕的是无声无息，被社会冷落。如果有人评论，赞誉也好，批评也好，热热闹闹，就应该感到高兴，这说明你的作品有人在关心、在研究，已经产生了影响。当然，这里是指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的、真切的、实事求是的和以理服人的文艺批评，而不是搞围攻、搞运动，借批评之名行整人之实的那种“文艺批评”。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者和作者处在平等的地位上，文艺批评绝不是法庭的终审判决，批评得不对，作者可以反批评，批评者、反批评者都应该经常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使创作和批评一同前进。

当前我们文坛上，确实存在着一些艺术上粗糙、格调上低下的作品，出现了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果的倾向。人民群众对这些作品是不满意的，理应展开实事求是的批评，帮助有关同志提高思想艺术水平，防止和纠正错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3页。

《鲁迅全集》第5卷，第44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9页。

误，力求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作品来。批评家之于作者还负有一种诱掖奖励的责任，应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溢美，不掩恶，诚恳地指出作品的成败得失，讲究方法，注意分寸。鲁迅曾劝批评家要刻苦地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苹果尚不是穿心烂，有几处烂疤，剜掉了，总还可以吃的。他最反对的是在嫩苗上驰马，“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说，‘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写得寒噤了。”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动辄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就好比在嫩苗上驰马，快意是快意了，可叹的是成批的嫩苗会遭枪杀。至于有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忽儿当面奉承，捧之上天，一忽儿翻脸不认人，打入地狱，就更不配作批评家了。文艺批评家必须热爱真理，坚持原则。文艺批评中所发表的批评和意见，都应该建立在深刻的科学基础上。既不带个人利害打算，也不迎合某种风向或屈服于某种压力，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违心之论。对于自己信仰的真理绝不轻易改变，而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又能勇敢地抛弃。当然，文艺批评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要完全正确地评论一部作品，写出客观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不是一种容易的事。创作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批评也是这样。不能因为一篇文艺批评的方法不好，某些提法不够周严，就把文艺批评完全否定了，拒绝一切批评。现在文艺界有的人喜欢听吹捧的话，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血压升高；而有的人也喜欢搞无原则的吹捧，把文艺批评当商品广告，这样对作者和读者以及文艺事业都是无益的。

政治上的民主，是艺术上民主的基础。新时期以来，文艺园地呈现了历史转折后第一批令人喜悦的收获，改革开放为实行“双百”方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什么时候执行“双百”方针，文艺就发展，就繁荣；什么时候违反“双百”方针，取消“双百”方针，文艺就枯萎，就凋零。回顾长期的“左”的错误对实行“双百”方针的阻滞以及给文艺带来的危害，目前我们文艺界可以说享有着解放后少有的、来之不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时光，这是值得文艺家百倍珍惜的。

## 第二节 保证作家创作意识的自由状态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恳切地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靠发号施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作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文艺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他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有人对提出创作自由十分反感，以为“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并不是把它抽象化，我们同样需要无产阶级的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的文艺家当然不允许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但他们也有在作品中充分反映生活的真相和本质的自由，有获得各种条件使自己的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由，还有充分发展各种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的自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说过：“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接近工农兵，给他们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自由。”可惜在建国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切实的贯彻。文学艺术是受“左”的错误的伤害比较严重的领域。在实行文艺批评中，出现了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文艺民主和创作自由的现象，有不少作家、艺术家就是因为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一出戏、一个电影的是非问题，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艺术家怎么能够敞开思想，创作出有个性特色的作品，发表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文章呢？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自由的空气中，文艺之花才能茁壮成长。

要发展文艺，就必须遵循文艺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只有不断认识客观规律，并自觉运用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反映，是经过文艺家头脑加工的产物。文艺家的创作，必然是从他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观察、体验、理解和评价出发；他所创造的形象，也必然带着他的生活经验、艺术修养、思维能力、气质性格、审美情趣和世界观方面的全部个性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样，尊重和保证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就成为文艺工作必须遵循的文艺规律之一。为此，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强调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鼓励作家在题材和手法上，要丰富多采，敢于创新。在指导我国文艺事业的论著里，如此强调个人自由创造精神的重要性，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领会的。20年代末的苏联，受“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就有人曾否定作家的个性和创作的自由，提倡一种“生产的艺术”，“集体主义理论”，把艺术创作看成集体进行的生产劳动，甚至有人主张创作要“彻底摆脱个人”，作品里要用“我们”代替“我”。列宁曾经嘲笑和批评了这种错误。我国“文革”期间，也出现过忽视个人自由和发展的集体创作，对“创作需要才能”的观点进行过批判。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对保证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自由

的突出强调，促进了作家创作意识的觉醒。于是有的提出要对生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有的提出作家应该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有的提出作家应该不同别人重复，也不同自己重复；要不断创新和突破。这就使我们的文学艺术逐渐摆脱长期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当然，只有社会外在的自由还是不够的，作家、艺术家还必须有自我创作意识的自由状态。高尔基既有过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的名言，同时又主张“艺术家必须在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上是自由的，必须仅仅是代表自己、为了自己、关于自己才说话的”。他分析“契诃夫一生都是依靠着他的灵魂生活的，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在内心上是自由的。”这正好说明作家从生活到艺术、从借鉴到独创的由必然向自由的升华，这也就是我国古人所说的，作家进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出神入化的境地。

### 第三节作家艺术家必须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历来是文艺战线上思想论争的焦点之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把人民的生活实践作为创作的主要源泉，而且还要自觉地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段活，对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起了根本的、定向的和指引的作用。它非常辩证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实践的关系，高度概括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方向。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的水平，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首先，必须强化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为此，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紧紧地贴近人民，认识到“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取营养。”

加强文艺与人民和时代的联系，在现阶段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目标。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要在90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时代的主题，国家的大局，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文艺通过自身“艺术地掌握世界”的规律来为这个总目标做出贡献，正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待。我们的文艺自然应当满怀热情地表现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生活，描写各行各业的人们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通过对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和生活底蕴的开掘，鼓舞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当然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和形式、题材和主题、体裁和手法、风格和色彩都必须是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风情、历史、人物、山川都可形之笔端，立于舞台，使人们从潜移默化的欣赏中得到审美愉悦、情操陶冶、思考启示及娱乐休息，使我们的文艺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多层次多方面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要求。

在同人民的密切联系中获取艺术的生命力，这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繁荣文艺事业、坚持“二为”方向的“根本道路”，也是作家确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的基礎。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上，列宁提出过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要求文艺结合劳动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为他们所了解和爱好。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兵生活，把立足点移过来，

---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从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对作家的世界观提出了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期望。邓小平同志则提出了“艺术生命”的概念，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并且说，“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这就为检验作家和作品的艺术生命，提出了一条客观标准。这也是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客观总结。从“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所开创的我国文人创作，从托尔斯泰关于“我们都向人民学习。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律——直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甚至关于契诃夫也可以这么说，还有我本人”的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剖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的论述，把艺术与人民的辩证关系讲得十分透辟。当然，从过去的经验看，我们应该把文艺与人民的联系理解得更宽广一些。我们要遵循艺术的规律，尊重作家的个性，不能搞简单化、庸俗化，以为只有拿起锄头、扛起镐头，才是唯一的方式。这种联系，一方面是汲取丰富的、取之不尽的题材，反映我们的人民和时代；另一方面则是感受人民的脉搏，和他们休戚与共，从观察现实生活中反映人民思想和情绪，有一些不成功的作品，不健康的思潮，它们的产生虽然各有具体的原因，但是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人们远了一点儿，对人民的尊重少了一点儿，社会责任感差了一点儿。

作家、艺术家的力量过去往往被过分地夸大了，如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或者小说足以“亡党亡国亡头”之类，以致有人忘乎所以，有人惨遭迫害。也有过小看的，如“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代书生中当然多为文人，或曰文章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如此过分夸大或过分小看，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狂傲自恃和自惭形秽都是盲目的。文学艺术的力量有一定限度，也有一定重量；虽不能包打天下，却也对天下的兴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重量，就有份责任，作家、艺术家毫无疑问要承担社会责任，对国家社会的进步，对人民的命运和利益，起良好的促进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特别强调说：“在这个崇高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他在这里不但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应起的作用，而且也为文艺工作者应自觉地加强社会责任感，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文艺的社会效果，实际上就是文艺对生活所产生的作用，即文学艺术家如何运用文艺帮助人民群众认识生活，改造生活，进而推动历史的前进。一部文艺作品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倾向，对促进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对文艺家来说是义不容辞的。有人以为作家、艺术家一动笔就考虑社会效果，会束缚手脚，阻碍创造精神，导致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其实，有些作品出现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并不在于作者事先对社会效果的考虑，而在于他们不熟悉生活，甚至脱离生活，没有正确地处理好文艺和人民的关系，只凭作者的主观意念进行形象的图解，使人物仅仅成为某种思想的传声筒。有的作品甚至有意迎合低极趣味，单纯追求商品价值，任意编织

荒诞不经的故事，给人物强加上一种莫名的命运。这样的作品只能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作家、艺术家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到生活中去，深刻地认识生活、体验生活，才能真正地反映生活，并通过自己的作品担负起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培养一代新人的光荣使命。强调社会效果，决不是对文艺创作横加干涉。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

和逐步求得解决。”这正是对文艺家的信任，更加重了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创作虽无禁区，但作家却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审美态度。生活中一切真实的事物并不一定就是美好的事物，作者对看到的一切真实事物都应有所分析、判断和选择。这样说，并不是不能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更不是要作家去粉饰生活。光明面和阴暗面从来是矛盾的统一体，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只能是虚假和灰色的作品，广大群众对这种作品是深恶痛绝的，其社会效果当然也不会好。

对于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决不是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的“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而是应该敢于面向社会生活的矛盾，敢于创新。实践证明，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敢于揭示社会矛盾，而且在思想、艺术上都是震撼人心的，能给人以美感、信心和力量。这样的作品才能获得广泛而良好的社会效果，而这是需要作家、艺术家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产生的。

总之，文学艺术家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作品，通过塑造各种真实感人、发人深思的艺术形象，鼓舞亿万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不论遇到怎样的艰

险困难，都能增加勇气和信心，以不屈不挠的求实精神阔步前进。凡是能够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扩大文化知识视野，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审美需要的作品，其社会效果总是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作家需要创作自由，作家也需要有社会责任。这是艺术的辩证法。充分认识和掌握这种辩证关系，我们的文艺就能兴旺发达起来。

## 第十二章邓小平论文艺批评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对文艺批评的论述，则是对文艺总体构想和论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像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一样，他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代的熠熠闪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也应当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来获得全面正确的理解。要以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 第一节 继承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和文艺从一开始就有着密切关联。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文艺也早已成为现代人类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19 世纪中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就滥觞于这个年代，迄今已有 150 年的历史。在它的创建、确立和发展过程中，虽几经风雨，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终于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完整的、科学的文艺思想体系，形成了世界当代审美文化的主要潮流，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仅就文艺批评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了批评的一系列重要命题，指出了“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强调了文艺批评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和尺度。列宁则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文化遗产，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应当看“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供了什么样的新的东西。他撰写的评论托尔斯泰的一组文章，表现出了他关于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光辉思想，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后来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状况和特点，对文艺批评规律和方法又作了新的理论阐述。他在重申“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尤其突出地强调了文艺批评的指导性原则。提出文艺批评“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主张“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并且从理论和运用两个方面丰富了“双百”方针，为我们今天正确有效地开展文艺批评指明了方向。

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繁荣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推动文艺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文艺批评；党领导文艺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正确的批评是使文艺事业乘风破浪的前导，是促进文艺花朵成长的园丁。实际上，文艺繁荣的奇迹不大可能自发的产生。除了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优秀的作品，还要依靠党和人民与文艺批评家一起“浇花锄草”。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同时，其经典作家便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及其文艺批评的实践奠定了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致敏·考茨基》、《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等，都是无产阶级文艺批评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当时民族斗争、革命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的态势下，仍然非常关心文艺批评的发展。他在研究了大量文艺现象，广泛征求了文艺家的意见后，就文艺批评问题作

了专门论述。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90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57 页。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0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6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4 页。

典作家之所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十分重视文艺批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能不能拿起批评的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仅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而且也是对我们的事业是否有信心有热情的表现。邓小平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从开展批评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文艺工作者自身建设的需要这个实际出发，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纵观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史，文艺批评总是伴随着创作的产生而出现，并给创作以影响。文艺批评的涵义为“判断、评价、批判、指引”，而绝非仅仅是单纯的否定。进步的、科学的文艺批评可以及时总结文艺创作的新经验，克服文艺创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断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促进文艺的繁荣兴旺。反之，则有可能造成文艺的冷落、枯萎、衰亡。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提示我们：重视文艺批评，不只要不要拿起批评这个武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真正掌握与运用批评的武器。正是根据文艺批评的性质和深刻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原则的同时，提出了新时期文艺批评的任务，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

新时期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打破了以往那种单纯的为评论作品而评论的格局，明确了繁荣文艺创作，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文艺批评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围绕这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在一个崭新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双百”方针是迅速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方针，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的长期的方针。在新时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放，也要注意争。因为只有放，才能争；只有争，也才能更好地放。放与争，相辅相成。文艺批评就是“争”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也是“双百”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使在批评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有的同志担心要“收”了的时候，他仍然重申，“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双百”方针是一个解放思想、推动艺术进步的方针，而不是自由化的方针。决不可把“双百”方针同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开展批评对立起来。为此，邓小平同志紧接着又强调，“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把坚持文艺批评同实行“双百”方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经验的科

---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0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8页。

学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我们党正是为了推动整个文艺事业的前进，为了保证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才提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问题，才提出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领导文艺的问题。根据新时期我国社会出现的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为“双百”方针和文艺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他指出，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把安定团结作为“双百”方针的前提，把判断和评价文艺作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立场和表现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双百”方针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应当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双百”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新贡献。

综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我们总是体味到他对文艺批评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总体思考。透过这种思考，我们眼前矗立起一个宏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思考和擘划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方针。放眼这个目标，邓小平同志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去论述文艺批评的作用和方法，而是将其贯穿和体现到有关文艺论述的整体之中，体现到他站在战略的高度纵观全局，以全局指导局部，让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个鲜明的特征中。文艺工作者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就是突出的一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确定了新的历史主题。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表述：“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因而，评估文艺工作，尤其是衡量文艺作品社会效果好坏的最根本标准，是看其“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文艺批评的根本着眼点投向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的原则，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批评实践中都是正确和应当的，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文艺批评不是空中楼阁。新时期文艺批评需要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批评须构筑在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文艺形势的基石上，方能够从实际出发，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评价阐释作品的工作。闭目无视文艺的宏观形势或任何对文艺形势不准确的判断和不全面的分析，都难以切实发挥文艺批评的作用，到头来都会损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实践证明，将一部具体作品置身于整个文艺形势之中，进行剖析和评判，往往能够深中肯綮。而将一部作品与文艺的大形势游离开来，孤立地去看问题，则常常造成顾此失彼，以偏概全。应当说，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邓小平同志总是善于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20—221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全面把握和分析文艺总体形势，将具体文艺现象和作品置于总体形势的观照之下，从而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大计。他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思想战线的任务》等讲话中，都首先对文艺形势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判断。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上的。“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但何为精神污染，其界定就不能那么简单，就不能脱离开特定时期文艺的总体形势对具体文艺作品轻易定性。同样，文艺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能主观随意地把什么文艺问题都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遵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方针，“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对整个文艺形势的全面分析判断为前提，来指导对一部作品、一种文艺现象进行精当准确的批评，既是促使文艺批评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应当看到，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十多年中，文艺批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对批评“左”的文艺思想的干扰，对几次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总体表现都是好的。但同时也应当承认，这一时期开展文艺批评也还存在着一定阻力，尤其是对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错误思潮的批评，阻力更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认识上的模糊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一些同志看来，批评容易妨碍解放思想，批评难免限制创作自由、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弄不好就变成“打棍子”，甚至导致影响和破坏团结。凡此种种认识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同志头脑中对文艺批评的任务和目的尚缺乏正确的理解，对文艺批评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繁荣创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也理解得不甚透彻。解决这些认识问题的办法不是别个，就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一系列论述，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头脑，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航向，去勇于开展文艺批评，善于开展文艺批评。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1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2页。

## 第二节 社会效果论是新时期文艺批评的核心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离不开民族文化这巨大的磁石。现代社会文艺又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参与社会、思考人生的渠道。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文艺提出要注重社会效果，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扫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宝库，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多是从政党的角度，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角度来论述文艺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文艺批评的核心在于鉴定创作的社会效果如何这个原则。而邓小平同志则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在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从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入手，在要求文艺家自身增强责任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理应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强调文艺批评要把文艺创作的社会效果如何放在核心位置，提出了“社会效果论”的完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新的位置。

恩格斯早在 1844 年撰写的《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就曾指明文艺作品产生社会效果的重大作用。“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的无产者。列宁在 1905 到 1907 年间的许多文章和书信中，反复指出了出版物在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利用文艺来扩大布尔什维克斗争的直接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1942 年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最根本的利益和维护这种根本利益出发，要求文艺创作和批评注重社会效果。他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述：“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12 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便及时地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自此以后，他针对思想、理论、文艺、新闻战线出现的情况又多次提出了要注意社会效果的问题。1979 年他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这当然意味着文艺批评也要相应地去评析文艺家在创作时考虑过作品的社会效果没有，是认真严肃地考虑过，还是一般性地考虑过，还是压根儿没有去考虑。1980 年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981 年他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举例说道：“《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9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5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7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

那会产生什么影响？”1985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综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作品社会效果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后，就一直坚持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好坏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观点。这是他在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全面掌握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规律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稳步地有序地进行，而对文艺创作和批评所提出的非常实际的原则性要求。这个原则性要求，从当今社会发展与理论演进的大背景上看，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则在某种程度上把文艺的接受美学同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提了出来。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阅读心理学、阅读社会学、接受美学的兴起。这些新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趋向，即将他们所关注的文艺实践活动从文艺创作转向文艺接受，所强调的文艺主体由作家、艺术家，向读者、观众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文艺实践活动在认识上的一种拓展和深化，是对文艺实践活动一种更富时代感的理解把握。“社会效果论”抓住了文艺接受者这个基本环节，来理顺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文艺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从实质上讲，即是把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的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系统进行调控管理的政策设计，把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工程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系统中来透视、运作。显然，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又是构筑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它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在于，这一原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总方针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它坚持了过去的文艺口号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但比之更准确地表达了新时期人民大众对文艺的要求；它包括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容，却比之更完整地体现了文艺的使命。

“社会效果论”要求文艺批评切实发挥批评的作用。具体要求文艺批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判断、检验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自由的环境里，注意不注意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社会责任感，使自己的艺术思绪、艺术创造的趋向符合社会的脉动和潮流；有没有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同祖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趋向和谐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能否达到以理想的科学的态度来进行有序的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对生活、社会、历史深邃的理解和阐释，并借助形象思维给予艺术的表现，使作品的生命服从于历史存在的规律。当然，从文艺批评的多重内容来审视，批评还有必要做到多角度地判断作家艺术家调控自己的艺术构想、艺术创造和艺术产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全方位地观察作家艺术家是否注重避免把自己可能有的偏激认识和理解投入到文艺作品中，带进流通领域，从而对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产生不利于社会有序前进的影响；深入地检验文艺作品能否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感悟和理解，对现代化规律的把握展示在作品中，从而透过作品来教育新一代的现代化建设者，激励他们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

---

《邓小平论文艺》，第17—1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教育那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抱有不切实际的认识和理解的人，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观念，从而减弱、清除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消极因素。由此可见，“社会效果论”对文艺批评的总体要求是很高很重的。

由于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多种层次，作为文艺批评当然不可简单化地去对待。同时，社会实践对文艺的检验，也并非短时间就能够得出结论的。检验需要时间。对某些有争议的作品而言，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出它的真正社会效果。因此，批评一部作品切莫主观武断、草率从事，根据一定时代的情绪匆匆下结论，而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通过长期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检验它的价值，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文艺作品社会效果这一批评原则。我们知道，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微观上看，它是指作品思想性与艺术价值对读者观众的影响。从宏观上看，它包括思想政治宣传、伦理道德教化、美化生活和增长知识的用途。由于文艺创作能反映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它的社会效益还可表现为对人的教育功能、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促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对政治斗争的鼓动功能、对提高道德修养和加强法制建设的约束功能、对艺术鉴赏的感染功能等等。而任何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事实上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功能。实际上，它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豁透出积极意义，应当说，这部作品就是富有价值的。文艺批评在考察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时，要充分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不搞片面性、简单化和绝对化。邓小平同志洞悉文艺的独特性质、独特功能和作用于社会的独特方式，他既从大局出发，又完全符合文艺实际地明确提出：一方面文艺家要注意创作、演出的社会效果，号召“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另一方面则有必要明确区分文艺作品社会效果好与坏的具体界限。在现阶段，社会效果好的作品能够“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发挥积极作用。能够“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肩负重要责任，起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作用。能够“同意识形态领域其它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对于来

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

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的危害性，进而“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

向”。对社会效果坏的文艺作品，邓小平同志又称之

为文艺界的“精神污染”现象。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

---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9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4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5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7 页。

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就不仅点明了那些搞精神污染的作品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性，而且对文艺批评判断作品的“精神污染”性质作出了准确的界定。为了使文艺批评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切中时

弊，邓小平同志还对种种“精神污染”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剖析：“近一两年来，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而有的人则“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传文学艺术的最高

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另有的人“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针对有的同志对“精神污染”掉以轻心的情况，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而敲响了文艺批评重要性的警钟。

文艺批评在判断、分析、衡量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不一致的评价。为此展开讨论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其中既包括批评，又包括了反批评。这就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思考，批评家不能只以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判断作品的实际，而应该在按照科学的批评方法去评论作品的同时，更多地去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树立“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由人民来评定”的观念。实际上，文艺批评在判断检验作品的效果时，不能单单依靠少数人的主观检验，更重要的需要由社会实践去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去作历史的评定。这是因为，人民作为生活的主人、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及审美主体，对于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当然最有发言权，当然是最有权威的评定者。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文艺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才能有助于衡量出艺术作品思想和艺术统一的程度，也才能最终正确地判断作品的精赢、好坏。我们的文艺批评应当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 第三节掌握批评武器遵循科学的批评方法

文艺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我们坚持和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目的在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团结更多的同志前进，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这就要求，开展文艺批评一定要掌握好批评这个武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严格按照科学的批评方法去评论作品。在批评中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通过民主讨论、交换意见，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来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去克服假恶丑。而一定要避免打棍子、搞围攻、搞运动。当然，在坚决执行“三不主义”的同时，也要求文艺家“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从而使文艺批评能够真正帮助文艺工作者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美学观，促进他们与生活、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和艺术水平，进而创作出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来。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鞭辟入里的论述。新时期十几年来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正是由于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正确指导思想，注意和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才开创了文艺事业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开展文艺批评，首先要坚持原则，切实掌握批评的武器。邓小平同志按照文艺创作的规律，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胆略，提出了“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的意见。这对活跃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不啻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巨大跨越。同时，邓小平同志针对思想文化战线一度确实“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的“处置无力”现象，深刻地指出，“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而对错误倾向保持缄默，不敢批评和不愿自我批评，说到底是一种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不仅损害了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而且会导致把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入歧路，削弱甚至取消对有错误倾向、不好作品的正当批评。这当然是很不正常的，必须根本改观。为之，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对那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是否开展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在当前的文艺批评中，四项基本原则不但不是“棍子”，而正是我们评价文艺作品、明辨美丑、区分善恶、衡量政治水平思想内容高下的标准和“圈子”。对那些社会效果不好，特别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损害作用的文艺作品，“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对那种“抵抗批评”的反常现象，邓小平同志富有针对性地予以解释：不能认为开展批评就是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6—17页。

的问题”。“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为此，他进而号召“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对于文艺批评有时出现的方式方法不够好，从而引起文艺家反感的情况，当然是需要注意的。然而面对文艺批评的根本职责，我们应当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即“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30年代，有一种文艺批评近于谩骂，方式方法当然不足为训。因此有人就提出取消批评。鲁迅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糊糊糊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正是这个大道理，文艺批评作为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要完全正确地评价一部作品，写出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艺创作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文艺批评也应该这样。不能因为一篇文艺批评文章的方法不好，某些提法不够周密，或者某篇评论尚不成熟，甚至出现偏颇和失误，就以此为理由连文艺批评本身也否定了、取消了。邓小平同志在阐释这一道理的同时，关切地指出文艺家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唯有这样，才“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从而更加完整、更加辩证、更加透彻地讲清了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怎样由各自的角度坚持开展批评和正确对待批评的原则。为了使得我们对于坚持开展文艺批评的精华有更贴切的理解，邓小平同志还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一文中，对个别作品的错误的政治倾向及其危害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说理的批评，从实践上树立了坚持文艺批评，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的榜样。

开展文艺批评另一个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溢美，不掩恶，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实在是文艺批评的基石。文艺既要歌颂，也要暴露，歌颂和暴露都要实事求是。歌颂如果不实事求是，就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走向反面。同样道理，暴露和批判也要实事求是。那种不是严肃地挖掘丑恶事物的根源，只是靠渲染展览丑恶现象来招徕读者观众，不可能起到好的社会效果。文艺批评也是如此。那种对一些新老名家不实事求是的廉价颂扬、一味吹捧的倾向，那种小题大作，抓住作品某种缺点和误区无限上纲的“大批判”，那种对文艺领域、文艺作品中明显存在着的错误东西不批评、不讨论、熟视无睹、回避矛盾的做法，都距离实事求是精神甚远。恩格斯针对德国资产阶级理论家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说过这么一段话：“简直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写过好作品，没有一个人没有杰出的创作，没有一个人没有某种文学成就。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企图，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

---

《邓小平论文艺》，第1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6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7页。

《鲁迅全集》第5卷，第35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鲁迅全集》第4卷，第395页。

掬客的热情，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结合当前文艺批评的实际，我们应当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情景中获得启迪。提倡文艺批评的科学性、战斗性、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那种无原则的颂扬，扭转那种只讲好话的风气，无疑成为我们开展文艺批评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注重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就一定要善于“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批评的一切判断评价都要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说理地、科学地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与人为善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捕风捉影，不要无限上纲，不要主观武断，坚决防止过去那种“左”的批评方式的回潮。“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譬如针对一部具体作品，就不能随便给人家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自由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其实质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而不是其它什么。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品，就不能把什么都划入“自由化”的范畴。文艺批评当前最需要的是多一个，而是多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多一点对中国国情、中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的切实了解和研究，多一点对文艺作品、文艺现实具体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须知，文艺批评同样是要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还有一个需要注重的基本原则是它的功利性。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观点：“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是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文艺功利性的取向，显示着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观点、及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党的态度。另外，作为观念形态的产物，其作品也是衡量一个文艺工作者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还是违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故而，“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批评理应突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性标准。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主导方面是思想性。”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个标准不能割裂，只能统一。他对政治标准的具体解释是，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主要是“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对于现代文艺创作，则看其是否是“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人民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又提出了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对艺术标准的界定是，“一切艺术性较高的，则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页。

准”。这个“一切”当然包括文艺创作和批评在内。评判作品“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下鉴定。当我们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演进的广阔背景来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学说，就会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社会发展的自然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历史逻辑的必然归宿。

政治标准随着时代的前进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艺术标准本身也不是凝固的，而是发展的。我们“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在现时代，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应当“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文艺批评扫描作品的目光在落到上述方面的同时，还应当留意审视作品是否做到了文艺的民族化与进步的、革命的时代风格相统一；是否较好地表达出民族的现实与历史、民族的心理、风习与思想感情；是否努力以较完满的艺术手段（包括尽可能多的艺术的独创性、文风的准确、鲜明、生动，语言的民族化等等），从而编织成色调绚丽、气势夺人、布局跌宕的画面，放射出广阔的艺术张力，借以高度地表现进步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二者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则是恩格斯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和进行文艺批评的起点。显然，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是把“统一论”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核心来看待的。这个“统一论”，完全符合文艺批评的规律。因为从文艺批评的客体看，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绝对没有不包含内容的形式，也没有不依赖形式来表现的内容。这就从客观上对文艺批评提出了必须从整体统一的媒体上去感受、去评判、去审美具体作品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两个标准的论述既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完全符合当代文艺的现状。

文艺批评的功利性与多样化并不是矛盾的。功利的目的应当是对时代精神、即社会主义主旋律的观照，但完全可以用多种形式和风格来表现。无论是需要把功利性强调到何种程度，都丝毫不应该妨碍文艺批评的充分开展。毛泽东在提出鉴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时专门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

实践证明，单一的批评方法不可能导致文艺批评的活跃和进步。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吸取我国古代的传统文艺批评方法，借鉴外国的批评方法中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以拓展文艺批评的思维空间，丰富文艺批评的形式。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8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3页。

文艺批评最终是要落实到接受主体——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身上的。要让接受主体真正接受批评，就有必要在改善和加强批评方面做文章。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批评一定要掌握政策，讲究方法，“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注意“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即就是对于倾向性的问题，也“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的错误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实践证明，做到了这些，文艺批评才能真正起到解决思想问题、纠正倾向性的错误的作用。改善和加强文艺批评，首先要进一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我们虽然很少听到那种公开提出反对和取消文艺批评的主张，但鄙薄、忽视文艺批评的思想却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有的同志干脆把创作和批评对立起来，认为文艺批评主要是向读者、观众阐述作品的社会思想意义，对于创作过程并不直接发生作用。因而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可以忽视批评。这就把原本是相辅相成的两翼人为地剪去一翼，使之平衡被破坏，最终不仅仅是削弱批评的价值，而且势必影响创作的发展。文艺批评是一种艺术认识活动。它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而体现出某种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别林斯基把文艺批评称做“不断运动的美学”，道理就在这里。批评所提供的艺术认识，一旦被作家接受，就必然融和到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里去，成为有机整体中的新的细胞。因而凡不绝然排除理性的作家，不否认人生观和艺术观具有指导作用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就不能抹杀文艺批评的指导作用。阿·托尔斯泰说，“批评家应该是一种无情的声音，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在绞尽脑汁工作的时刻，这个声音就要求作家极其冷静地选择、观察和衡量每一个形象，每一个字眼”，点明了批评家的见解不仅足以扩拓作家的视野，为作家提供有益的参照系，而且能够直接影响作家提炼素材，塑造形象，对创作发挥直接促进作用的道理。在解决好对待批评的态度方面，邓小平同志还谆谆告诫作家，“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尤其是对于一个正在奋进的作家来说，指出其作品的不足往往比赞扬其优点更加切实有益。这是因为，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理应比读者和批评家要求更严格些。《我的大学》发表后，受到罗曼·罗兰的高度赞赏。可高尔基并未沾沾自喜，他更希望的是能有犀利的批评意见。他甚至宣称，“如果由我来写一篇批评高尔基的文章，那将是最凶狠、无情的批评”。在批评与团结的关系上，邓小平同志认为，文艺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文艺队伍的团结，一切批评都必须围绕着这个前提进行。他说：“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文艺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45页。

《别林斯基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4页。

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讨论和批评“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作为一门科学的文艺批评，是推动和指导文艺创作的最主要方法之一。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文艺批评方法显得相对简单生硬？为什么每每注重思想评论而忽略艺术评论？为什么在进行思想评论时又多是那么干巴巴的八股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文艺批评是一门科学，对于它的规律和特点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常常是按照政治需要而不是按照艺术规律来评价作品，从而造成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不平衡以及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有了长足的进展，但要取得根本性的改观，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切实掌握、正确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武器。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

### 第十三章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与文艺的繁荣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处于基础和中心的地位，它冲破了重重阻力，在不断健全自身机制的过程中前进。80年代后期，人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反反复复，莫衷一是，理论上的困惑，影响到经济改革的步履蹒跚。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郑重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提出到真正建立，将是一个不短的过程。然而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生产力社会化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它是历史地存在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并把它的影响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已有的变革和新的变革，不仅极大地震动我国的经济领域，改变我国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式，也将极大地震动我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对文化艺术原有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以及供需格局形成很大的冲击波。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艺术市场迅猛发展，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把竞争机制引入了文艺生产，给文化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新的艺术门类和新的娱乐方式，满足了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由于我国文化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在它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亟待克服的问题，严肃的艺术创作出现了读者、观众人数锐减的局面，某些从事严肃艺术生产的文化团体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一部分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文化管理工作产生了十分矛盾的心情，使他们陷入了困惑和迷惘之中。我们认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出现这种状况是难免的。我们应当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伟大变革，认识到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蒂是受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可免地影响着我国的文化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是，让思想跟上飞速发展的改革形势，清醒地正视现实，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挑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个变革，推进这个变革。

## 第一节当代文化艺术走向市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艺术观念十分狭窄、短视功利，强调文化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忽视文化艺术的现实生产形态，夸大文化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功能而淡化文化艺术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一部分文化艺术工作者，受传统的文化观念的影响，把文化艺术观念与经济观念片面对立起来，以为文化艺术不能成为商品，文化艺术只能是事业不能成为产业，否则有损于文化艺术崇高的精神品位。实际上，文化艺术虽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但其物化活动过程同样具有一般物质生产的特点，也受到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早就指明了这种关系。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政治、法律的观点以及宗教、道德、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等，统称之为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蒂是受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纵令文学艺术是远离经济基础飘浮在上空的上层建筑，但是这种根本性质仍然不变。原始社会的文艺，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经济基础对于文艺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不再像原始社会那么简单和直接，而是表现得更加曲折和复杂。人类文艺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最重大的变革，都与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是不能分离的。当然，这种关系又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上，文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往往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在文艺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是最后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这里，文艺的发展除了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外，同时还受到上层建筑的政治以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之，文艺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往往会出现某种反差。但这只说明文艺与经济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能说明文艺不受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我们从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上看到，经济始终对文艺的性质和文艺的生产形式起着根本性的最后的决定作用。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反映的人们的思想感情、所采用的物化形式，都是特定社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从文艺的现实生产形态看，文艺更是无法摆脱经济的制约。传统的文艺观只看到文艺是一种精神创造，是创作者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而忽略了文艺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是生产者主要为了满足消费者这一事实。原始艺术是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和原始宗教服务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

就产生了专事艺术生产的专门人才。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地指出：“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艺术作品就是作为商品而创造的，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艺术家自己所用的。承担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和保护人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和封建贵族、宗教僧侣、政府官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决定者，艺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商品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把每一种艺术的产品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步地变为商品市场。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总之，文艺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类商品的生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为金钱而艺术”还是个别的现象，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金钱而艺术”则演变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文化艺术不再仅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同时在社会经济的制约和驱动下朝着日益明显的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力——文化艺术生产力。

文化艺术这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艺术成为产业最直接的原因是社会分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过两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第二次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第二次分工，意味着一批专事精神生产的人相对独立地从事非物质资料的生产，对于文化产业的形成具有直接意义。文化艺术成为一种社会产业，首先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生产力，虽然不像物质生产那样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物质财富，但是，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动力，其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文化艺术生产劳动也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由人的活动引起的物质交换过程。一方面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审美活动；另一方面主要通过运用和改变自然的物质，使人的精神创造的成果获得物质的载体，成为书籍、绘画、雕塑、建筑等等艺术和科学的产品。文化艺术生产正是因为这种物质生产的属性而成为社会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生产力具有两种，即物质方面的生产力与精神方面的生产力，文化艺术在体现它精神文化功能和效用方面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在实现其物态化过程作为生产“物质产品”时就同一般的社会物质产品生产一样，具有一定的生产条件、生产能力及其内在结构即生产力。文化艺术的这种生产力是，包括具备一定审美能力和各种技能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各类文化艺术生产的物质工具，还有特殊的劳动对象即文化艺术消费者。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产业，还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艺术作为“物质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必然在“交换”的过程中走向“商品化”。文化市场在沟通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中具有重要作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有生产的繁荣，才会有消费的繁荣。文化

---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70页。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艺术生产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源于生产决定市场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受制于文化艺术生产所具有的相对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一般社会物质生产，是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文化艺术生产则不完全相同，不完全为消费所左右，它不是以赢利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以促进人类精神文明为最高原则与最高目的。因此，文化艺术消费对文化艺术生产的制约与影响，相对于一般物质商品的消费与生产的制约与影响要小些，而生产对于消费的决定作用则更明显些。即使如此，文化艺术生产的投入与产出及其营销过程都受到市场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市场交换关系、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竞争和市场赢利等经济因素不同程度地规定着文化艺术生产的结构、规模、形式和质量等方面。文化艺术产业的投资意识、价值补偿意识都与经济意识密切相关，都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制紧密相联。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产业也自然在社会经济的大循环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正在形成，文化艺术从旧的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与模式中走出来，面向文化市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符合规律的“文化”与“经济”接轨，看成是一种“文化”在金钱冲击下的失足。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人们缺乏文化艺术产业意识，加上现有文化艺术管理体制与机制上的某些缺陷，整个文化艺术生产发展很不平衡，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现象，片面追求利润，以致于忽略精神生产崇高目的所作所为，引起精神生产界的极大忧虑。毫无疑问，这些不合理现象都是文化面向市场后产生或加剧的，但不能认为是无法克服的，它们都是历史必然规律的派生物。只要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寻求在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之间的最佳位置，确立文化艺术作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生产部门的应有位置，文化艺术就会日益健康繁荣。

## 第二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文艺生产力

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艺术的生产力是否能得到全面的解放。解放文学艺术生产力首先要解放文学艺术观念，破除旧观念，建立起一系列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观念。既看到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又承认它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既看到它是一种审美的精神创造，又承认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对某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观念如文艺不能成为商品，文艺不能讲经济效益等观念进行更新，需要逐渐确立一系列新观念，包括文艺的商品意识、产业意识、市场意识、效益意识等。这对于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动文学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满足文学艺术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以及进一步最大限度地解放文学艺术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把文学艺术的生产从国家供养的“大锅饭”推向文化市场，对作家艺术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解放。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把作家、艺术家从依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金钱豢养下解放出来，使他们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新生政权服务，不再为衣食发愁。应当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写作思想上的解放。但是由于政府供养作家艺术家的这种机制本身的缺陷和具体执行者实践上的失误，也给作家、艺术家造成了新的束缚。很多时候，作家、艺术家服从政府需要，服从人民群众需要，演变成了服从临时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意识形态的职能部门也难摆脱狭隘观念的束缚，总是要求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服从政治任务的需要，强调作品的教育宣传功能，甚至对“写什么”、“怎么写”作出具体限定。因之，作家艺术家的独特的生活体验，对生活的独立认识，往往难以自由发表。另一方面政府供养创作人员，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或者奖罚失当，也使文艺创作生产力失去活力，许多时候努力创作和不创作一个样，甚至不创作胜于创作，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地妨碍着文艺创作人员的主动性的调动和发挥。

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文艺生产国家全部包揽的情况有了变化，取消了大部分对出版社的补贴，促使出版系统进入了商业化的市场经济轨道。商品化的市场机制影响着文艺作品的出版。某些出版社为了追逐利润，竞相出版畅销书，即使是某些控制出版的文学作品，因为能带来高额利润，出版社也常常想方设法钻空子出版。各家出版社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了解读者的需要，揣摩哪些书可能畅销，畅销书的出版周期也大为缩短。于是，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同文艺的消费者广大读者需求的距离近了。市场机制促使出版社重视读者、重视畅销书的作者，以优惠的稿酬争夺畅销书稿。商品化的市场机制有可能帮助作家逐渐重视读者的需求；逐渐脱离受供养的地位，走向依靠自己稿费谋生的职业作家之路。尽管这也会给作家艺术家带来一些新的束缚，但从总的倾向看，无疑是文艺生产力的一种解放，激励机制刺激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力。商品化的市场机制进入文学，都较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它帮助作家、艺术家摆脱传统的束缚，面向较广泛的读者群。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的商品化是以市场为归宿，以读者的需求为归宿，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得到了普遍的重视。过去我党一贯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往往在实际上忽略了群众的需求。“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几部作品和

“八个样板戏”供群众阅读观看，就是导致极端的无视群众需求的典型例证。即使在正常政治生活状态下，文艺的领导部门对文艺的要求也较多注意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有意无意地漠视群众的需求。而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读者的需求更能有力地指挥作家的创作和出版社的价值取向。因之，作家和出版社便不能不郑重地对待广大读者的需求，积极地适应他们的需要。当然读者的需求不见得都是正确合理的，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们需要文艺，常常停留在较低层次上，是在工作劳累之余用作消遣娱乐的。80年代曾经先后出现过“金庸热”、“琼瑶热”，而一些严肃的高雅的文艺作品却较难热起来。社会需求最大的是消遣娱乐的文艺，而它们的艺术价值一般较低，甚至少数作品散布了一些不健康的情调。但从整体上看，畅销书、通俗文艺也是当代文化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从多方面满足了最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无疑是合理的，应当重视的。对群众的这种

需求漠然视之，甚或压抑，那么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就很难全面实现。只有在满足这种需求的基础上，积极适应和引导提高，既注意群众眼前的直接利益，又注意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才是真正的为人民群众服务。所以，文艺作品走向市场，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走向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不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步骤。它促使作家艺术家以最大

的兴趣、更多的精力去深入新的生活历史进程，熟悉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格局中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一种强制的力量，促使

作家艺术家与新的群众生活相结合。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生活最密集的信息中心，同时也是社会、人生、感情最密集的信息中心，这又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社会、了解

民情提供了最好的窗口和渠道。过去我们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作家艺术家出于一种理想精神选择人民，实践上却难以保证。现在市场功能强制作家艺术家选择

人民，同时，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化为人民通过市场选择作家。这是人民与文艺家关系中历史主体转移的真正实现。“人民是文艺的主人”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确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可能进一步密切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文艺“二为”方向的实现。群众的多种需要只有文艺的“百花齐放”才能满足，群众的多种思想观点只有开展“百家争鸣”才能得到正确引导，我党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建立在人民群众需要基础之上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双百”方针在“为人民”这一根本点上契合的，因之前者为后者的实行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市场经济打破许多束缚，开放搞活，实行公平竞争，这种体制的“放”、“争”的特性，与文学艺术百花齐放之“放”、百家争鸣之“争”形成内在的“同构”。这种契合将使“双百”方针在最大限度上摆脱各种行政的、人事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心理的干扰影响，得到切实而稳定的贯彻。人民群众的意见在转化为市场选择之后，将难以逆转。市场的动态选择机制将对文艺创作的竞争作深层的启动。群众认可的人才和作品将冲破种种板结层，得到发掘、成长。尤其那些生活在群众之中的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那

些文坛的未名人，在得到市场所赐予的公平竞争机遇后，将会脱颖而出。那些富有成熟经验的作家，也会得到生活的滋育，在群众需求的刺激下不断调整自身，使自己的创作激情得到新的焕发。

我们的文学艺术多年来一直在政府部门统揽统包的管理体制下生存和发展，文学艺术的投入产出是按政策运行而不是按生产规律进行，文学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不是遵循社会互动机制调适而大都是人为盲目或强制调控，经常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与冲突，发展极不平衡。同时，仅靠国家投资，文学艺术产业化的条件很难快速得到改善，文学艺术生产者的素质普遍不高，文学艺术生产的物质生产条件相当落后。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应这种要求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必然是对文艺生产力的解放。文化市场在沟通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消费刺激着生产，生产丰富着消费。由于文化艺术生产的产业化，人们的投资意识也在起着变化。人们愈来愈清晰地看到，不能只加强经济建设的投资，也应增加文化建设的投资，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增强文化艺术产业的投入，改善文化艺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提高文化艺术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文化市场近年得到了迅猛发展，它把竞争机制引入了文艺生产，给文化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新的艺术门类和新的娱乐方式，满足了人民群众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利税收入，改善了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加强了区域性、国际性的文化艺术交流，传播了民族文化，增强了相互溶合吸收。

总之，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新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中的积极因素，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在促进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中，更好地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消极影响和不利因素，在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和行政法制管理的同时，适当运用经济杠杆来实现对文艺事业的宏观调控和审美导向，以保证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贯彻执行。

### 第三节正确认识文艺产品的双重属性，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文艺生产适应市场经济，进入市场，是由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决定的。马克思曾说过，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他认为，作为商品，它直接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同时，它只有在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中才是商品。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商品最起码的规定性就是，它不是用来供自己消费，而是卖给别人，同时交换回生产者所需要的别种物质；它是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因而它是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这些关于商品的一般定义，完全适用于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文艺产品。对于我国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从事文艺生产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手段，或者至少是他们谋生手段的一部分。文艺产品，都和物质商品一样，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其使用价值完全是在流通过程中按照商品交换的方式，在满足了他人的社会需要之后实现的。另外，文化市场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市场机制对文化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参与文化市场流通、交换、消费的绝大多数文艺产品具有商品属性。

看不到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不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就会使文艺生产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仅仅只看到文艺作品的商品属性，不认识它的特殊属性，只按市场运行规律，以追逐利润为文艺生产的目标，便会造成文艺生产的某种混乱与萧条，就会使一些有害的“文化垃圾”充斥市场。综观世界文艺的发展，我们便会看到文艺作品进入市场，一方面促进了文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束缚，一定程度的金钱对文艺的控制。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控诉。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大多以揭露金钱对“人”的“异化”为主题，对以金钱为标准的社会持批判态度或者蔑视态度。甚至早在17世纪，布瓦洛在《诗艺》中就谴责那种为金钱而创作的作家。贝多芬也曾把一本牟利的小说掷之于地并气愤他说：“这个家伙写作就是为了赚钱”。可见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虽然创作是为了糊口，要拿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但他们更重视的不是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而是文艺作品的特殊属性，他们力图表现的是对生活的体验和评价。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陀斯妥也夫斯基，在欠下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为还债而创作。但是他们在创作时想的并不是如何去迎合读者，增加作品的销量，而是力图表现自己的生命体验，揭示人性受到的束缚，社会对“人”的“异化”。文艺作品的这种特殊属性，也就是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并不完全与它的审美价值一致，它经常处在多重矛盾之中。

即就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看，它与物质产品也有不同的属性。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不是指它的思想艺术价值，而是指它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因此，1卷‘普罗佩尔提乌斯歌集’和8盎司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

在这里，作为衡量交换价值的“量的关系”的尺度，是指生产这两种不同的

产品需要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需要大致相同的劳动量。不过，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物质产品容易，对精神产品就困难了。而对文艺创作，就更不可能像物质产品那样精确地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做一张桌子需要多少工人，制成某种产品，需要某种劳动量应多大。许多“非物质产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达到某种结果所需要的某种劳动量多大，和结果一样，要靠猜测。我们

知道，即使同一门类的不同艺术家之间创作一部作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也难以精确比较。李白是斗酒诗百篇，而贾岛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虽然说得都有些夸张，但差异确实非常悬殊。甚至同一个作家耗费了大

量精力和时间的作品，却不如偶一为之的作品卖价钱。

因为，文艺作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基本上只依据于生产文艺作品的物质外壳或文艺价值的物质载体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要印张相同的书籍，不管它是古典名著还是通俗作品，其市场价格或商品价值都是差不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商品价值在市场上把不

同文艺作品的不同思想艺术价值统统都混淆了。比如被马克思称为“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的密尔顿”，耗尽了自己的心智，其结果只得了5英镑。贝多芬一生创作了那么多美妙的奏鸣曲，每个曲子都要耗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然而他只能得到30至40杜拉，他说：“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近年来，我国一些思想艺术价值高的文学作品，只能拿一般水平的稿酬，而一些粗制滥造的畅销书稿，却可以哄抬到很高的稿酬。这就是说，市场几乎不考虑文艺创作的复杂与艰辛，它主要取决于供需需要，文艺作品的商品价值一般只反映生产这些作品物质外壳的劳动量。

文艺作品的特殊属性不仅表现在它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还在于它的思想艺术价值，也即它的审美价值。它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它是人对自己改造现实、改造自身的活动的关照，着重表现人的情感和内心生活。文艺作品从根本上说是文艺家充满激情的个人创造，是文艺家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任何一个真正艺术品的创造，不但凝结着创造者的全部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还渗透着创造者的人格力量。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不能以商品价值来衡量，而应以思想艺术价值来衡量。恩格斯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曾说：“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恩格斯对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些论述，明显地不是指作品的商品价值，而是指思想艺术价值，它是作家激情的创造，它是作家对社会的独特体验和认识。所以，我们在认识到文学艺术

---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11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产品是具有商品属性的同时，还要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这后者正是它的本质所在。为了维护它的这种根本属性，我们就不能完全由文化市场支配文学艺术生产，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走文艺商品化的道路。假若只讲价值规律，搞拜金主义，为了赚钱不惜销售精神鸦片，满足部分消费者的不健康的趣味，那就完全违背了文学艺术的崇高目的，违背了社会主义文艺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要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它方面也有表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组成部分之一的文化艺术生产；应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们要辩证地把握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尽可能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不仅范畴内涵不同，而且其目的、规律和要求也存在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会发生严重的背离甚至对抗。艺术价值服从于艺术自身的目的，受艺术的本质和规律的制约，并要求艺术家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度责任感，通过艰辛的创造性艺术劳动为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艺术作品的商品价值，则完全取决于市场的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以求经济上的赢利。因之，艺术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之间，显然不可能完全一致。面对这一现实，一方面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地寻求艺术生产与市场规律的契合点，促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团体就应发挥真正艺术作品的保护者的作用，通过法律和政策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进行有力的调控。事实上，现在已经步入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某些西方国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艺完全交给市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对文化市场听之任之。

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涌动下，在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势态。通俗艺术借助市场经济的活力蓬勃发展，高雅艺术却处境窘迫艰难。我们说的通俗艺术，是指广大读者急需的基本属娱乐型的文艺作品，它的生产比较容易，接受者不需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因之，它的读者面广，容易在市场上畅销不衰，所以近年来在规模和品种上都非常繁荣。我们应该看到这基本上是健般的，任何时候，最大多数人的需要都是不可漠视的，通俗文艺属于普及性的东西，满足着最大多数读者的需要，对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文化市场，都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健康的作品，产生着消极的影响，我们应当抵制、消除。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通俗文艺本身，也有个引导和提高的问题，这样才能使它永远充满活力。

与通俗艺术相对的便是高雅艺术，它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 and 文明程度，是文化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精神活动的深层境界，是艺术家创造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

精神和创造激情的高度凝练和结晶，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明宝库中最宝贵的部分，是社会理性的标志。在优秀的高雅艺术作品中，既继承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融会了优秀外来文化的精华。它的读者面一般较窄，因之进入市场便显得窘迫。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作品的主要目标，不是创造经济效益，而是创造更多的代表我们时代水平的民族文化精品。因此，对高雅艺术，国家要养，社会要资助，自身也要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最佳的位置和发展道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也不是截然对立的，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也有相互转化的因素。我们应当分别不同情况加以引导和指导，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制定不同的对策，从而真正实现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共荣并存，互相促进，创造雅俗共赏的最高艺术境界。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为通俗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从根本上为高雅艺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学习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关于思想文化的有关论述，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艺术繁荣的健康道路，这便是进一步密切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逐步调整与健全文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合规律的关系，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不断促进社会理性和健康审美趣味的普及与提高。坚持文艺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的统一，始终把社会效果放在首位。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又要突出主旋律。在促进文化市场的建立中，既要重视市场作用，又要对社会负责，需要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对宣传文化事业进行调控。使精神产品的生产，遵循社会主义制度对文化的基本要求，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面临一个较之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但却是一个使文艺生产力获得更大解放的充满活力的天地，繁荣发展之势日益明显。

## 第十四章邓小平论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第一节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历史已久。党从一成立开始，就积极团结和联系进步作家艺术家，开展革命文艺活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这一伟大文献，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总结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总结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的产物。《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阶段，也标志着党对文艺的领导的成熟。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到来的重要历史时期，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表了《祝辞》。《祝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进一步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新鲜经验，打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征程，标志着党对文艺的领导跃上了一个新的科学境界。

从《讲话》发表以来，党在对文艺事业的全面领导中，积累了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是成功的、正面的，但也有失误之处。从邓小平同志的《祝辞》和其它有关文艺的论述看来，邓小平同志认为，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实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全部经验中最主要、最根本的经验。其它如：教育和引导文学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动员、组织文学家深入火热的时代生活，“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尊重艺术规律，“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等等。这些经验，都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应当长期地坚持的。

现从建国后的几个不同发展时期，对这一基本经验作以阐述。

一、十七年间，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一度出现了违背艺术规律、行政干预过多和过火的政治批判等“左”的错误倾向

建国至“文革”（1949—1966）的十七年间，党在文艺领域坚持了“二为”方向，并从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双百”方针；同时，帮助文学家成立了自己的专业性、学术性群众组织（包括文联及各协会），动员、组织文学家深入新的时代生活，都对文艺的繁荣、兴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曾针对各个时期文艺工作的实际，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里程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党中央于1962年4月30日批转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促使我

---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4页。

国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措施，至今看来仍具有借鉴价值。一大批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内容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相继问世，正确描写了典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其它种种美好的事物，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赏。十七年间，创作、出版了各类文艺书籍 6.5 万多种，生产故事影片 600 多部、美术片 270 多本。长篇小说《创业

史》、《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日》；戏曲《将相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十五贯》、《芦荡火种》、《红灯记》、《朝阳沟》；电影故事片《白毛女》、《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李双双》、《上甘岭》、《林则徐》、《甲午风云》、《祝福》、《英雄儿女》，……是最为群众关注的几个艺术门类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此同时，党在这个时期对文艺的领导上，也曾出现过某些“左”的偏差。如，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要求文艺家“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推行“领导出点子、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式；号召“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片面追求数量；把艺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

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对一些作家艺术家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等等。

邓小平同志这样总结了这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战争年月确曾产生过一定积极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逐渐暴露出它的“利少弊多”，助长了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倾向，使一些作品变成了政治概念的图解、演绎或说教形式，失去了应有的艺术力量。“写中心”之类的口号则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推向极端的产物。它无视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的选材自由和心境自由的艺术规律，也无视群众的多样化审美需求，是一个强使文艺园地单一化、划一化的口号，一个束缚文艺家、桎梏文坛艺苑的口号。至于：“三结合”的创作方式，则是把复杂的精神劳动简单化的错误主张。艺术作品的思想、题材和技巧是一个有机整体，艺术创作是渗透着主体感情的形象思维过程，搭积木式的三方拼合的方法不可能产生成功的艺术作品。风行一时的“三结合”创作小组的所谓“创作”多是不成功的。至于人人写诗、人人创作，在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还远未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的“人的最后解放”的现时代，是不切实际的。而把艺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对文艺家进行批判，则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极“左”的错误在文艺领域中的表现，也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对

---

《邓小平论文艺》，第 9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 页。

冤假错案的平反和一批艺术鲜花的“重放”作了结论。艺术作品总体现着文艺家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独特评价，当这独到发现和独特评价尚未被社会认识或领悟的时候，应当容许让历史在未来给予评价，不能采取“左”的、主观武断的、简单化的态度。这是一条不容漠视的规律。

二、“文革”十年，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政策，桎梏着文艺创作的繁荣

林彪、“四人帮”从极“左”的方面，全面歪曲、篡改了党的文艺方向和方针。1966年2月，林彪指使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种颠倒是非的估计，完全否定了党在十七年间对文艺的正确领导，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显著成绩，给文艺界以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劫难。在反对“黑线专政论”的旗号下，开国以来的几乎全部文学艺术作品都被打成“毒草”、“黑作品”、“迷魂药”，遭到禁锢；几乎全部作家艺术家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黑帮”、“黑作家”，遭到诬陷和迫害。泱泱十亿大国，仅剩下一两位作家、几出“样板戏”。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造成文艺园地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在他们猖獗作乱的十年间，仅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文艺界泛出了生气。为了纠正江青一伙以高压手段“领导”文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这一年，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文艺政策要调整，并批准解放了一批被禁锢的电影，在文艺领域内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工作。长期受到精神压抑的作家艺术家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但好景不长，文艺界刚刚泛起的生气便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而重归肃杀死寂。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他们“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理。林彪、“四人帮”使文艺与人民相背离、相对立，人民享受不到真正的文艺，而他们却以伪文艺愚弄人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背叛，是对艺术根本规律的公然嘲弄。他们对文艺工作者的“领导”，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领导”、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他们作乱的开端便铸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文艺发展的沧桑正道是不会为他们的为所欲为所改变的。

三、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尊重艺术规律，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文艺园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新局面

新时期到来之初，党中央便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决策，着力扭转遭受林彪、“四人帮”祸害深重的文艺界的严重状况。至1979年10月，即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

---

《邓小平论文艺》，第3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5页。

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一切，是贯彻正确的文艺方向和方针的结果，是尊重艺术规律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则以党的文献的形态，更集中地体现了党领导文艺的方向、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体现了党对艺术规律的尊重。《祝辞》强调指出了文艺的时代使命、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建设性地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寄希望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而领导的着重点应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都是从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出发，对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所做出的、有力地指导现实文艺事业前进的科学经验。《祝辞》全篇，可以说就是党领导文艺的纲领。继《祝辞》之后，邓小平同志还有过多次有关党怎样领导文艺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论述。这些论述与《祝辞》一起，构成邓小平同志完整的文艺领导论，构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领导学。党的各级组织在邓小平同志的文艺领导思想指导下，大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与艺术家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艺术家个人的创造精神和创作才能大大得到发挥，文艺界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但是，在一个时期里，由于党的个别领导同志，“一手硬，一手软”，人们在解放思想、着重反“左”的同时，对有的东西缺乏足够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逐渐滋生蔓延了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化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而又复杂。早在1980年前后，就出现了以电影《苦恋》为代表的极少数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对文艺领导的作品与言论。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要对《苦恋》进行批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贯彻。邓小平同志于次年又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1983年，在文艺理论和创作中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文艺观和哲学观，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成为一股时髦潮流，“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也刮进了文艺领域，各种低级庸俗的东西呈蔓延之势。这年10月，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发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号召，但是次年底，在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却出现了所谓“两个不提”。从此，自由化在文艺领域进一步泛滥，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错误思潮的“体系性移入”打开了大门。1985年以后，

---

《邓小平论文艺》，第4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34页。

即：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理论文章、文艺作品、演讲中公开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而否定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一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全盘西化”。文艺的“二为”方向遭到责难，“玩文学”成为时髦，“性大潮”不断升级，某些宣扬资产阶级腐朽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观的作品、文章大为走红。面对这种严重状况，1987年初，党中央再次作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部署。邓小平同志于4月30日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但是个别领导却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文艺“少干涉，少介入”。于是，自由化思潮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加上国际大气候的影响，那些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被捧为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成为策划和组织动乱的“精英”，一些原本很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也迷失了方向。事实充分说明，在文艺领域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毁文艺又毁人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能容许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端正了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三个“必须”和“不能”、“不允许”，贯穿着反对错误倾向，既反“左”又反右，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这一精神的正确贯彻，保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宏伟工程的健康前进。1992年1至2

月，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指出：“现在，有有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虽然是就政治领域而言，但对文学艺术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指引下，文艺界继续解放思想，打开新境界，开创新局面，攀登新高度，形势更加喜人。

就这样，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不断前进。新时期的文艺发展史，就是反对错误倾向的历史，就是尊重艺术规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历史。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 第二节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的哲学睿智、深邃思想和战略气魄，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在回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行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包括文艺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全党全国人民已形成了共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而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一项重要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系统工程来说是如此，对于文艺工作来说也是如此。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地把坚持与改善并提，强调指出：“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关于在文艺领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本章第一节“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中已涉及到了。这里只着重点明：新时期以来文艺领域之所以出现形形色色的“左”的或有的错误，之所以出现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之所以出现党对文艺“少干涉、少介入”的错误主张，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多方面的根源，但重要根源之一，即在于对邓小平同志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思想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新时期文学艺术之所以从整体上看，出现了建国以来成绩最显著、最为繁荣兴旺的蓬勃发展局面，其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那末，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应当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呢？

一、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要在引导文艺家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关于文艺的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为文艺方针政策的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而花大气力、下大功夫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奋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同这条路线相适应，我们党还形成了各个方面，包括文艺工作的一整套方针政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体现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不断发展的无穷动力所在。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命根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5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42—24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3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1页。

针，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方针。但它又不是唯一的方针，与其相辅相成的还有一系列具体方针。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专业与业余并重；提倡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精

神生产要把社会效益作为最高标准并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进行文艺体制改革……等等。党对文艺的领导，要着力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着力于党关于文艺的方向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同

时，还要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对这些方针的贯彻执行中，还需要不断地予以丰

富、完善和发展。譬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市场、高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关系，仅靠现有的方针政策是不够的，应该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新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文艺家的呼声，并经过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要十分注意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谓“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主要是从方针政策上解决实践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中央来说是如此，对于地方党委来说也基本是这样的，我国是一个有着 56 个民族的、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的情况有许多不同之处。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导下，在中央关于文艺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制定适宜于本地情况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是必要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在引导文艺家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关于文艺的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党关于文艺的方针、政策上花大气力、下大功夫。

二、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就要根据各个时期文艺创作的实际，有所提倡，有所引导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党的领导不应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要努力优化文艺创作的环境和氛围，使“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但是，这绝对不能解释为对文艺活动、文艺作品产生何种社会效果一概不管。对“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要大力鼓励、提倡和扶植；在有益作品的范围内，实行突出‘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方针。文艺不等同于政治，文艺工作的大量问题并不构成思想倾向性问题，一般的艺术倾向、学术错误也不构成“左’、或右的政治倾向问题。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不仅因为许多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中有政治内容，文艺家理论家和文艺团体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有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而且因为文艺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组织领导不可能不与一定的政治倾向、政治路线相关联，就整个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而言也包含着一个

---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 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 页。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

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的问题。因此，在文艺工作中也会发生“左”的或有的错误倾向。党的领导对此不能不予以关注，在热情鼓励、提倡、支持那些激扬着时代精神的优秀创作的同时，认真纠正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

在对文艺的引导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1991年元宵节，江泽民同志在与部分首都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千方百计地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是文艺工作的光荣职责，是党和人民的殷切要求，也是文艺界为国家大局作贡献的表现。在党的十

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文艺工作“要重视社会效益，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1992年11月，他又指出：要充分发挥文艺对人民大众的教育功能。并响亮地提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1993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和崇高的职责。我们的文艺创作，总的来说，是要促使人们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培养和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当然，也要给人们在工作之余带来欢乐”。在与八届政协部分文艺委员座谈时，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在其它方面可以省一点来支持高雅艺术，我们的时代需要高雅艺术。”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对文艺创作、文艺工作中出现的新动向、新苗头的及时引导，对文艺创作、文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正确的举措和对策。这些重要指示，对于克服文艺领域一度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政治，排斥文艺的教育功能，否定文艺突出时代主旋律……等动向或苗头，都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对解决高雅艺术面对的生存困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论断，体现了邓小平文艺思想，体现了党对文艺领导的坚持和改善，也为各级党委和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做出了楷模。

三、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就要创造一种民主、团结、和谐的艺术环境，并不断予以优化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又指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这里强调的，一是“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二是民主作风。关于前者，如果说在新时期初期，主要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

---

见《文艺报》1992年11月28日。

见《文艺报》1993年4月10日第1版。

见《人民日报》1993年4月10日第8版。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10页。

错案、解决文艺工作者生活和创作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的话，那么，在十多年之后，应当主要在于创造和维护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良好社会环境。关于后者，虽然文艺领域的行政命令已经极少出现，但仍然存在继续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的客观任务。文艺界这样那样的不团结现象直接地影响着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艺活动的健康进行，也应当引起领导的重视。帮助文艺工作者解决团结问题，是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的题中之义。这几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要继续创造民主、团结、和谐的艺术环境并不断予以优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这应当是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重要课题。艺术环境的优化，是没有终点的。因为原有的问题解决了，还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进步，都将把人们的认识不断提到新的水平，站在新的水平上，可能会发现艺术环境的某些新的不适应艺术发展的因素，需要予以解决，从而使艺术环境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民主、团结和和谐的新优化。

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文艺单位的组织建设和文艺体制改革，特别要坚持对党员文艺工作者进行党性教育，发挥党员文艺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

员，然后才是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和文艺管理专家，党

内不能有特殊党员。每个党员文艺工作者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并用实际行动带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党的方针和政策。作为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要求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每一位真正的党员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在文艺创作中和理论研究中应当而且可以把党性要求与艺术个性的发挥结合起来，用既具有坚实的党性内容又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理论个性的作品和文章体现党的要求和理想，感染、教育读者、观众和听众，并在文艺发展中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应以文学艺术不断走向更大繁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要“领导好文艺工作”的时候，是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为根本标志和最终目标的。《祝辞》的最后，邓小平同志满怀信心地预言：“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并恳切地表示了自己对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信赖：“同志们一定会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祖国和人民汇报。”更充分地说明，邓小平同志把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是作为整个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作为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上面所列举的江泽民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无不以文艺的繁荣为目标。在十四大报告中，关于文艺工作只占很有限的篇幅，但江泽民同志仍然强调的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是“创造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以“繁荣”作为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来是最朴素的、最明确不过的道理，但却是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容易被忽略、被淡忘了的。党的各级领导只有时刻谨记着这一点，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才能是积极的、有实效的。

---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10页。

## 第十五章邓小平论文艺人才的培养

## 第一节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对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的高度重视，是邓小平文艺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邓小平文艺思想体系的这一重要方面，是基于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才理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便将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可追溯到60年代。在我国渡过了暂时经济困难以后，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就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主张。1975年，邓小平同志面对“四人帮”的作乱，力挽狂澜，主持中央工作，以注重科学知识的运用和人才的培养，实践了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主张。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个讲话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明确要求：“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他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可见，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是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数十年坚持一贯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趋深化的认识和主张。他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到了事业成败关键的高度，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然是两个概念、两个各有独立内涵的问题。但是，知识毕竟要靠人来掌握，任何知识都是人类在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开了人类的实践也便没有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键是尊重人才。人才即掌握并不断在实践中创造着新的知识的人，尊重人才便必然尊重其所占有的知识。

在我们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才问题的思想的深遂内涵的时候，有必要先就人才的概念、人才的结构特点、人才的主体成分等问题，作以简单阐述。

人才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一般他说，指那些有较大贡献的或出类拔革的人，知识分子是其核心或主体部分。

人才在范围上相当广泛，可以看做一个从低限开始向上的半开区间。具备一定素质的人都可以是人才，处于低限上的人才经过努力，提高了自身素质，并在事业的攀登上有新的进展，即成为高级的人才。然而，高级是相对的，高上复有高，呈多层次结构，最终的高限是不存在的。但只要进入低限的人才，就必须具备“德”，即遵守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必须具备创造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表演和导演等方面的某种专长，是一个德才兼备者。

由于人才的核心部分或主体部分是知识分子，这就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界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92页。

定问题。知识分子的英文拼写为 intellectual，它的词根是 intellect（才智），说明知识分子是有才智的人，并不仅仅指有知识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意大利著名政治家葛兰西在《知识分子的形成》一书中称知识分子为在一定社会或社会集团中完成“包括技术性工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专门性工作的人”。澳大利亚学者丘奇沃德把知识分子的文化下限定为大学毕业，但那些虽无大学学历，却可以从事大学毕业生方能从事其工作的专业人员也可视为知识分子。前苏联在知识分子的界定上，一是强调脑力劳动的职业性，二是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受过中等以上专业教育。1977年，M.鲁特凯维奇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确定知识分子为“从事具有高度熟练技能，通常需要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方能胜任的以脑力劳动为职业的劳动人民的大的社会集团。”这些界定方式各有特点、各有侧重，有的也存在着不科学之处。但在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具备中等或高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才。如果联系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状况，我们认为，这样界定知识分子也许更为恰当：知识分子是文化程度高出同时代社会劳动者平均文化水平，以创造、传播、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特征的脑力劳动者。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的特殊素质，进行着复杂的、特殊的脑力劳动，或称精神劳动，为社会、为人民奉献着凝结自己的心智和生活体验于其中的艺术作品或演出；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重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精神文明的孜孜以求的建设者，是名副其实的、以其艺术劳动影响着千家万户，从而也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人才。

现在，我们继续探讨邓小平同志的人才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人才思想建筑于对以下重大理论问题的正确解决：

#### 一、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这样的科学判断：“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次年3月，他对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脑力劳动者作了具体分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邓小平同志的分析完全符合人类两种劳动的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趋势。古往今来，知识分子作为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把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的或者二者相交融的生产经验上升为科学知识，成为知识形态的——对于文艺领域来说是艺术创造形态的——生产力。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一起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人类社会更替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人体自然力量

没有多大变化，变化的是人的脑力劳动。新的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新的艺术创造来源于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能动的、渗透着主体心智的反映，时代的先进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无不是脑力劳动的成果。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脑力劳动者，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就不会有科学文化的积累，就不会有艺术宝库中的难瑰奇珍，也不会有今天的文明进步。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更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这个原本十分朴素的道理，却曾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为人们所疑虑、所不敢承认。邓小平同志以其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和识见，廓清了迷雾，确认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的劳动者身份。

## 二、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就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国的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在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那些日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劲头火山般迸发出来。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一支可以信赖的依靠力量。根据邓小平同志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便使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殚精竭智地作贡献有了最大的政治信任感、安全感和责任感、使命感。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艺术创造才能的拥有者。科学技术装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艺术创造从知识分子的头脑流淌而出。现代化的物质产品是科学技术的物化。优秀的艺术作品则是文艺家对社会生活审美感受的对象化。离开知识分子、离开人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无法进行的，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是在这个关系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技术正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6页。

《三中伞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88页。

的作用。”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讲的，10年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重申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奠定了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因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艺术生产的劳动力，则是具有一定艺术素养，包括文化知识的艺术劳动力。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恩格斯曾列举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770年到1840年，英国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40倍，蒸汽机的推广应用被公认为是一个主要原因。正是科学技术“呼唤”出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为现代生产的大量实践所检验。在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本世纪初仅占5—20%；到五六十年代，则高达60—80%。在艺术领域，从创作的角度看，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养即是科技；从艺术载体或生产手段看，科技对艺术生产的发展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摄影、电影、电视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艺术，都是科技新成果与某一或某几种艺术门类相融合的果实，代表当代科技水平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也正在为艺术创作活动所应用，成为艺术生产的一种手段，并将对艺术的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艺术领域无疑也是一个真理性的命题。既然如此，作为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掌握并创造着最新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拥有较高思想艺术素养并不断使之提高或丰富的知识分子，统而言之，人才，科技人才，文艺人才，各种各样的人才，其对社会的重要性便可想而知了。

由于邓小平同志正确地、科学地解决了以上问题，使他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建立于坚实的理论基点之上。

应该特别说明的是，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绝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对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观点的“否定”或“纠偏”。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述，曾被“四人帮”当做迫害、摧残、整知识分子的大棒，但是，诚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世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3—8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0页。

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当然，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了的。”可见，毛泽东同志完全是从积极的、善意的方面，为着爱护、为着帮助而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但是，邓小平同志毕竟是面对“四人帮”撒播的乌云迷雾还原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尊重人才的思想的，同时，为这一思想构建了坚实、牢固的理论支柱。他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人才理论的确立，建树了不朽的功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把理论付诸实践，狠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我国知识分子创造了空前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创造了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和氛围。

---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7页。

## 第二节要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

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文艺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早在 1979 年 10 月，他在《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就

明确指出：“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我们不仅要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这里，邓小平同志联系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时代，深刻地阐明了“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

的现实紧迫性，并提出了如何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途径，一是要从各级领导的思想中解决问题，二是要从工作制度上解决问题。此后，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文艺人才问题还有一系列论述。为了全面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文艺人才的思想，我们有必要先从人才学的角度探索文艺人才的特点。

文艺人才既有一般人才的共性，也有其个性。

就宏观而言，人才具有以下共性：

### 一、高度重视精神上的需要

对于人才来说，追求精神文明的力度总高于追求物质需要的力度；对事业成功的追求总是他们终身最

高层次的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总是精神需要的满足的手段，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 二、对于事业有着强烈的热情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

古今中外，无论在科学上、文学艺术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无不狂热地迷恋着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无不对自己所最感兴趣的事业一丝不苟，恪尽职守，高度负责。如果把他最感兴趣的事业称为他的主兴趣，那末围绕着他的主兴趣，往往还有许多从兴趣，而从兴趣又常常相当广泛。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化巨匠郭沫若，既钟意诗歌创作，又涉足于戏、剧、散文、小说创作，同时又在历史研究中在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建树。他的难以满足的好奇心时刻如滚滚巨流，推涌着他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使他成为杰出的人才、罕有的奇才。

对于文艺人才来说，他不仅应该具备这些一般人才都应具备的心理素质，他还必须具备以下个性：

### 一、丰富的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是人生阅历的积累或总和，是艺术创作的原料。没有日积月累的丰富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离开了时代环境、社会生活和个人的经历等客观现实基础，即使想象力再强，艺术家也是不可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的。黑格尔也曾说过：“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

### 二、进步的世界观

艺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是一种高高地悬浮在空中的上层建筑（马克思

---

《邓小平论文艺》，第 9 页。

黑格尔《美学》第 1 卷，第 357 页。

语)。艺术家如何观察、认识生活，表现生活、评价生活，世界观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杰出的艺术家，总具有在他那个时代属于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世界观。在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世界观的制约下，他的道德品质往往呈现出某种崇高性。他不随波逐流、苟合世俗、趋炎附势；他坚持正义，热爱良善，痛恨邪恶。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某种独立人格或高卓风范。鲁迅就曾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创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这里说的是美术，艺术各门类无不如此。“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树立了进步的世界观，才能创作出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血肉鲜活的艺术佳作。

### 三、广博的文化知识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曾说过：“知识对任何工作都有帮助，但是对艺术家说来，全面的教育和渊博的知识更是必需，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生活的真正表达者的话。”刘少奇同志也曾强调指出：“文化水平决定作家的创作水平。”

历史上，优秀的艺术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美术家达·芬奇，不仅以其杰作《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使绘画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还在军事、天文、地质、土木工程、生物学、生理学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见解和成就。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堪称一部百科全书，书中反映出他对诗词歌赋、工艺美术、建筑、园艺、医药、烹调以至农业知识样样精通。鲁迅除写小说、杂文外，还校订整理了一批古籍、画册、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和文艺理论著作，并最早把柯勒惠支的绘画介绍给中国人民。他们的知识都如浩瀚的大海，无边无际。广博的知识使他们在专业上造诣精深，兄弟艺术的涉猎对他们的本行艺术给予了深刻的启发。虽不能一概而论，但对大多数艺术家来说，知识的丰富性与他们的成就是成正比的。

### 四、熟练的艺术技巧

周恩来同志说得明白：“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艺术技巧，特别是基本训练、基本功，不同门类的艺术有着不同的内容，作家表现为超越常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美术家表现为超越常人的掌握线条、色彩的能力，音乐家表现为超越常人的组合音符的能力……等等。但作为某一门类的艺术家，无不娴熟于自己的艺术的创作技巧。娴熟，才能得心应手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的情感；娴熟，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佳作。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对艺术技巧生涩、缺乏驾驭能力的艺术家。这是最朴素的，然而也是最严酷的道理。

对于一些特殊的艺术门类来说，艺术家甚至还需要赋有某种先天的特殊生理条件。如画家需要非凡的辨色力，作曲家需要非凡的听力，表演艺术家需要端庄美好的形体和声音……等等。

文艺人才，特别是杰出的文艺人才，都应该具备这些人才共性和文艺人

---

《鲁迅全集》第1卷，第404页。

《鲁迅全集》第3卷，第408页。

法捷耶夫：《论写作》第189页。

见《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第5页。

《周恩来论文艺》，第102页。

才的特殊个性。这是一个先天与后天、精神与生理、学习与实践、环境影响与个人奋斗诸因素共存互依的复杂结构。由于各个因素品位的不平衡，呈现为总体结构层次的高下之别及其特点，也便决定了艺术人才的艺术个性，对其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也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杰出的文艺人才的素质结构总是高层次的，所以他的作品总体品位也较高或很高。在文艺人才的素质结构中，先天的因素固然无可改变，但后天的素质却是可以形成、可以提高的。所以，杰出的文艺人才，往往一靠发现，二靠培养，发现为着培养，培养蕴涵着发现。

邓小平同志深知这一切，这便使他的文艺人才论既重视发现，更重视培养，在如何通过培养提高文艺人才的全面素质上都有精到的见解。

### 一、要注意发现人才

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的思想，就寓有注意发现人才的含义。由于文艺人才的素质的多样性和高层次性，其形成条件包括家庭环境、亲朋关系、生活经历、所受教育以及某些先天条件，所以，“人才难得”，仅靠学校教育培养人才是不够的。学校可以教给学生文化知识、艺术技巧，却无法使学生亲自获得丰富的生活知识、亲自在生活实践中产生心理体验。至于进步的世界观，也不是靠学校教育就能真正确立的，学校教育只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社会实践是更重要的方面。所以，文艺人才，特别是作家，往往需要从广阔的社会中发现。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大都是从社会的某个角落中脱颖而出的。所以，发现人才至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们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正因为人才难得，所以要重视发现，发现也便是一种尊重、一种珍视。因为只有发现，才能为之创造成长的必要条件，使之长成参天大树，否则便有自生自灭、在幼芽状态便遭受摧残或缺乏必要成长条件而萎蔫的危险。

二、文艺工作者应“始终不渝地面对广大群众”，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或者说要深入人民的火热生活

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紧密联系人民，文艺工作者才能获得不竭的创作源泉，获得无尽的“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获得鲜活的创作灵感和有力的创作动力，也才能获得“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的哺育。也就是说，深入人民生活，不仅可以使作家捕捉到创作对象，还能够使生活经验得到丰富，世界观得到锻冶、对事业的热情和追求美的好奇心等方面的素质得到强化，实际上通过创作实践也将使其技巧得到提高。可见，深入生活对于文艺人才素质的升华是至为有效的，是培养文艺人才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把文艺家深入生活，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和接受人民精神的哺育，提到了我

---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3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们的“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的高度，显示了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战略智慧和远见卓识。

### 三、文艺人才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早在《祝辞》中，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后来，又于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就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学习的目的，也教导了学习的方法。要在学习中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提高世界观的先进性。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这段话是1977年讲的。1978年，他又一次面对知识分子强调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文艺人才来说，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以改造思想，这是断断不可轻视的。

### 四、文艺人才要有分析地学习中外文学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表现能力和艺术技巧

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自有其特点、规律和要求。文艺人才不仅应该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还应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艺遗产中得到启迪和借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又指出：“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学习外国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

“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想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是十分错误的。这里，邓小平同志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人才应有的三种自我修养功夫：一

---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2—93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5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6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是不自我封闭，要不断汲取古今中外文艺遗产中的有益营养；二是汲取不是盲目崇拜，不加选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鉴别、过滤、批判和融化；三是要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登攀。

#### 五、各级领导要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工作

“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必要条件”，起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民主、和谐、宽松的创作环境和氛围。对于艺术问题，要允许艺术家在自由讨论中得到解决，不能把艺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更不能用大批判的方法，“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粗暴地干涉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和评论。“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艺术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应当形成制度。二是要在领导与艺术家之间建立平等的、互相尊重的、非衙门化的正常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领导者应是艺术家的朋友，不应是指手划脚、说长道短的“长官”。三是要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帮助艺术家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保障他们的创作权益，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当然，文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还包括需以法制的健全作保证等方面。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以上五个方面，既是文艺人才自我提高的途径，也是党和政府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方式。只有认真坚持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些思路和方式，才能“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造就宏大的、高素质结构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文艺人才队伍。后记

《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在陕西立即掀起一个学习热潮。为了更好地配合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钻研领会邓小平文艺思想，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了省内有关专家、学者、文艺评论家，在通读3卷的基础上，重点对邓小平文艺思想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究，撰写成了《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这本书。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第1章由肖云儒同志撰写，第2章由畅广元同志撰写，第3章由费秉勋、王仲生同志撰写，第4章由刘建勋、权海帆同志撰写，第5章由张路同志撰写，第6章由王愚同志撰写，第7章和第10章由王仲生同志撰写，第8章由薛迪之同志撰写，第9章由李星同志撰写，第11章由陈学超同志撰写，第12章由孙豹隐同志撰写，第13章由刘建军同志撰写，第14章和第15章由权海帆同志撰写。全书由肖云儒、刘建军、畅广元、孙豹隐负责统稿，由邹尚贤同志阅定。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刘荣惠同志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书前的“邓小平有关论述摘录”参照了《邓小

---

《邓小平论文艺》，第9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8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10页。

《邓小平论文艺》，第97页。

平思想宝库》中的材料，专此说明。

《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编撰委员会

1993年12月18日

